

武漢大學右派言論彙編

1957.9.1

# 目 錄

## 序 言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	1—26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	
土地改革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	
肅反運動	
仇恨咒罵社會主義，宣揚嚮往資本主義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工農生活水平	
統購統銷	
其他問題	
關於共產黨的領導.....	27—49
評饒、丑化黨員和中國共產黨	
挑撥黨羣關係	
所謂“黨天下”	
反對黨的領導取消黨委制	
誣蔑毛主席和黨的領袖	
攻擊馬列主義，攻擊政治課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50—77
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攻擊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自由	
攻擊人事、檔案制度等	

## 序 言

誣蔑蘇聯，誣蔑斯大林，破壞中蘇友誼  
歪曲匈牙利事件  
對南斯拉夫的看法

關於整風運動及反右派鬥爭.....96—117

### 關於整風運動

歪曲整風運動的性質、目的、原因

歪曲黨的整風運動的方針

妄圖奪取整風運動中領導權

關於反右派鬥爭

關於立場問題

## 附 錄

武大民主黨派對目前我校整風運動的意見.....

“精神世界里的殺別”.....

從同志談到紅色專家.....

宗派主義的種種.....

該是破除沉悶的時候了.....

“老牛拉破車” 武大要求支援，主張建立黨委領導下

的校委會.....

從知識分子的政策說到目前高等學校的人事工作制度.....

不成系統的幾個意見.....

給武漢醫學院××的三封信.....

關於理想的社會問題.....

關於學術自由的問題.....

再論社會主義時代的羣衆自發運動.....

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云亂翻。珞珈山上也不例外。在整風運動期間，珞珈山上的右派分子，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舉行了猖狂的進攻。他們借幫助共產黨整風之名，行整垮共產黨之實，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

我們現在將已搜集到的有關右派言論，加以整理，彙編成冊，掛一漏萬，在所不免。竊名就叫“武漢大學右派言論彙編”。爲了批倒右派言論時參考的方便，我們按以下五個問題加以編排，即：（一）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二）關於共產黨的領導；（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四）關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人民大團結；（五）關於整風運動及反右派鬥爭。我們編輯這個“彙編”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廣大羣衆能更有力地，更徹底地批判右派；二是，以反面的材料來教育我們的同志，提高他們的明辨能力和覺悟程度。

這個“彙編”的內容，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右派分子將注意它。

右派分子，將從這個“彙編”的內容中得到共鳴；並從這裏得到某些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教育。但是不論怎樣，總是無救於他們的滅亡的。事實證明，“右派言論彙編”，對於右派分子說來，並不是成功的記錄，而只是失敗的記錄。

廣大羣衆很需要這個“彙編”。他們將從“彙編”中認識清楚右派分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狹窄面目和兩面手法；並從這裏學會一些東西，學會在任何特殊情況下都能善於辨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樣，受蒙蔽的人，將會清醒過來；清醒的人，將會變得更加敏銳和機警。

我們殷切期望廣大羣衆重視這個“彙編”。只要廣大革命羣衆從右派言論中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了明辨能力和覺悟程度，各種暗藏的右派分子就一定會被我們一一清查出來；右派的各種反動觀點就會被我們徹底駁倒；反右派鬥爭就會更加深入，就會取得徹底的勝利。

#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 社會主義建設

##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

### 土地改革運動

“土改中吊打地主都是不入彊的。”

“土改中鬥爭地主太殘酷了。”

“某些地主對農民本來就好，沒有什麼剝削，只是一些土改幹部，故意挑起矛盾。又如壓迫地主兒子去打地主父親，連人倫也不要，這是什麼搞法！”

“什麼土地改革，還不是有田無分，報上說得很好，實際上，說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土改搞得很好，你們湖南北還好，我們湖南更糟。”（按：這段話是右派分子對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學，在土改中常給不安時說的）

### 三反、五反運動

“過去黨所領導的一系列運動如三反、五反、肅反等都不應當搞。”

“三反根本不應該在高等學校中進行，因為在高等學校內的人都是清高的和正直的。”

“在三反時，有先制定老虎的數目然後為了完成任務亂抓好人，給他們披上老虎皮。”（按：右派分子把有領導的進行說成似乎是有意陷害，這顯然是一種惡意歪曲）

“三反、五反羣衆性運動中，打人等等的鬥爭多麼殘酷。”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但是所使用的手段，無疑是狂風暴雨，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變害而含冤九泉者何止千萬？這種做法是無人道的，錯誤的，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了。成千上萬的人無辜受害，全國遍佈集中營，而其手段之殘酷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來得悲慘和可怕！在這裏法律卻絲毫不起作用，共產黨員有無上的權利，有生殺之權，有私設法庭，任意捕人，關人鬥人的權利，在這裏我們嗅不得一點民主影子”。

“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來搞的，以徐×××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却是悄悄的搞，待遇太不公平。”

“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違法搜家，結果只遭個欺。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

“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

### 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改造本身有問題，人家有人家思想，他可以保留自己看法，為什麼要強迫別人改造他的唯心主義思想呢？別人有不同世界觀根本談不上什麼改造不改造的問題。要別人改造是根本的錯誤，由於改造結果造成教條主義的盛行，使人民的腦筋僵化。以前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粗暴地看成是對敵人鬥爭，這是嚴重的錯誤，肅反運動過火情有可原，思想改造過火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我有反感，思想改造本身是值得懷疑的。”

“思想改造運動中，清華大學批判了×××的思想，黨委組織人來檢舉×××，簡直是偽造材料，我自己就做過假見證，有很多人是很願意做假見證的，這些人是躲在別人身上前進。清華批判×××的

哲學思想，同學那有那樣的本事，他們反對的理論是那裏來的，只有聞清華黨委”。

“黨委矛盾的幾個基本原因，是很多非黨知識分子還抱着資產階小資產般的尾巴，一下難以去掉，而在運動中黨員性急，在他們是很鐵不成鋼。然而羣衆思想確實一時扭不過來，這中間往往發生矛盾。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時，×××說：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但決不意味着一個月內不能提高一大步。我就因為兩星期內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們撤職了。”

“徐懋庸初來時還好，後來變壞了。據說，當時孫祥雲、張瑞瑾與周鯁生不對，於是凡是周鯁生時來的人都認為是周鯁生派來的。那次思想改造是一次宗派鬥爭，這是把政治鬥爭庸俗化了，歪曲了這次運動。張勃川來了宗派並沒十分發展，但現在是否還存在，黨委值得研究。”

“成績是主要，缺點是次要的。”這幾乎成了每一個總結報告中的神聖公式。在這個陳腐的公式中，不該（？）掩藏着許多污穢的東西。先說思想改造吧。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存在着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乃至於反動思想，原是不足為怪的，要改造，這也是天經地義的。問題在於如何改造。按照中央的方針，主要通過自我改造。可是我們學校，却主要是強迫改造，大會小會鬥門。同學批評老師的態度不講一些，就要被扣一頂“右傾”的帽子。幾十年以前的老賬，硬要人家關在房子裏回憶出來。作檢討的時候，報告人哭了，就說是假裝的，企圖蒙混過關；笑了，又說人家都不在乎；不哭不笑，是無動于衷。有的時候，講了幾句就教專先準備佈置好了的同學們轟下台來。這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針，而且合乎人情。被這樣鬥過的雖然不多，但是它在老師中的影響是深遠的。根本方針都搞錯了，難道還可以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嗎？為了重新估價，接受教訓，我們覺得可以在教師中做個調查，看究竟有多少人的思想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覺改造的？又有多少人是被迫作檢討的？再說黨委宣傳部的平時思想工作，完全是無計劃的。教師的政治學習，幾

年來都是東殺一刀，西殺一刀，形式主義非常嚴重，不論任何學習，都是計劃一大堆，會議一連串，即令一個問題沒解決，處頭來還是‘成績為主’。去年學習‘八大’文件，黨委宣傳部等了好久得到省委的通知後，才匆匆忙忙地作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動員報告，成立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教工學習委員會（指派的）。羅鴻運同志把我們找去開了好幾次會，一直沒有搞清學習目的是什麼（黨委的目的是照抄省委的）我們的任務也是糊里糊塗。當時羣衆的要求可以分爲兩種情況：有文科科的一些系和馬列主義教研室，比較偏重於一些新的理論問題的討論；而在理科和文科科的另一些系則希望要學習就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有一個老教授並且表示：‘討論精神實質，我不參加。討論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時，一叫我我就來。然而黨委宣傳部並沒有重視羣衆的這些合理願望，一方面認爲光學理論不好，應該多聯系批判自己的教條主義，另一方面認爲當時還沒有條件去批判領導上的‘三害’，這種看法當然有合理的地方，學習理論當然應該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批判教條主義，但問題在於黨委對於如何結合文件的學習去批判教條主義沒有作具體的研究，而是說‘凡是知識分子都有教條主義’的空洞概念出發去布置學習。更錯誤的是害怕羣衆去觸動領導上的‘三害’。所謂沒有條件，實際上是在領導上缺乏隨時檢查工作糾正錯誤傾聽羣衆的意見的負責精神，一講學習，就是要調羣衆的自我批判，而不願意讓羣衆批判領導的缺點，這是在政治學習中最大的片面性錯誤，也是平時發動民主不夠的具體表現。這種片面性同時也造成了實際政治生活中，黨員和領導者總是以改造者自居，羣衆總是被認爲被改造者的片面教育觀點和作法的錯誤。在有一次學委會上，我們曾經建議現在黨委認爲沒有條件讓羣衆發揮自由思想去觸動領導的‘三害’，只是體會一下精神實質，空空洞洞地聯系一下教條主義，就不如干脆不來計劃呀，開會時，興師動衆地百（白）搞一番，因爲羣衆對這種搞法實在夠討厭的了，高級知識分子難道還看不懂‘八大’的政治報告嗎？何苦叫人們一定要在小組會上勉強應付一下呢？羅鴻運同志堅持說我們只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言下之意，是想要

人相信：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是看得懂的，就是要這樣督促一番才會去看啊！當然不會取得任何結果，而在我們教工學黨會的最後一次會上，羅鴻運對學黨的工作作評論時，仍然來了一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真是天曉得。這個公式實在是‘三害’的防空洞，在反對‘三害’的同時，必須把這個陳腐公式也反掉。”

## 肅反運動

“肅反是路線上的錯誤。”

“肅反是政策上的錯誤，是全國性的錯誤！各地整人逼人關人都如法炮製，今天還有很多同志在集中營中，我們要把握集中營中勢改中的兄弟姊妹們解放出來。”

“肅反是不必要的，成績也是次要的，肅反冤枉了很多，少數幾個反革命份子有什麼關係，就讓他存在嘛。”

“1955年肅反，首先在高等學校舉行，這是一個錯誤，只是因爲有肅反的錯誤，才有今天整風的必要。……1955年肅反完全沒有必要。當時地主階級業已消滅，工廠中封建把頭已被打倒，反革命已基本肅清，高等學校已進行了思想改造，三反已肅清了工廠中的反革命，五反說資產階級完全老實了；國際上日內瓦會議召開後，國際局勢迅速緩和，在這種局勢下，進行肅反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制造了人民內部矛盾，並使此矛盾加深和尖銳化……。沒有肅反，知識分子的改造將更順利……。羣衆性進行肅反是更大錯誤，許多‘積極分子’借此以陷害無辜好人而‘火線入黨’，爲什麼不能讓公安機關單獨來搞？……，這種錯誤完全是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對中國的影響。”

“高等學校內根本不應搞肅反運動，這和斯大林一樣在階級社會消滅後仍然強調階級鬥爭，所以肅反搞錯了（犯了擴大化錯誤）……。”

“肅反是斯大林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指導下搞起來的，黨中央犯了策略上的錯誤，但不肯承認。反革命份子任何時候都會有的，應

時由公安局來辦理，肅反運動根本沒有必要。”

“肅反問題擴大化，使很多無辜者受到摧殘。他們（指黨員）在學校中，却做出比法西斯還殘酷的事情來”。

“對胡風批判後就來一個‘肅反’，表現惶惶失措，結果肅反擴大化。‘三反’時控制數字，指定這裏要打出多少老虎，肅反中也是控制數字。實際肅反不到1%，所以我怕這次又會擴大化。”

“我們的肅反是否把斯大林關於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及×××的打擊面擴大化的公式運用到武大來了呢？我們認為學校是這樣作了，在我校的肅反中，很顯然打擊面是擴大了的。被列為政治鬥爭的108人，其實真正的反革命份子只有21個，而其餘懷疑的就不知還有多少了。有人說只有錯殺了人才是打擊面擴大化，我認為凡只要是錯鬥、錯關、錯追查的都是打擊面擴大化。”

“肅反中的缺點和錯誤應由黨中央負責，社會主義法制受到破壞。”

“肅反時規定反革命分子佔百分之幾，這是主觀主義。”

“我遇了三關，過不了武大肅反關。我本沒有問題，不應是肅反對象，但爲了湊足100個以上的數字，結果也把我當反革命份子鬥了。他們硬鬥我逼我要我說我過去帶過幾萬兵，殺過許多共產黨，那有這些事呢？我那有那麼大的權利？他們任意捏造就是了。要我坐了四個月班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拉屎拉尿也不准，解大便要前三小時報告，每天早上七點鐘就要「報到掛號」弄到我今天害了腎臟炎，這不知是什麼法律。肅反的那些人是唯心主義的擁護者與執行者，但他們還說自己是唯物主義者”。

“肅反毫無事實根據的鬥某人的愛人，整他愛人的刑法不旺於上饒集中營，三害倒處是一樣，集中營的搞法不僅限於武大，倒處都有。”

“肅反是先確定對象而後去找材料；每次運動都是寧左勿右，肅反即是如此，別人早上唱了國歌，就要挨鬥，對肅反的鬥爭方式是不能同意的，隔離反省，武大沒有這種權力，是違反法紀”。

“什麼掌握材料不掌握材料，就說我們那個肅反小組，也是什麼材料都沒有，只是叫！我掌握了你的材料，你坦白，你坦白。”

“我從未貫徹中央的肅反方針，黨委把內部問題搞成了敵我問題，以致使很多同志受了委屈。肅反時一些被鬥爭的對象，未在會議上公開研究，只提出什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簡直是胡適的主觀唯心論。”

“肅反擴大化了；肅反是有意陷害，黨員是維新斯基的法學觀點。”

（按：所謂“維新斯基的法學觀點”意即捏造證據，陷害別人。）

“什麼問題最使羣衆憤慨？莫過於肅反中亂鬥一起。開課不開課或者工資的多少，比起一個人的政治上受了委屈說來，都只能算是次要的事。我們的‘三害’領導者，對於這樣嚴重的問題却採取了極其輕率的態度，首先由於我們長期不注意黨的政策學習，在肅反中錯誤的執行了黨的方針。黨中央號召全國各地區各單位都要提高警惕，反對右傾麻痺，這是完全對的，事實上各地區各單位都發現了反革命份子的活動。然而我們學校却把這理解成了一定要在每一個系每一個班都要打出反革命來，這就錯了，因為這不是從實際情況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在我們馬列主義教研室開展點名鬥爭的時候，當時許多同志的思想都打不通，肅反小組長爲此還特別召集了一個團支部反對我們的‘右傾’，並且氣憤憤地說：‘我不知道我們的同志爲什麼這樣不相信組織’：這就是說組織上，已經掌握了足夠的料，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爲什麼既無足夠的事實根據，羣衆又不同意，組織上一定要展開羣衆性的追查呢？解釋只能有一個，就是主觀的一定要打老虎來，馬列主義教研室也不能例外。其次界線不清，把懷疑根據當成了開展羣衆追查的根據。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爲了把隱藏的反革命分子肅清，讓羣衆大膽懷疑，並沒有錯，問題在於不該抓住一鱗半爪就展開羣衆性的追查，搞到人家下不了台，更錯誤的是因此而輕率地限制人家的自由，實際上把人家當已經作了反革命分子結論的人看待。再其次，嚴重的宗派主義幫他們擴大了懷疑的範圍。因而

也擴大了鬥爭的範圍。這些同志長期不信任知識分子的進步，死記得知識分子的歷史複雜和其他缺點，不了解知識分子的特點，有一點風吹草動，例如聽到發牢騷或者看不慣，很容易刺激他們的‘警惕’形成一種‘條件反射’。當然在這裏並不排斥個別的救護報復行為，兩者加在一起，就把問題搞得更加複雜了。”

“在肅反問題上充分表現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我在一年以前被斗，被扣上特務有鮮血的反革命分子，這是主觀主義的將人家的政治生命開玩笑，要求黨將材料向羣衆交代清楚。”

“領導肅反的黨員同志，由於帶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情緒，根本不信任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在進行肅反工作時，往往不是先根據充分的調查研究，再確定鬥爭對象，而是偏聽某些片面的彙報，確定鬥爭對象以後，再去調查研究，其結果，鬥爭面就擴大了。”

“肅反就是把知識分子當化學實驗似的，用試劑試一試反應如何，文教部的肅反成績要重新估價，武大肅反的隔離室，比台爾曼在法國坐的監獄還糟，我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共青團員不向無辜的死者獻花圈，那還是什麼共青團員的良心”。

（按：在我校大鳴大放時，中文系有三個共青團員背叛了無產階級，向在肅反中“無辜死者”獻了花圈。）

“因為過去武大的領導幹部碰不得，碰着他將來總要吃虧。如檢查×××的工作時，黨號召揭發×的錯誤，大家響應號召，但批評×的人肅反中却挨批評。今年對黨提出意見，過了一二年，是不是又會變成反革命呢？”

“肅反時有些青年人當時的態度粗暴，這些錯誤可以原諒，不能容忍的是在這次運動中，還有籍據報復陷害無辜的嫌疑，當時公安局帶手槍逮捕了圖書館專修科兩個教員（其中一個上校特務），但××說，武大敵情嚴重，還有更隱蔽更高級的反革命，現在才開始暴露，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以後煙消雲散，沒有了。這只可能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容忍還有超乎上校的特務存在，沒有查出，一種就

是×××胡說。原來×××，×××，×××等是準備把法律系主任×××當作最大的特務來狠狠整一下的，為什麼要整他呢？×××是一個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後擔任過副秘書長，副教務長，法律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義的作法，選人民代表時，他雖非上級指定的候選人，却得了很多票，這就犯了宗派主義的忌，爲了陷害他，就組織人偽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駕李校長這個老先生好拐等等（×的妻子是江蘇人，不會講湖北話。）這也算是×的反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級了解他，沒有批准。×、×等人曾兩次寫信給市委，市委沒有批准，否則，×就要當成反革命來整了。×××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動員人家寫材料，人家不好不寫，但他們也有他們的辦法，以兩面派的辦法對付之，即白天寫了材料，晚上又去訴苦×先生。所以誰寫了材料，寫些什麼，他全都了解”。

“肅反這種罪，你們團員怎麼會得到，這是我們羣衆該受的罪嘛！”

“我對肅反問題早就有懷疑。打虎時（三反）有一個我原機關的同志，我就不主張鬥。有一個人應該鬥，但是他是支部的負責人就不鬥。肅反也是這樣，顯然有真正的反革命沒有查出來，却冤枉了許多好人。”

“我對肅反是嚴重的破壞了憲法，打人罵人的現象真嚴重，把那些認為是鬥爭的對象集中起來管制，這簡直是侵犯人權，侵犯人身自由。肅反運動都是上面幾個黨員把名單圈好，然後叫羣衆去鬥，羣衆知道什麼，還不是胡鬧。在肅反中我投錯斗了80—90%，而黨委並不承認錯誤，尤其嚴重的是違反了法制，侵犯了人權。”

“憲法有時被違反了，肅反中打人罵人，和犯沒確定爲反革命分子的人，不經法院而不許行動自由，公開監視是不對的，是違反憲法的。對運動的方式上，我們總不怕右，盡量搞大一些，以後再收拾爛攤子，鬥錯了的，不滿意是合理的，我們學校對×××過火了，但×是專家，他思想有問題是事實，但常常拿來鬥是不對的。”

“肅反是違反法制，違法亂紀，未通過法律手續，逮捕人搜查



人；還有逼供，體罰，這些都是違法亂紀的。參加肅反的人是踏着別民的鮮血前進的”。

“×××說有的有搜查證，有的沒有，那麼什麼叫做法？什麼叫做紀？要給我們說明白，或者公布一個法，就是任何公安人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到任何人家去搜查，那也好，我們好守法，或者給我們選擇職業的自由，讓我們遷地為良”。

“有公安局的逮捕證也仍是違法亂紀，因為有些逮捕是沒有根據的。肅反時期不是特殊時期。說肅反運動沒有侵犯人權是說瞎話。肅反可以懷疑，重大懷疑分子可以逮捕，但抓來後在48小時內應作處理，否則就應釋放、而不應一關就是半年。通過臨時政策法令就是破壞法制。過去肅反擴大化是把人民反對派看成敵人，貼標語（指一些反動標語）並不是敵人，而是人民。”

“過去因為法制不夠健全，隨便搜查關入都可以。如肅反時，我們學校就關滿了許多老虎。其實有些做法他們自己也知道是違反憲法的，他們閉着眼睛不承認，外國代表來了就把老虎趕到山上去散步。關在武大比關在監牢裏還受罪，親人也不能接見，無論做什麼都要報告。以前我在部隊裏面，上面規定一個單位要打出多少隻老虎，一定要完成任務，否則就要殺政委的頭，斗的方式就是搞‘疲勞戰’把人搞得疲勞昏沉，然後進行審問”。

“反革命份子的界線怎麼劃呢？有些是難劃的。一般是參加反動的組織，或有罪行，我們中文系却把有反動思想或者和有問題的人接近的人也斗了。民主是沒有絕對的我同意，不妨明白的說，革命大風暴沒過去時，如不能兌現，在1954年就別制定憲法，肅反時違反憲法是不對的，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有些國家不像我們，波蘭選人民會議員比我們民主。”

“我認為肅反是違反憲法的，肅反是有錯誤的，三種方式：①逮捕 ②集中 ③在宿舍派人跟蹤。當時是犯了錯誤，有死了的，沒公佈他們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死了的是時代的倒霉鬼。”

“有反革命就肅是肯定的，我挨斗錯了一些人，如我們班斗的人

有的問題是以往交代過了的，領導上說掌握了材料，讓大家斗，而且不經法律手續，監視人家，抄別人的日記在大會上唸。”

“我是各次運動的主角（除三反外），肅反、思政……都要我交代歷史問題，逼口供。但是交代了，到現在都沒有結論，為什麼領導毫無辦法，只會逼口供，不會調查研究，老是‘一根棍子打死人’，對人‘無情的打擊’，‘殘酷的鬥爭’”。

要公開檔案，不能任意瞞別人，不把人看作人，要鬥爭就鬥爭，要打擊就打擊。”

“我國這次肅反的面較廣，似乎寧肯‘左’一點總比右一點好一些，我們在肅反運動中打錯一些人，雖然後來賠禮，認錯（這固然很好），但被斗者心靈上留下的創傷是很難醫治好的。”

“武大隔離室，比法西斯的監獄還要壞，台灣在法西斯監獄裏，還可以看到和外人來往”

“在肅反中全國遍地皆是集中營，武大×××，××等將大批無辜的教師與學生關進了武大的監獄，這種‘杰作’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國亦少見。關進武大集中營的教師和學生受到種種非人道的待遇；武大的監獄比法西斯監獄更殘酷與黑暗。共產黨採用的手段和國民黨一樣，寧可錯三千，不可放走一個。”

我挨斗是沒有根據的，是故意陷害別人，起床時唱東方紅也要鬥爭。肅反時把許多無辜的良民送進了武大監獄，冬天不給衣服穿，大便要報告，這種不人道的事只有共產黨能做得出來，比法西斯還要毒。隔離室和國民黨的監獄一樣，隔離室不如勞改，勞改還見天日，還有自由。肅反和蔣介石的‘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一樣。肅反鬥爭沒有斗出一個反革命成績也說是主要的。”

“肅反幹部是一羣吃人血馒头，喝人血傢伙，他們吃得又紅又胖，長得青面獠牙。領導叫打，有些人即要求‘殺死不可’，投合領導的意圖，這種拍馬之風，非肅清不可。現在我班的肅反幹部能入黨都是靠別人的血淚換來的，沒良心。”

“說胡風是反革命集團因為他是反革命，我們爭的關鍵是胡風是

不是反革命，是不是從三批材料看出胡風是反革命集團，我懷疑，他們的活動很難說他們是爭奪黨的領導權，他們只不過說了某些人是‘馬掛’，胡風指出的五把刀子有些地方我們是照着做的，如‘到處有生活’。是不是黨有些材料還沒有發表出來？”

“胡風分子問題，有人說他們和台灣有關係，就是反革命，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是號召人們和台灣聯係嗎？”

“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集團。如果認為綠原參加胡風集團，便使胡風集團成為反革命集團，我要問：綠原參加了共產黨，這難道不可以說共產黨是反革命的政黨嗎。阿瓏是少校軍官却認為是反革命，那麼全國人大代表有很多是國民黨高級將領，難道人大是反革命集團麼？那麼多人為什麼又不是反革命呢？”

“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集團，胡風本人也不是反革命分子……。胡風集團不全是反革命，他們是文人。胡風集團中，反革命分子是個別的，可以通過公安局捕獲，但沒有理由解散整個集團。搞文學可以投機，而且應當鼓勵。胡風反對黨的文藝方針，是爲了‘百家齊放’；胡風偷情報是爲了文藝的繁榮，要寫別的東西，‘那裏有生活那裏有鬥爭’；同時情報是文藝的，是爲了活躍文藝，不是政治軍事情報。把黨叫董事會是文人的不滿，心情可以理解，不能認為是反革命。胡風爭取的拉攏的人是有政治錯誤和歷史問題的人，這是自然的，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攏絡；同時也只是爲了文藝，爲了向黨提意見，不是爲了反革命。胡風集團的作品也不是太壞，這樣做是黨鑽牛角尖。胡風寫意見書是知無不言無不盡的態度。

‘恨一切人’是可以的，對生活不滿對實現不滿就可以發表這樣的感慨。胡風組織秘密小集團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他們是黨所不允許的，故要秘密。”

“胡風集團只有幾十個人為什麼要發動幾億人呢？為什麼要用恐怖手段來教育人民呢？為什麼不用正面來教育人民而要用肅反來教育人民呢？”

“胡風有沒有反革命動機，如果說有，拿出事實來，黨員可不可

以批評？如果可以，為什麼不容許胡風提意見？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也許是辭翁之意不在酒，別有陰謀。肅清反革命集團是因爲不允許有第二種思想存在，是因爲胡風罵過中央某些人。胡風有許多長處，胡的錯誤只不過因黨有宗派主義，胡風不應負什麼法律責任。”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手無寸鐵的文化人，向他們大舉進攻，我聯想起文字獄是很自然，如清朝的胡沖漢的詩，明朝的詩人的詩，曾被破棺戮屍，這證明清朝統治不准有第二種思想才這樣，胡風只是說了將毛主席講話奉爲圖騰罵‘馬掛’，就遭到逮捕，這與文字獄有何不同？他們是思想上的敵人，水來土掩，他們是個學派，我以前也當他們爲反革命集團，思想上的敵人，應該在思想解決問題”。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史無前例地向手無寸鐵的文化人的進攻，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朝的文字獄還厲害”。

“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我們很關心。在肅反中，肅清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有不少缺點。以浪潮比成績，以浪花比錯誤。如果浪花比浪潮還大的話，就得不償失。我們學校肅清的反革命分子少，而斗錯的人多，說明我們的錯誤是主要的。民主是對人的問題，不是對動物。錯捕了人，人的自尊心受了損傷，自尊心是支持人生命的東西，傷了自尊心比燒了他的房子和奪了他的土地還重要。我們班斗錯了兩個人，黨是該負責的。我們的肅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引起的。是不是目的在於胡風分子？也許別有陰謀，辭翁之意不在酒。每個人有自己的日記、信件，無論是誰的，如果都像人民日報給胡風分子的信件一樣加上按語都可以成爲反革命罪狀。我們批判胡風分子就是摘日記，使我們想到了清朝的文字獄，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我們的資料室把‘胡適文存’改爲‘現代文存’，剝奪了人家的著作權。另外搜查，把胡風分子的著作都變成違禁品了。真好像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這次事件是一些人被某些人牽着鼻子走了，失去了理智。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巨大癡狂在中國的癡候。”

“肅反時刻奪別人自由，又放出來，無論站在什麼立場都要承認這是錯的。對胡風分子的著作說焚書坑儒我不同意，但說其著作是反

革命毒藥也是誇張，‘窪地上的戰役’和‘第四十一個’基本相同，為什麼不同對待呢？”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問題，是國內大事，引起國際重視，但至今沒下文，應向全國人民公佈，不該把胡風分子抓入班房，有些已放出，這中間是有文章的，有一人被公審，問他是不是說過校長不學無術，有人說他鼓勵青年戀愛，把這些東西做為鬥爭的口實，是得天下之大權，荒天下之大唐，對手無寸鐵的文化人不加研究而逮捕是不對的，如果不用事實說明，並向全世界公佈，我是對憲法不相信的”。

“關於胡風反革命的事，當時在聖國大規模地，轟轟烈烈地進行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分子都逮捕了，書都收了，當時我們相信黨而認為是正確的，事情過了兩年多，事情看得更明確，一手難掩蓋千萬人耳目，如果我們黨能拿出證據，胡風分子有和帝國主義、蔣介石有聯系，或者有武裝暴動的嫌疑，那可以逮捕，可是沒證據就根本不該逮捕，我從沒看見歷史上有這麼大規模的對文化人進行逮捕，他們是有集團，方式不好，品質有缺點，罵過開揚、丁玲等人，可是不足以逮捕，太過火，弄得人人自危，今天有提出的必要，胡風案件應公開審理，不要偷偷摸摸的，毛主席做一個國家領導人說陰放一個，陽放一個，是不成體統的，聽說胡風分子的翻譯要出版了，說明是放了，可是應該公開的放，共產黨應光明磊落，我們不能讓別人帶一輩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這不但是一個名譽問題，而且是民主問題，既然要發揚民主，就徹底搞清楚”。

“胡風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有不少胡風分子放了，工作了，可能是陰放，這是大事，應向全國公佈，胡風在那兒，我們不知道，胡風分子的書都收了，我以前買了兩本書，肖林斯基選集，是胡風分子翻譯，以前都收了，現在聽說要再版，我愛人機關中在肅反時大搜查，把我的湖北文藝拿去了，因為有綠原的兩首詩，這是違反憲法的。希望把胡風分子的處理情況公佈。”

“肅反時，生物系領導（使）×××跳樓自殺，這個四年級的學生就這樣死去了。難道把人看做不如狗，可以任意擺佈別人

命？”

“在三反五反時，不論大小單位，沒有大老虎就要搞出小老虎。土改時沒有地主就斗富農。肅反中自殺的就好像是地主逼死農民一樣”。

“我肅反時也很積極呀，當糾察隊長，帶着人成天搞，現在我常問心有愧，看着那些老虎就不好意思，總是低下頭來，我過去認識低，被騙了。鎮反時殺人權在區裏，區長那管得了那多，我就送過名單，送上去蓋章，就殺好多。現在農村幹部控制很緊，我過去當幹部，親戚朋友，甚至我母親有話都不敢對我說，現在我不當幹部了，他們也才對我說實話”。

“肅反是不是寧錯殺千萬不漏一個，打錯的人是當敵人看還是當奴隸看，還是當死材料看”。

“肅反對經濟系的副作用是……◎關係失常；◎神經失常。過去有人說過‘爲人不做惡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但是我認為肅反時是‘爲人不做惡心事，半夜也怕鬼敲門’。”

“殺人有兩種，一種是有形的，一種是無形的。肅反（對波斗的人來說）是後一種迫害。孟子說：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我總感到從肅反到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豔的，除了開會，只有組織的人接近，其他的人就不能接近。在過去私人之間有來往，老師與學生來往，結果說成是搞小集團。我是黨外羣衆，在這個問題上吃的苦頭不小，肅反後，尤其有‘六親不認’的感覺。”

“我現在看透了共產黨，看透了我對共產黨存在的一些幻想，國民黨殺人作孽的抓去殺，共產黨搞羣衆鬥爭，要殺就殺要鬥就鬥，羣衆鬥爭是最殘酷的，人格侮辱，聲譽掃地。我奇怪的，學校在肅反中斗錯了人，為什麼法院也跟着斗錯了呢？我過去太幼稚了，盲目的相信共產黨，再也不受騙了，肅反時我很憤慨（？），現在斗錯了這麼多‘好人’，我對良心不起，現在我在明白，在肅反運動中入黨的黨員都不是好人，是踏着別人的鮮血爬來的。今天有點良心和正義的

青年誰能容忍。”

“武大肅反是有些錯誤，違反憲法，集中了一些人，（後來逮捕是法院委託辦的），集中也不是完全爲了監視，而是怕他們自殺。被查的人不是沒一點可疑的地方，領導沒斷定他是反革命，要搞清楚，就得查，當時是有一定材料，但不足證明他是反革命。我們搞錯了，但沒交代。有人說肅反就會有錯誤的說法我不同意。”

“武大肅反的缺點多於優點，造成思想沉悶，會上一套會後一套，使青年人學會了掩閉自己的缺點，這和制度沒關係，但和個別黨員有關。”

“武大的肅反，我認爲副作用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說‘劃分了敵我界線’，劃了個什麼？對好人劃了界線，說‘查清了歷史’難道沒有別的方法，非鬥不可？武大的搞法，我認爲是違反憲法的。”

“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基本的，我想沒有人會同意這個公式。水利學院有一個老師說他們學院百分之九十五是搞錯了。我系老師反映，我們學校錯了百分之八十幾。肅反時八十個還不夠，說應該有100多個，後來湊了95個。受了慘痛遭遇的是一生不會忘記的，直到進棺材。”

“要估價肅反成績，要從一個班、一個系開始，一直推論到全校全國。俄文系沒有搞出一個反革命分子，全校也一樣。所以肅反成績是次要的。”

“說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要拿出事實來，否則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採取對反革命份子的辦法來對付有歷史問題的人那能說是有成績嗎？如果說在一百個斗錯了的人中，只有一個是反革命那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嗎？肅反時我整理過材料，那是些什麼東西，今天叫人想起來真寒心使人感到是恥辱。肅反時我是積極份子（？）參加過武漢市高等學校的積極份子大會。武大肅反錯誤，×××和×××也負不起這個責。整個武漢市高等學校是×××搞的。肅反錯誤是全國性的，是黨中央的錯誤。武大錯了要檢討，武

漢市錯了要檢討，黨中央錯了，毛主席也要檢討，說沒錯要拿出事實來。”

“爲生者伸冤，爲死者哀悼。

得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關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鴉鵂雨，山山虎豹風；斗氏如斗敵，‘領導’是元戎。

註解：我們現在已不是老殘時代，然而却有比玉賢太守更爲殘酷的‘領導’，在那偉大而傷心的日子裏，在我們武大有些違反黨紀國法喪盡天良的人們，就在我們莊嚴肅反的旗上，塗上了腥紅而陰暗的顏色。”

“人死去了，這是無法補償的，即使把全世界給我，也彌補不了這個損失”。應該向死者的父母和當地羣衆公開道歉。“教授自殺的至少應賠5000元，學生自殺約賠3000元”。

“以前共產黨錯殺了幾十萬人，現在也要殺他們（指共產黨）幾千。”

## 仇恨咒罵社會主義，宣揚、嚮往資本主義

“我家是富農，有農具，滿可以很好生活，政府要強迫我們加入合作社。1954年很糟，現在好了一點。農民是強迫參加合作社的。”

現在公私合營的商店服務員的態度不好。解放前服務態度不好，就會受到老板的解僱；解放後，國家一概包下來，沒有自由競爭因此他們的服务態度不好了。”

“公私合營質量下降，糟得很，現在買條毛巾只能用三個月，怎能說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我談事實，我背不得很多教條，只背得一條‘從事實出發’，自願原則則是民主，北京條件成熟了，就進入社會主義，而南方看到北京如此，而條件不成熟就跟着走，大家不同意，就認爲別人是反革



命，不加進去就會完蛋，不得不這樣，手工業合作社長搞好，工資由八十元減為四十（中央糾正了）”

“社會主義很沉悶，很單調，扼殺了個性自由，不能很好的發展”。“在社會主義陣營，人都培養成了一個樣子”。“將來的少先隊員長大以後都是教條主義者”，“我們從舊社會來的人還有一些”。“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面，只有平等而沒有民主自由，在資本主義裏面，有自由，但平等不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個人只要有才能，願苦幹就有辦法。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呢？不行，一切都要服從組織分配，我決不滿意這個‘東西’。對於社會主義我也發生懷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後說不定還有個什麼社會哩。每一個社會的執政者總是以自己的社會宣傳成不朽的；資產階級把資本主義說成不朽的，共產黨也把社會主義說成不朽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並不可怕，關於危機我們已經叫了一百多年了，但現在資本主義還是存在的，而且今天還在發展”。“談到社會主義發展速度快，資本主義發展速度慢的問題，‘這個是當然囉，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比如說現在有一百個工廠，他再建立十個工廠，就增加了百分之十，可是我們社會主義呢？就有一個工廠，又建立一個廠那就增加了一百之一’”。

“我個人並不贊成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我覺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要長期共存的，我想資本主義至少要和我們這一代相處下去。當然囉，由於歷史發展的規律吧，資本主義是必然走向滅亡的，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但是這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要想把理論變成現實，還須要作巨大的努力。我曾經這樣考慮過：在本世紀的下半世紀我們還很難看到資本主義的全盤覆沒。資本主義直到現在還是強大而很可怕的敵人。也許我對資本主義的估計比較高了一些吧，我認為它還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說一下子死不了。固然，報紙上經常宣傳，說大英帝國什麼日漸衰落囉，搖搖欲墜囉。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大英帝國是搖搖欲墜，可是三、五年還斷不了氣，而且這還是跟她過去的情況相比較而言的。英國是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大不如從前

了，但這並不能說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毫無進步。不管英國也好，法國也好，事實上是有發展的。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科學技術也有了很大的增長。當然不能空口說白話囉。原子能發電站是蘇聯第一個建成的，發電能力是5,000瓩，以後不久美國在北滿的哈爾濱也建造了一個原子能發電站，發電能力是100,000瓩，而且以後還要繼續建立；而且在重武器的生產方面也很注意。報紙上常常把美國說成一個破落戶，其實這個破落戶，也不可忽視。法國也是值得注意的，也在那里搞原子能發電站，以新的裝備和新的技術革新國民經濟部門。不要把他們估計過低。更可怕的事實是東方有個日本，西方有個西德。日本在最近幾年來的發展是很驚人的，去年日本的經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號稱達到了日本資本主義史上第一個最繁榮的年代。在去年，日本的造船業達到了世界第一。日本的人造纖維，日本的紡織工業，日本的化學工業，都有非常驚人的增長。在最近幾年來，日本的資本家，或者說壟斷集團吧，對工業投入了大量的基本投資，他們對工業下了本錢，而且很捨得下本錢。所以這是日本這幾年來經濟發展得很迅速的有力的證據。當然，我們的報紙不大報道這樣的事實，對於我們近在咫尺的日本三島，過去一直是忽視它的。日本現在已經是我們很可怕的一個對手了，我們應當看到這一點。另外在西德吧，西德最近幾年來，它的工業發展也很使得美國和法國吃驚，現在在西歐市場上西德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力量了。西德在軍火工業和機器工業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天西德和日本，一個在亞洲，一個在歐洲，已經形成了帝國主義集團中間兩支新起的力量。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這說明資本主義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現在我們從理論上把它叫做進入了‘總危機’的時代，在生活水平方面，在絕對數字方面，有很大的增長。最後我還談談美國，美國現在是帝國主義陣營的首腦，過去我們好像害怕自己有崇美思想吧，不敢談到美國的工業，對美國有些東西怕談。不過我覺得有些東西既然事實，那麼在事實面前閉上眼睛也沒有必要。不敢面對事實，我認為那是胆小鬼。可以談談這些問題。我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科

學是有很驚人的發展的。當然，由於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在有些方面限制了科學的發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需要準備戰爭，它需要獲得利潤，所以在追求戰爭，追求利潤的沖動下，也能夠刺激科學的發展。我看到幾篇報道，談到關於美國建設原子能發電站的問題。現在蘇聯已經建成了一個，準備建第二個，但是美國現在準備建多少原子能發電站呢？準備建15個，包括各種類型的原子能發電站。在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方面，美國大大超過於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說，拿鋼來講吧，美國年產量達到一億噸，蘇聯只三、四千萬噸，中國只三、四百萬噸。我算了一下，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鋼產量加起來，僅僅相當於美國鋼產量的一半，或者多一點。如果我們要趕上美國的話，不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所能辦到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就拿汽車的產量來看吧，這個數字是兩年前的數字，就是在55年，美國汽車年產量達到六百萬輛到七百萬輛，當時還是美國的汽車工業處於不景氣的狀態，就是生意不好，馬力還開的不足。據熟悉汽車工業的人講，美國汽車工業潛在能力很大，每年開足馬力製造一千萬輛不成問題，就是在開動不足的情況下，每年都可以生產七百萬輛。那末我們看第二個國家吧，就是英國。英國汽車產量是佔第二位的國家，它跟美國比較差的很遠，英國的年產量是一百萬輛，只相當於美國的七分之一，後面按次序排下來，就是西德、加拿大和法國，它們每個國家每年的產量大概幾十萬輛的樣子。蘇聯的汽車每年產多少，我不知道。那末中國是可憐的，第一汽車製造廠修成以後，今年只生產四千輛，那末，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設計能力，那還是兩、三年以後的事情。就中國汽車工業目前的情況看，要趕上美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另外，在石油方面，在電力方面，在有色金屬方面，美國的產量也是很大的，包括戰略原料吧，美國目前在很多方面還居世界第一位。再我們看看美國文化發展的情況吧。當然，我不是指好萊塢的電影，不是講這些事，就拿電視廣播台來說，美國現在電視廣播台是三百個，全國有三百個廣播電視台，蘇聯是九個，其他的國家呢？有三個的，有兩個的，有一個的。把全世界電視廣播台加起來，還不到美國的五分

之一。另外，從報紙上看到美國很努力於製造核子武器，比如說，洲際導彈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前不久我看到報上談到這個問題，就是美國製成了一種橡皮飛機，這種橡皮飛機可以帶到身上走，把它摺好帶到身上，自己要想飛就把它打開飛上去，可以帶到八千公尺的高度。另外，在美國出現了公路城市，是沿着一條公路幾十里幾百里，形成漫長不斷的城市。我講的這些東西，決不是吹噓資本主義的文明，決不是號召大家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我講的這些東西，說明什麼問題呢？只是說明我的一個論點，就是我認為資本主義在目前還是有很大的生命力的，直到目前止，還是社會主義一個非常可怕的敵人。為什麼我要強調這一點呢？就是因為過去幾年來，我覺得我們國家裏宣傳工作存在一個根本的偏向，也就是一個錯誤吧。一個什麼錯誤呢？我感覺到解放後很多年以來，我們對於資本主義這個敵人重視不夠。那末，在整個社會上造成的風氣就是資本主義不堪一擊，資本主義是最腐朽的制度，是最落後的制度，好像三天兩天就要死的樣子。那末，在報紙也好，雜誌也好，在書籍上也好，都引一些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包含着矛盾，什麼它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性，總是這樣講，講它總危機要來了，講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這是過份從理論上來分析資本主義，而很少聯系到資本主義活生生的現實來闡明這樣一個問題。我感覺到很長時間內我們生活在真空裏面，就是生活在理論和教條裏面，不大了解資本主義活生生的現實到底是怎樣。我認為這一點對我們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為什麼呢？因為過底的估計敵人就容易使自己放鬆警惕，就容易使自己麻痺，你說資本主義已經日落西山，氣息奄奄，那我們還需要努力幹什麼呢？你說資本主義不堪一擊，那我們至少會對資本主義放鬆一點。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養成了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不願意談資本主義的成就，就不願意談資本主義某些優越性，好像你一談，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自認為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是怎樣呢？只說社會主義好哇，資本主義不好哇，就是擁護社會主義。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認為真正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是要使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這樣的人才是

真正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我們戰勝社會主義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戰勝資本主義，首先要研究資本主義，就是對資本主義保持高度的注意吧。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發展，對於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於它的政策密切的注意，就是了解敵人在那裏做些什麼。敵人在那裏睡覺嗎？他們也在為保衛他們的制度來作垂死的掙扎，就是他們有很大的瘋狂性吧！我們不認識這點。我們每天坐在家裏，把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拿來翻開一看，好像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到來，於是就感覺天下太平。我覺得這對我們青年一代沒有什麼好處。你說是不是宣傳了資本主義優越性就喪失了信心了呢？就害怕了呢？也不是這樣。我們現在中國很貧窮很落後吧！但是我們整個國家是有信心的，我們並不因為我們貧窮落後，比資本主義苦，那末我們就向資本主義投降，我想我們中國人民決不會像這樣做吧。正因為我們感覺自己差，感覺我們處於不利，我們更要努力趕上人家。在這方面適當的把資本主義國家建設成就向國內介紹一下，引起人民的注意，引起有關部門的警惕，我認為是完全必要的。你要戰勝敵人，你就必須了解敵人，敵人發明了橡皮飛機你還不知道，飛起來你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敵人在原子能方面有些什麼成就，我們過去不大談的，但是，同學要問：報上沒有登，你怎麼知道的？我就直接在報上看到的，不過很小，就是只有豆腐干那麼大一點，很不引人注意，要是馬虎一點，你就看不到。過去對於蘇聯的東西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我認為是必要的，比如說，蘇聯建成第一個原子能發電站的時候，我記得我們‘中國婦女’這樣的雜誌都進行了宣傳，使全國婦女都知道這樣的事情，中國婦女、中國青年、時事手冊、中學生，凡是沾了一點邊兒的雜誌都宣傳了；報紙上也發表了什麼文章啦，通訊啦，報導啦，畫了原子能方面的圖解，訪問記，從各方面宣傳。就是宣傳蘇聯的成就，有沒有必要呢？我認為完全有必要。那末宣傳中是不是應該注意蘇聯的東西是主要的，資本主義是次要的，就應該有一個主次之分呢？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如果在宣傳中不注意這點的話，那就是犯了錯誤。如果現在用第一版頭條的消息宣傳資本主義的成就，那是錯誤的；但是連

八版八條也不宣傳，那是更大的錯誤。那末這些情況在過去更嚴重一些，知識分子不敢開口，不敢談到資本主義某些科學的成就，害怕人家扣帽子；相沿成風，成了風氣，誰也不敢談，我認為這是我們國家一個很不正常的情況。這有什麼可怕的？談一談對我們只有刺激作用，感到我們現在很不如人家，努力趕頭趕上，若是夜郎自大，我認為這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我認為今後在主要宣傳蘇聯的同時，也應該拿出一定的篇幅來報導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特別是着重報導資本主義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成就，使全國人民都了解，了解世界大事，了解這兩大陣營都在拚命地向前趕，都在競賽，現在是誰趕上誰的問題。那末，我就覺得有這樣的必要。每年每國的經濟數字，法國、英國、日本的都發表一下，這並沒有什麼不必要，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把這些數字跟我們的比較一下，看看我們趕上他們還需要多少年，還需要作多大的努力，把這個向工人、農民，向知識分子宣傳，是有好處的。當然，這點在目前有些改進。比如說，科學院已經辦了些雜誌，像‘科學消息’，‘學術界’這些東西，不過這些雜誌比較專門，一般的讀者看不到，有些也看不懂，是不是儘可能通俗地把它介紹一下。總的論點，我認為資本主義還是一個很強的敵人，目前為了戰勝它，就必須了解它。附帶談到國內目前不敢談資本主義是一個缺點。主要就是這麼幾個論點。”

“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都是社會主義制度必然產生的經濟危機，不光是資本主義會產生經濟危機，就是社會主義也會產生，因此不叫經濟危機，叫經濟破產。我國也有經濟危機的象徵，並且已有經濟危機，如河南物價上漲，採取幣制改革的辦法來制止經濟危機的出現，這種辦法是短時期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物價逐漸上漲，馬列主義認為是正常的，我們認為不正常，生產力的增長比人口的增長要快些，因此生產品更多些，應當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物價不應上漲即應下降，哥穆爾卡在中曾談到波茲南發生‘經濟破產’，這是什麼原因，是受戰爭的影響嗎？若是戰爭的影響那戰後一、二年就可發生，顯然不是戰爭的影響。有蘇聯的幫助經濟還破

產，這是一個疑問，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問題。”

“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原則……但是1949年的革命是在極不徹底的基础上完成的，它帶有丁強烈的封建性和徹厚的農民革命情緒，而在革命理論上則更是幼稚，因而顯然地受到斯大林錯誤理論的影響，中國革命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革命的根本上是建立真正上層建築。可是幾年來，都是令人失望的。”

“解放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酷無情的。現在這個社會太黑暗了！是暗無天日的社會，是魔鬼的社會。”

“生長在這個時代，是我可悲的不幸，若在愛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可望做一番事業。無窮無盡的精神苦難啊！我躺在時間的河流上，讓青春消磨。祖國對我如後娘。我活着為的是自己，父母、弟妹，對於國家和集體，我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

“數天來本人感情已達總爆炸的程度，回憶數年來官僚老爺們的殘酷屠殺，拍馬屁的走狗們，對無辜的人們迫害真是所未見，聞所未聞。今天還是記憶猶新，血腥未散，真可謂之血洗的時代矣！今天是受害者說話的時候了我們要報復。”

### 煉

賜我一寒劍，  
切斷這顆頭，  
頭上有我眼，  
有眼不再見。

賜我一寒劍，  
切斷這顆頭，  
頭上有我腦，  
有腦復何惑。

賜我一寒劍，  
切斷這顆頭，  
頭上有我耳，  
有耳不再聽。

賜我一寒劍，  
切斷這顆頭，  
頭上有我口，  
有口復何苦。

按：寒劍是一種冷劍，是一種陰劍，難防的劍，是毒劍。這首詩我們認為表達了作者真實的思想。然而作者却說這首詩是和他愛人吵

架而寫的，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不僅從詩中看不出有愛情方面的問題，而作者也拿不出旁證來。

“假設協和血戰成功的話，今天的形勢就很難靜觀。大陸不一定完全解放。那時蔣介石太壞了，對自己的力量估計得還不足。”

（按：右派分子仇恨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為蔣介石的失敗表示惋惜。）

##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 工農生活水平

“解放後成績不大，沒有搞出什麼名堂，農民生活提高很少。農民生活苦。農民生活和解放前一樣。統購統銷不好，像糧戶也要繳餘糧，農民要餓肚子。農村政策執行不好”。

“農業合作化後，農民生活更苦了，可能發生問題。農業合作化有很多缺點；好處是有的，就是農民組織起來力量大。政府再不敢像以前一樣隨便扣壓農民了。”

現在的千斤縣都是假的，只不過一、二畝經過特殊培養能增產千斤，就叫什麼千斤縣了。政府查出定產，以產量最高的為標準，是想撈一把。農民生活比解放前還苦，諺一浪的報告不能相信。

政府剝削農民，不過大多數人剝削少數人不算剝削了”。

“合作社沒有增產，農民一年辛苦到頭，連口糧也弄不到……政府把農產品價格壓得太低，工業品價格抬得太高，使農民生活很苦，黨和政府關心羣衆生活只是口頭上體沒有採取行動，在報上關心工人的生活，可是很多工人沒房子住”。

“人民日報報導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消息是‘吹噓’。‘電影’祖國的花朵”的內容不是現實情況，在路旁採取瓜皮來吃的兒童的可憐相為什麼不上銀幕呢”。

“中國農民確實非常苦……，很多同學說這是個別現象，但奇怪



的反映很普遍……。一般農民兩套單衣換都沒有，住的條件也很差。事實是存在的，不承認不解決問題就會找你。工農生活沒有改善，別看共產黨，農民拿起鋤頭，一樣會把它打死。農民生活很苦，無衣無食……我們要為他們的痛苦而奮鬥”。

“統購統銷搞得一團糟，幹部欺上壓下虛報成績，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農民所統購來的餘糧，根本不是什麼餘糧，而是口糧”。

“統購統銷搞得很，由於統購統銷搞得糟，所以家鄉會餓死兩個人（？）這不是個別幹部工作問題而是政策問題”。

“我們村有個老頭，在統購統銷時被氣死了，照上面規定的數字，這個老頭將全副糧食拿出來還不夠。這是農村幹部是農民出身，有點良心，給這老頭多留了一點”。

（按：右派分子認為統購統銷政策是錯誤的。是不符合農民利益的，不合客觀情況，以此來否認和取消統購統銷。他並且以表揚鄉幹部，攻擊黨中央的政策辦法來掩蓋其反黨反社會的本質）。

“共產黨如果不去做工作，三天之內我到農村裏去，一定能發動農民暴動。以前農民叫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回連我回家，情況不同了，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牲口餓死了一大半，幹部作風很壞，有一個老婦人買米，氣起來，對糧食店的工作人員就是一扁担。有一個母親對參加革命的兒子說：你可以騙別人，可不要騙你的娘呀（指統購統銷事）”。

## 其他問題

“實行社會主義有計劃的生產是在資本主義產生了壟斷經濟，發生了經濟危機後，才能實行，但我們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是像南斯拉夫一樣也來進行自由競爭，什麼都可以發展”。

“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應該的，但是不能用犧牲農民的辦法來工業化。現在很多重工業基地不搞了，輕工業又沒有什麼發展，這些錢那裏去了呢，政府應作出交代”。

## 關於共產黨的領導

### 誣蔑丑化黨員和中國共產黨

“我們的時代是最卑鄙的時代，這些人（指黨員）是最卑鄙的人”  
“共產黨員是‘黨棍’‘本頭人’‘沒腦袋的人’，是一羣噴嚏兵，只會搖旗吶喊。共產黨員只有三個作用，吃飯，睡覺，彙報。黨專政就是黨員專政，黨的領導就是黨員領導。共產黨員是無敵個人的背和頭把他們接上去的”。

“黨員是特務，團員和積極分子是狗腿子。黨團員干部卑鄙無恥，沒有良心”。

“黨團員是便衣警察，你們不要說，不然，將成為他們（指黨團員）兼報的資料”。

“黨員簡直是毫無人性”。

“說共產黨員是便衣警察當然不對，但也有道理，少數黨團員確確實實，使人有這種感覺，……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酷的，沒有溫暖！得到的是黨團員虛偽的微笑和沉默，我認為黨團員都是監視我們的人。……說目前有四個等級不對，但確實也有這種情況。如果說黨是最能代表羣衆的，那何必妥協呢？”

“老黨員思想腐化，品質墮落；新黨員有向上爬的思想”。

“黨員以領導者自居，統治者自居”。

“黨員對別人是  $n-1$  甚至於  $n-n$ ，對自己則是  $n+1$ 。對人是馬列主義，對自己是馬虎主義”。

“很多黨員除了黨的紀律外，對一切其他的紀律和法規都不放在眼裏，黨員帶頭破壞法律，黨員就是法律”。

“共產黨員一切都是虛偽的”。

“共產黨干部嘴上取下……虛假成績，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秘密黨報代替了正面的思想教育，妨礙人們的思想自由，大帽子政策普遍存在”。

“許多人（指黨員）都是怕起來的，掌握這條規律，如果我要怕我也怕得起來。胡耀邦不過是四川某行政區的負責人，那麼快的爬到團中央書記，又是黨中央委員，這難道不是毛主席一手拉起來的嗎？鄧小平爬到黨中央書記連任書記，也是毛主席親情的結果”。

“解放後入黨的沒有一個好的，他們都是拍馬屁投機取巧入黨的。入黨後馬上就提拔，提拔後就作威作福，不再謙遜了”。

“黨員有特權，有鐵飯碗。只要他是黨員，不管其有無能力都可以爬上作領導，犯了錯誤也不會受處分，只不過調動一下工作罷了”。

“黨團員是領導的留聲機，劉真（黨委書記）說什麼，你們便跟着說什麼，沒有一點獨立思考”。

“黨員服從組織是盲從。黨團員和他們平時的本人是矛盾的，像兩個不同的人。許多黨團員，特別是黨團干部，思想都已經僵化了。中國人口太多，死去一半也是好事，首先要死掉那些唯唯諾諾，思想僵化的傢伙”。

“今天在座的有五個羣衆，一個黨員，就是李榕非沒有打中領導的痛處。周光銘、王文生、孟憲鴻、金樹林入黨以後六親不認，兇狠無比，讓崇台爲貪污作掩護，現在仍居要位，由校長辦公室主任轉爲經濟系副主任”。

張瑞瑾品質惡劣，是鑽進黨的。江樺，人家請他吃飯，他大擺架子，帶三文盒子禮貌在後面。江樺以前在中文系當系主任，拿老教授一樣的最高級工資，就因爲他是黨總支的書記。黨總支並不突出。要他當系主任，是不恰當的。

二區有個共產黨員李文鈞不准人家查共產黨，說什麼共產黨員沒這套。羣衆叫他家住十四號，說他是小徐德庸。有些黨員干部一個人住八間房子，對羣衆却記得緊緊的。省委常務委員，張勃川的行爲（指搬房子）是卑鄙無恥。

“我們單位的幾個黨員都是不學無術的，在1951年的時候不懂業務，到1953年還不懂，到星期天只知道抱抱孩子，弄點肉吃吃。工作幾年以後連商品流轉也不知道”。

“我現在是按干部待遇，這也許是一些阿斗們（指黨員）未料到的吧！但不必告訴他們。老爺們（指黨員）也不知道每日所作何事……他們是在怎樣鬼混（指搞工作）！店中調整組織想必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民謠——‘整風’偶得——

牌子：剛才宣誓入了黨，  
一出會場就變相，  
雖然沒有黨徽掛，  
‘黨氣’橫在額頭上。

專制：唯物主義辯證法，  
‘馬列’住在你一家。

檢查：自己洗香皂，  
秀折別人拿刀殺。

照背：反黨就是反革命，  
反對黨員即反黨。  
老子的妻是黨員，  
誰有意見孤快靜。

開會：一句不合你的意，  
拍桌一跳二缺一。  
羣衆有話不敢說，  
冷看你唱獨腳戲。

（接：這些諷刺詩是諷刺黨員的，把黨員比作貴族，這反映了作者對黨員的刻骨仇恨的心情。）

“黨員啊！  
想學什麼就學，  
一切可以自由選自由做。

羣衆啊！  
把你往那調你就得往那里坐，  
還有什麼可說？

黨員啊！

不合志願，心情痛苦，  
又何必知道？

可樂！可樂！

宗派，特權，樣樣齊全”。

羣衆啊！

“黨員品質不好，業務也不好，以肅反起家，起了‘打手’作用，無論什麼人，都給他們一沖、一打、一罵。他們是造孽的專家”。

“有些黨員被反革命（指共產黨）利用了，迫害正直的人們”。

“馬列主義應該堅持原則，但我們學校的黨員却堅持錯誤，如三反、肅反。

“你們（指黨員）不把羣衆當人看待，不爲羣衆服務，你們是老爺”。

“我很憤怒，聽了揭發，我感到（武大黨的）每一角落都腐朽了！劉真說，大多數黨員是好的，壞的是個別的。但大家揭發後，我懷疑壞的是多數。領導上放幾一些品質壞的做骨子，我認為這些壞的能力及又不行，爲什麼（這次）不能開除和肅清？黨員對羣衆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政命令多，說服教育少。許多人感到，在武大，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變成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把整個黨與黨員混爲一談，認爲羣衆批評或反對某一黨員就是反對黨，反對黨就是反革命。黨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樣自然會造成羣衆和黨的隔閡。武大的黨員大多數都是品質惡劣的。經濟系的黨員有五大特點：（一）自高自大，脫離羣衆；（二）自私自利；（三）宗派情緒特別濃厚；（四）特別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五）對系內事情包而不辦。經濟系黨支部的特點是：若有若無，若明若暗，無所事事。他們（經濟系黨支部）根本不做黨委交來的工作”。

“黨員是老爺，羣衆是小子，一般黨員均是‘小三害份子’。”

“共產黨把我們老百姓都搞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共產黨是法西斯，是龐然集團，是殺人不見血的特務。現在比國民黨還不如。共產黨說得光明，做得黑暗”。

“黨現在已成了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那裏有黨，那裏的新生力量就受到壓制。你，民主黨派也別參加了，很多黨員都在民主黨派裏面，民主黨派也是不自由的。到處一團糟，天下的烏鴉是一般黑”。

“一個黨在革命起初是很進步的，可是當它上台執政以後，就保守了，就落後了。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在抗美援朝以後威信一天天下降了，走了下坡路。假使在經濟建設方面搞得不好的話，人民早就起來革命了”。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水平太低了，不像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

“黨內的領導，就是舊社會的家長式的統治”

“幾年來共產黨掌握全國軍隊和政權，要殺誰，就殺誰把中國搞成個黑暗王國”。

“共產黨害怕真實，不論文學創作或新聞報都是這樣”。

“假使黨能更好的領導建設，就要對壞人壞事作鬥爭，對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要加以改革，幾年來民主生活很不夠，徐悲庸統治時代的武大是‘無權的武大’，我們提意見是沒有用的，徐悲庸走後，江楷繼承了他，積習未改，至今仍有李文鈞這樣的小徐悲庸，今後，應當有一個民主傳統”。

“歷史上的舊時常開明一點的‘天子’，曾有過‘懿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讚譽，我們當然不能拿黨來和封建王朝開明的天子相比，但是黨是不是也應該‘懿達大度，從諫如流’呢？我以為是應該的”。

“人們對自己的兄弟姊妹犯了錯誤，決不會冷淡或視，不會虎視眈眈，更不會幸災樂禍，隔岸觀火，而黨對於我們，似乎只要犯了一點錯誤，就一開閘開，就遠起來”。

“武大與別的單位不同，別的地方對人鼓勵很大，但武大對一些解放前後都積極的分子，根據不充分的材料予以打擊，這很使人傷心”。

“校內發現的大量反動標語（1956年10月），是它們（指共產

黨)的陰謀陷害”。

黨明地不敢殺我，暗地想用藥毒死我(按：右派分子認為廚工分來給他分得少些)，多麼殘酷啊！真是殺人不見血的特務。明有有個方孝儒，國民黨時期有個宋丹萍，現在有個我”。

“武大從徐悲龍到張勃川時代都是一團糟，我們的青春就是在塔山山上消逝了！”

“武大的黨麻木不仁，黨員做黨委的應聲蟲，黨員都是木頭，黨沒有力量領導團的工作，因為黨自己還弄不清是非，而團員的辨別能力並不比黨員低。黨沒有作過一次像樣的黨課，我從來未見過這樣散的黨。說黨中央能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我不懷疑，但說武大黨能領導武大我懷疑，我百個懷疑”。

“武大黨委改組，人事佈置是十八羅漢換座而已。……舊黨委威信掃地，不敢上台講話，只有劉真一人，單槍匹馬。由于領導力量薄弱，這次學習到現在，只就黨委問題是否解決得了？”

“黨委成員庸庸碌碌，因此害怕筆墨揭露，欺騙羣衆，這說明腐朽透頂了，就這次運動是黨委領導的，實際是羣衆自己爭取的”。

“武大的黨已經是無能無力了，它是一個被‘三害’份子所操縱的黨委，這個黨委已經不能領導我們的運動了。在我們學校裏我感到黨總是有些以統治者自居似的。……既然統治者(指武大黨委)是這樣，那我們談統治者能夠忍辱吞氣，藐視無恥嗎？”

“我們的一生……幸福……幻想……期望……未來都會被這些人(指黨員)毀于一旦，我們可以說它們活活被死，可以被他們鬥爭禁閉，他們的雙手沾滿死去的無數青年男女的鮮血，沉痛的父母的眼淚，而他們……還要統治，還要領導，還要教育，還要考驗。……黨員成了過街老鼠，……假如要罷職我舉雙手贊成，要鬥爭我堅決擁護，……官僚主義的罪大極了，與我們的仇恨不共戴天。過去他們整人如麻，大興阿房宮，並雷厲風行，而今天搞到自己頭上，一切要從團結願望

出發……”。

“黨吸收黨員不是要求進步，有正義感，而是要求能夠執行其命令的奴才；如果命令是正確的還好，如果是錯誤的，則抱着善良願望的人就成了幫兇”。

“發展黨員也是接受那些不提意見，天天找支書彙報的那些人入黨，結果很多人，特別是解放後入黨的都是一些靈魂里面很毒，自私自利的人。”

“去年有一位品質很壞的人，領導為了準備吸收他入黨事先偽造材料，硬迫羣衆選他為先進工作者。結果此人不但未起到積極作用，反而使黨的威信低落，連黨內都有意見。在武大入黨的人，人們並不向他學習。我對×××的人黨是很有意見的，為了培養他入黨，指定他為先進工作者，並替他偽造材料，他當時新文學史稿還沒有出版，就說出版了。黨要幹什麼人，就要為他搞什麼名堂，選先進工作者是活見鬼，要幹和清剿一樣，欽賜文王公，現在牙明是賜約，還要說是羣衆選的”。

“再談談政治上人爲的不平等待遇問題。當然，對於某些具體問題，黨內外是可以有區別的，羣衆沒有必要而且也不應當知道黨內一切問題。但有些事不儘不合理，也不策略，不聰明，如傳達一個報告，傳達的內容完全一樣，却要分黨內黨外兩次傳達”。

“發展黨員是不學無術，俯首貼耳的人，對於有些聰明才智，有個人見解的人不發展，……黨的發展不得人心，我不願在武大入黨，在武大入黨不是光榮，而是恥辱，黨就是吸收我，我也不入黨”。

“武大的團不知道干些什麼事情，只是在運動中出來助威，作黨的‘打手’，別的就看不到什麼了”。

## 挑 撥 黨 羣 關 係

“有人反映，武大黨員與羣衆的關係，似乎有點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這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似乎只有黨才是‘我’，黨以外的都是‘敵’，對老教授的不尊重和蔑視，實際上也是



是如此。在某些黨員的心目中，似乎凡是從舊社會來的都是階級異己份子。從理論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但是事實上，有些黨員總是以統治者自居”。

“目前，‘人人相見呼同志’，似乎比較習慣了。但這習慣的養成。也有它自己的一段艱苦奮鬥的過程。在解放初期（在某些場合，一直到現在），我們這班所謂‘高級知識分子’，是被黨內外人士稱為先生，這表示尊敬，同時，也表示疏遠。換言之，即孔老夫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是也。以先生稱黨外人士的黨員們，雖然不一定‘讀孔孟之書’，但却在‘行先王之道’，有時不禁使神經過敏的人發生‘內諸憂而外夷狄’之感。

謂余不信，有事實為證：大概是50年，在我所工作的那個學校裏，在某次集會上，一位化學家對一位担任領導工作的老黨員說：‘你平常穿得隨隨便便地，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倒是同志’。這句話當然缺乏‘高度的思想性’，但也沒有什麼惡意，然而這位領導同志却登時勃然大怒了。他正言厲色地訓斥是：‘同志是個很嚴肅的名詞，不能隨便亂用’。於是，化學家摸了一鼻子的灰，羣衆則面面相覷，噤口無言。大概是在55年，在我們學校的一次新黨員入黨的支部會上，當那個被審查的人通過以後，一些黨員當時就向他祝賀，說他今後是個同志了。這就使我們這些來賓先生不能不被迫承認：我們並不是同志，在許多場合，先生和同志這兩種稱呼，是非黨人士處境的非常靈驗的溫度計。如果忽然你是同志了，那麼你大概被認為是對勁的，如果忽然你又變成了先生，那麼，你就趕快作思想準備吧，大概在目前或不久的將來，大小總得出點事兒”。

“有許多陳舊的或不明確的概念仍然在社會上流行，有些東西，對團結到敵人腳跟前的方針政策來說，仍然存在著抵觸，對於發動全體人民獻身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來說，仍然是一種障礙，有待於繼續研究改正。

例如：共產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個提法，顯然就包含了另外一個概念，即廣大的非黨人士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在當初，這個提法，或許有某種理由，而在今天正繼續使用，就顯然是不科學的，不合事實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主要是決定於每一個人的革命實踐，而不是決定於他有無黨證。沒有黨證而全心全意地為社會主義事

業獻身的戰士，何止千千萬萬，難道他們倒是普通材料制成的，而劉世吾，韓常新倒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嗎？且不說這個提法不科學，不合於事實，就算真是如此，在中國六億人口中，只有一千多萬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其餘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我看，將這個事實記在歷史上，也不見得多麼光榮。

當然，我們絲毫不懷疑工人階級以及他的戰鬥先鋒隊——黨在人民生活中的具有決定性的領導作用。但‘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種自吹自擂的提法，多多少少使人感到有些宗派主義的排他性。這，在今天的革命形勢下，不能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沒有加以保留的必要。

從這裏，我又聯想到另外一個名詞：紅色專家。這個名詞在辭典里還找不出。因此不能知道它的‘定義’。推想起來，可能包含下列兩個有區別的意義：第一、指持有黨證的專家；第二、指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從事工作，來為人民服務的專家。

如果是指後者，那麼，我想，現在中國的紅色專家是不不少的，這個觀念也是能為大家所接受的。但是很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也是那一位不許非黨人士稱他為同志的老黨員，曾經在我們的學校裏對黨員發表過他非常著名的演說，大意是勸勉青年黨員們努力爭取做個紅色專家，這是很好的。但同時，他又非常精彩的說：那些舊知識分子，即使進行，也不過像半老徐娘臉上擦胭脂而已。當然，這位老黨員現在也進步了，決不會再說這種怪話。可是，從報紙上所討論的‘先專後紅’，‘先紅後專’，‘專紅並進’等問題看來，所謂紅、就是指入黨。那麼，紅色專家，顯然是黨內專家的同義語了。

把專家分為黨內的和黨外的，並沒有什麼毛病。但把黨內專家稱為紅色專家而將黨外專家歸之於專家或無色透明的專家，却有問題。

我們知道：紅色，在這裏，並不是一個美學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它是與白色相對的。紅色代表無產階級，而白色則代表資產階級。

在中國人民中基本上已經只有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這三種人的今天，在全體知識分子已經以自己的知識來為工農服務的今天，

我們有什麼根據認為他們是非紅色專家呢？這樣的區分，除了削弱他們的積極性之外，又有什麼其它的效果呢？

以有無黨證來區別一個人是否紅色專家，和以有無黨證來區別一個人是否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樣，是不科學的、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們都知道：高爾基、魯迅、郭沫若以及其它許多人，並不是共產黨員，但却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名符其實的紅色專家。

黨員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民中間的少數，否則黨就會失去其戰鬥先鋒隊的作用。但馬克思主義者卻可以是人民中間的多數。如果不用黨證來區別，則紅色專家也必然會逐漸成為專家中間的多數，黨當前的迫切任務之一，則是促成這兩個多數的早日出現。”

“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就像宋代的政權一樣：就是把所有知識分子都籠絡到自己手裏面來，高官厚祿，只要你老老實實不講話就行了。去年黨對知識分子的政變有了改變以後，曾在新華書店設立了教授實驗室，在理髮店裏教授可以憑證優先理髮，但這都是些小節，知識分子並不在乎，只要把知識分子當人，不要整他們就夠了。”

“共產黨的思想統治很厲害，比希特勒還厲害。共產黨、毛主席有一手，對知識分子過去是打，現在是拉，又是打，又是拉。要想搞出名堂來，必要時，打進黨內去！”

“胡風這個人太冒失了，過兩年搞就好了。”

“有的校、院長對學校裏的事，是‘一問三不知’；有的院長、科長指揮不動一個是黨員的工友；有的系主任和教務組主任連自己系內、組內有多少教師也說不清。助教的留用，留學生的選拔，教師的開課等，非黨的系、組主任無權過問，甚至像全國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題目彙編之類的文件，也在‘保密’之列而不讓一般非黨員的教師看。所有培養提高和加薪的機會，也是黨員在先，非黨員在後。

總之，政治第一，業務第二。而所謂‘政治條件’又僅以是否已取得黨、團員的稱號為唯一標準，而不問其是否真正具有黨員的高貴品質。武漢大學的法律系和經濟系，有不少課程原由非黨、員的老教師担任，教學效果一般也不壞。但一旦從人大回來了黨、團員青年教

師，老教師就得退位。老教師有的被迫改行教外國文；有的被打入編譯室、鑽古董、搞資料編譯工作；有的被派充青年教師的助手，替青年教師編講義、寫講稿、解答問題，只是不讓他們上台對學生講課。結果怎樣呢？老教師固然因用非所長而垂頭喪氣；青年教師也因經驗不足，根本不願幹，弄得精疲力竭，焦頭爛額”。

“我黨黨員具有無限的優越感，特別是對於老教師更是如此，為什麼把法律系十幾位老教師當作皮球踢來踢去？是不是認為法律科學是黨性很強的科學，因此只有黨員才能教呢？法律科學雖然是黨性很強的科學，但決不是宗派的科學，為什麼一定要黨員才能教？”

“某些黨員‘氣焰萬丈’。某些人民大學畢業的又是一個‘氣焰萬丈’，所以有些人就成為氣焰兩萬丈了……”。在今天事實上，如果是離開了蘇聯專家的講稿就不能講第二句話，學生是不會滿意的。法律系這一年的教學效果，是令人痛心的。當然，老實說，我現在的處境，還沒有遭到其他老教師一樣待遇，而且還受到某種程度的‘尊重’，但是大勢所趨（按：這裏所謂大勢所趨，意思是指老先生將來一個個都會被調離教學崗位。這完全是他故意挑動人心的杜撰）。瞻望前途，也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共產黨對出身不好的人，不信任。”

×

×

×

“武大這座銅牆鐵壁，把八分作三個方面了：黨員是甲方人員，黨外的知識分子是乙方人員，還有一些積極分子是丙方人員。這些積極分子是鐵牆的積極分子，因為黨員從來不與黨外的知識分子接近，只是依靠這些積極分子來了解黨外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而這些積極分子彙報的，又不是真實情況，而是為着表示自己積極的情況，這樣一來，這座銅牆自然是愈來愈加厚了。”

“關於黨羣關係問題。大家都要拆牆，我認為拆牆首先要明辨是非，武大形成了一種很不好風氣：‘假積極分子幫倒忙’。有些人對上阿諛逢迎，對下欺壓，這種人甚至鑽到黨內去了，這樣就使羣衆與黨的距離更遠。這些上拍下壓的人，在每次運動中，都很活躍，給黨的工

作反而帶來損失。羣衆總結了這批假積極分子的人黨術有五條：（一）三年不提意見；（二）一切‘體會’導領意圖，察言觀色；（三）常跑人事處接近當權派；（四）重點走一人門路；（五）通過親戚，或夫妻關係。”

“解放前入黨是靠拼性命，解放後入黨是爲了自己升官發財。他們躲在別人身上提高自己。我在清華就看到很多同學自己爬到了黨員，而把別人踉下去。解放後入黨的都是靠搞運動做打手起家的。”

“積極分子是‘王八旦’，專門揣摩黨的意圖。羣衆說積極分子都是踏着別人的屍體爬上去的。”

×

×

×

“我校選助教，選留學生，差不多是黨團員包干，羣衆連5%也沒有，是不是說羣衆的政治水平都很低，低到連當助教，當留學生都不行呢？其實過去所選的留學生和助教，水平並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在這一點上，至少不是大公無私的。×××留下來是作樣子教育羣衆的。助教都是黨團員，羣衆沒有一個，這是黨團知識。”

“解放後，黨不是引導青年走正路，不是教育青年辨別是非和真理，却走的是壞路，是長此下去看不到正義。不要培養青年趨炎附勢，武大培養青年就是這樣。我覺得應該改變教育青年的方式，應該讓青年用自己的腦筋思考問題。”

×

×

×

“我們民主黨派是陪襯，起不了什麼作用。我是前幾年加入九三學社的；居然有人把這個民主黨派當成商店，問九三學社是否是公私合營的。羣衆不了解這個組織，報上宣傳得也不夠，‘人民日報’談到某些人的模範事蹟，只提他是黨團員，從不提是民主黨派成員。”

“過去民主黨派一向是裝飾品。運動中的體會，民主黨派不僅要爭鳴而且要爭主。”

“可以擴大民主黨派作用，作黨的助手，如果問題發生爭執，可以向上級反映。如華中師院（民主黨派）要支持學生開肅反追悼會，

學校黨委不同意，結果派代表到省委，省委批准開了一天。

×

×

×

“這一回不僅黨和羣衆分了家，而且黨和團也分了家”。按：（法律系團支部部分同志對劉真同志6月5日的報告有些意見，右派分子就向他們挑撥）。

“黨員有良心對自己的錯誤應該痛心慚愧，……而今天的領導同志看到武大如此之糟，却無動於衷，……像這樣子，共產黨是否能領導人民？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靠搞黨是‘拍馬屁’、‘阿諛奉承’、‘卑鄙’。”

### 所謂“黨天下”

“黨是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有了黨就一定有宗派。共產黨是產生宗派主義的根源。”

“共產黨形成了‘家天下’，大權在握，孤宗統治，上至中央，下到窮鄉僻野，無不在共產黨員的統治和監視下。什麼人坐什麼汽車，吃什麼樣的飯，穿什麼樣的衣服，都有規定。人們被無形地劃分為等級，黨員是一級，團員是二級，普通羣衆是三級，官僚地主是奴隸。……因為我們的黨老爺非階級論者，已往在檔案和鑑定上爲你算了命。共產黨員成了盛氣凌人的高官顯貴。你要申訴嗎？到那裏去申？……黨老爺們會把你當反革命。由於一黨專政和盲目的自大狂，使共產黨變了質；與人民相距一萬八千里。中國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真正名符其實者不到二百萬。歷史證明，沒有任何政黨是完全正確的，任何專制統治到後來總要說人民的憤怒所毀滅。一黨專政無論如何不能把中國辦好的。”

“從中央到地方都犯了宗派主義，馬敘倫的高教部長之職被共產黨黨員排掉後，發出‘懷才不遇’之嘆。”“國務院十二個副總理都是共產黨人，這是有原因的：其一，斯大林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影響。其二，人家辛辛苦苦打了幾十年，搏一個好位置坐坐也是符合人之常情。”

“事實上現在就是‘黨天下’，全國各地方都有黨組織，一切問題都得通過黨組織來決定，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過去國務院還有幾個非黨付總理，現在一個也沒有，這不是黨天下是什麼？”

“我看，事實上，共產黨的領導是金字塔式的，無數的小金字塔疊成大金字塔，每個塔尖上都是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有職無權。”

“我國無黨階級專政就是一黨專政。儲安平的‘黨天下’，我舉雙手贊成。共產黨不給人民作事了，應該推翻它。”

“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國家為黨所有……解放後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翁，但民主權利沒有完全實現。”

“共產黨應該認識這點，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也，非共產黨之中國也，如果中國共產黨把全中國人都到維吾爾自治區，你共產黨也活不了。什麼問題，黨內可以爭論，一到羣衆中間就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共產黨有兩種是非，一種是黨內的，一種是羣衆的。黨成了黨員的親娘，羣衆的後娘。”

“黨的宗派主義是嚴重的，表現在排內排外二方面：排外比排內更厲害，排內是排下而不排上，羣衆犯了錯誤就狠狠的整，黨團員犯錯誤就以組織內部的事為掩護，相互包庇，這和情況是普通的，不是個別的。”

“現在的社會分成三等九級，黨員是最高級。”

“目前高等學校中的校長、院長、處長、系主任、教研組主任，如果正職為黨外人士担任，則副職（或秘書）必由黨員担任。而所有重要決策，只通過黨員系統，不通過非黨員的系統。”

“每個單位都按上一個黨員當領導，把一些非黨員的科長都先後調開了。”

## 反對黨的領導取消黨委制

“共產黨不能領導。共產黨的領導扼殺了文學的生命。誰有學問，誰就作領導，誰就得寫出像我這樣的論文來。不懂學術，領導什麼。什麼黨不黨，黨就會作壞事。為什麼一定要黨呢，讓人民自己來

管理國家吧。”

“共產黨是為了消滅黨而奮鬥的，現在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黨已經沒有必要存在了，應該讓大衆來選舉有能力的人出來當領導。”

“雖然憲法上規定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國家政權，但憲法是可以改變的。我主張將各民主黨派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聯盟，讓它有足夠的力量影響國家機關，對共產黨施以壓力，以五年為期，共產黨搞得不好，就叫他下台！在中國劃一兩個省份給民主黨派，讓它施行自己的方針政策，和共產黨比一比，看誰治理得更好。”

“‘三害’是現象，不是本質。為了徹底剷除‘三害’，就要找出本質的東西。在我們學校裏，我認為黨委制是產生‘三害’的根源；就全國範圍來講，我認為與制度有關。在蘇聯就把所有錯誤的責任都推到斯大林一個人身上（按：他的意思是說把責任推到死者身上）而在中國就把責任推到下面的小幹部，而不向黨中央或大幹部找。現在允許反對的只是小的、支支節節的，而不允許反對大的、根本的東西。”

“一切黨派應該退出學校。黨委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黨委制肯定是要不得的。參加黨委的是那些人最多呢？第一是老幹部，他們文化水平低，對於教學和研究工作更是外行，第二是年輕的黨員教師，他們有熱情，但沒有經驗；這些人組成的黨委要領導這龐大複雜的一所高等學校怎麼可能？黨委在學校不適合，高等學校應該成立校務委員會，請那些有經驗的老教授來領導，現在高等學校所以沒有著作與發明就是黨委制統治的結果。”

“黨委可以決定一切而行政不可以否定黨委的決定，這是違反憲法，黨委制與憲法不合，黨委制排斥一部分人，比黨員能力強的人不能做同樣的工作。”

“黨委領導是制度問題，不是個別人的問題，如孫祥鍾，蕭杰五是教授黨員，他們領導的系應該問題很少，但實際上問題很多，這就說明是制度問題。”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黨委制，這是好的——他們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壞，等到羣衆不提意見就完蛋了。

領導上應該明確一個東西，在學校裏應該依靠專家教授來搞好學校。”

“我個人主張取消黨委制，民主辦校，在學校裏召開師生員工代表大會，這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學校也可以設黨委會，但黨委會不能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的政策通過被羣衆所選舉到師生員工代表大會的黨員帶到羣衆中去。黨只能以自己的方針政策來影響羣衆，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一黨專政。對黨員來說要了解自己是一個普通人，誰有本領誰就當領導，我有本領我也能當校長”。

“黨委制有毛病，從方針政策到行政事務都是黨包辦，以黨代政，在整風運動中把黨紀處分與行政處分混淆起來，例如我們要撤換張弼川、張希光、葉材植……就不能撤換，要經過黨同意。解放以後沒有行使過罷免權，憲法上規定有，但實際沒有，過去羣衆不能有羣衆的組織，在系裏是系秘書來領導系主任，工友也能指揮系主任。

（工友是指的黨員工友），黨委制不能走羣衆路線，是路線上的錯誤，違反列寧主義原則。”

“黨委制是產生‘三害’根源之一，每個單位都安上一個黨員，不管稱職不稱職，羣衆不能撤換，形成了黨員的特權。”

“黨委負責制沒有保存的必要，因為它保證了黨員有地位，這使得黨員脫化，黨委制的基本問題是脫離羣衆的監督，因此產生‘三害’”。

“在民主的基礎上辦校，學校最高權力機關不應該是黨委會，而應該是教工代表大會。教工代表大會是通過選舉產生的，選舉有能力的人來領導，這形式上是取消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加強黨的責任。”

“在民主辦校方面我擁護南斯拉夫的觀點，南斯拉夫在這個問題上有創造性。”

“黨委制問題，如果這個制度只意味着黨的領導，我同意，但如果意味着以黨代政，我就不贊成。我主張在黨委領導的基礎上進一步

擴大高等學校的民主生活。我主張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而這個校務委員會應該採取人民民主的組織形式。包括領導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有代表性的教授；要有職權。這和現在武大的徒有空架子的學術委員會無異之點。這種形式，既可體現黨的領導，又可實現黨和人民民主黨派相互監督的作用。另外，黨和人民民主黨派還可以從學習中加強聯繫，這一點，過去在武大作得不夠。還有，通過組織生活也可以加強聯繫，我建議以後黨和人民黨派基層組織的成員可以交叉參加組織生活以便相互學習，交流經驗。”

“高等學校是進行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地方，領導人要有學術威望，有地位才行。學校可成立一個機構，有黨員也有非黨員，大家都是平等的地位。”

“很多人錯誤理解黨的領導就是每個單位都要放個黨員，不懂也要壟佔個位子，結果工作搞得很糟，不懂就要讓別人來嘛！”

“馬克思說：‘理論一掌握了羣衆，就變成物質力量，’如果說，只是有黨性的人才能領導，就否定了馬克思的指示”。

“北京書簡是右派分子寫的，其中有一句話當時在我的思想中起了一些作用。這句話是這樣講的，說這次運動是一次羣衆的自發運動，當時我特別欣賞那‘自發’兩個字。因為北京大學的運動也是自發的起來的，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是自發起來的，所以我認為自發一下也沒有什麼關係。這個思想發展下去，到以後也就成為不尊重黨委領導，跟黨委對立，單搞一套，最後發展成抗拒領導，與黨爭奪領導權。我當時不相信武大黨委，對劉真同志也不相信，我跟劉真同志打交道也打得不多了，在長期的過程中我感到他的決心不大，魄力不足，所以我當時覺得很多問題不能完全依靠黨，必須要有自己的行動，對黨委來施加壓力。我感覺有些東西需要組織一部分同學，要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做些事情。……在北京大學開始整風之前，我看到北京大學有些所謂是新氣象，北京大學成立了校務委員會，這個校務委員會是作為全校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當時黨委也參加這個校務委員會。那時我記得光明日報曾經登過這樣一個消息，好像是關於科學獎金問

題，好像原來黨委提出一個建議，後來校務委員會把它否定了，這個事件曾在報上大肆宣揚過。當時我感覺這是個好現象，我感覺到解放以後，一個行政機關否定黨的決議，否定黨的建議還是第一次。這裏面體現了一個什麼問題呢？這裏體現了羣衆更負責，對自己的事業更負責，當感到黨委的決議不切實，不正確的時候有勇氣把它否定。當時北大校務委員會把它否定後，黨委也認為是正確的，所以我認為過去黨委負責制，不管什麼重大問題都經過黨委決議，有時就難免不有一些偏差，那末成立一個校務委員會，吸收一些對辦高等教育有經驗的老教授參加，廣泛的聽取他們意見，校黨委在領導全校工作時考慮得更周到一些，避免少犯些錯誤，我認為是正確的。所以，我對校務委員會這個東西是很感興趣的，而且很希望在武大也成立一個校務委員會。我原來搞過中文系鳴放委員會……就是想準備成立以後，宣揚這一事情，而且準備向武大、向湖北省委提出這樣一些要求。

在整風期間，北京大學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他們過去的紀念堂裏面本來擺着羅蒙諾索夫像，後來把這個像弄掉了，而放了一個蔡元培的像，……這件事事情使我很受感動。當然，蔡元培死的時候，我還是一小孩，但當我長大以後，我是深深的感覺到蔡元培在中國近代文化和科學史上是佔據了一個重大的地位，我確實認為蔡元培是一個可以說是相當偉大的資產階級的教育家，自蔡元培當了北大校長那一段時間裏面，他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他的氣魄很大，兼收並蓄，什麼東西都可裝得下去，當時北京大學的學術界出現了一片繁榮氣象，比如像李大釗，像陳獨秀，他們都可以在北大講學。當時蔡元培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認為是了不起的。蔡元培對推進北京大學的學術是有發展的，是有一定貢獻的，因此蔡元培是北京大學的功臣，應該肯定他。因為這個傢伙還想到這樣事情，我想到當時武漢大學學術完全不夠濃厚，在學校裏面對這些有學術成就的老前輩尊重不夠，過去在很多問題上過分強調政治條件，而對有幾十年研究經驗的某一個學術界的權威尊重是不夠的，在我們學校裏頂大名的的是黨委書記、人事處處長這樣的人，而不是某些專家和教授。所以我認為這是不夠正常的現

象。但我並不要求把黨委書記和人事處長打下來，我是認為黨委書記有名、人事處長有名，但是某些專家和教授也應該在學校享有盛名，這就是應該把學校裏學術空氣搞得濃厚一些。在北京大學很活躍。比方開辯論會、自由講壇、辦刊物。有時我很想把這一套搬到武大來，就是很願意按照北京大學的方式吧，把武大所謂改造一下。當時我對北大的東西很欽佩的，但是我考慮到這樣一些東西，恐怕不是武大的黨委所願意接受、所願意努力來推行的，這就應該團結一些同學來宣傳這些道理，爭取在武大能做到這些事情。這就是當時我為什麼要組織鳴放委員會的思想基礎。

另外關於黨委負責制問題在這次整風運動初期，我並沒有發表過言論要反對黨委負責制，我沒有講這樣的話，但在思想上我是想過的。思想上是反對黨委負責制的。”

“過去特別是運動以前（指整風運動以前）武大黨委與羣衆有很大的距離，黨委領導人有心無心地認為自己永遠是正確的。因此，使羣衆不能提意見，也沒有起到監督作用，運動開始以後。類似情況依然存在。對前一階段運動中（指6月5日以前）偏激情緒的不正確估計，黨委檢查仍然不夠（指6月12日劉真同志報告中的檢查），在我看來，過去黨委所以作了不正確的估價可能是聽了黨員的彙報，沒有更全面地了解情況。”

“長時間的機械論（指馬列主義）統治，使得人們在精神上陷於麻木和保守狀態，共產黨員根本就不能領導這次運動得到勝利。因此我們須要發動羣衆大刀闊斧的去幹，……今天單是喊喊共產黨萬歲之類是不夠的。我們要喊理性的原則萬歲，真理的民主自由萬歲，真正的人權平等萬歲。

“沒有經過羣衆（黨外羣衆）選出的黨員，不能直接領導我們，如黨中央書記鄧小平，黨總支青委樊明哲等。”

“胖鶴站敗柳，漣鳴動人心。

春茂殘冬枯，只剩乾骨頭。

春光四季不常在，茂盛年終盡掃除。



國亂民愁，王不出頭離主。  
世平衆觀，我願領導人民。  
讓有能力的人領導吧！

我們不願特務（指共產黨）領導我國人民。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他；

有朝一日嚴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

按：這裏的‘花’是指共產黨，‘青松’是指作者的。

“×××，你不能轉哲學系，你轉哲學系沒有出路，你沒有政治資本。我對他們（共產黨）不滿不像你，我有我的一套方法，不過不能告訴你。我轉哲學系的目的，是研究唯物主義，它並不是得完全受批判，我吸取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精華，創造一種既不是唯心主義，也不是唯物主義的理論。”

“咱們要成立一個組織，多找幾個人，黨支書力量是相當大的，否則搞不垮他們。……你相不相信我，你應當參加我們的組織不要個人行動，要有領導有組織的搞，團結就是力量！”

“現在可以大膽否定過去被肯定的東西，肯定過去被否定的東西了。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並不反對革命！人們說章伯鈞有政治野心，作爲一個政治家，有政治野心是無可非議的。我很羨慕那種有堅強政治信念的人，甚至有反動政治信念的人，我也同樣地羨慕他。我對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也沒有反感。”

### 詆毀毛主席和黨的領袖

“毛澤東是個不成器的東西。豬毛（按：指的是朱德和毛澤東同志）有什麼作用？豬毛只能做刷子用。毛主席五年以前的一個運送殺星很重，那時鎮壓反革命殺了很多。毛主席這五年的運好，不過要有五年不好的運。蔣介石這五年的運不好，不過馬上要有五年好運。”

“毛主席盜竊了我的科學研究成果，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第一個流氓”（按：‘科學研究成果’係指關於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理論問題的提出）。

“毛主席在宣傳會議上的講話糟得很！字裏行間都隱藏着鬼鬼祟祟的吃人的咀臉。”

“毛主席在中央也可能是孤立的，最近看到‘百花齊放’，放了很多毒草，毛主席在中央就受了壓力，不得不把這個報告修改了。”

“斯大林犯了錯誤當時不知道，現在我們對毛主席很相信，誰能保證20年後來看今天的毛主席又沒有犯錯誤呢？”

“毛主席有人呼萬歲，假如我掌握了天下，也有90%以上的人呼我萬歲。”

“朱德，伏羅希洛夫等人沒有權力，因為沒有戰爭，將軍們元帥們沒有用場了，這是：‘飛鳥盡，良弓藏。’”

### 攻擊馬列主義攻擊政治課

“規律是人造的。馬列主義是否是真理，馬列主義是否有階級性，還值得研究。”

“馬列主義哲學不能解釋中國的哲學史。馬列主義哲學觀點劃分唯物主義及唯心主義是以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來劃分的。而中國哲學史很複雜，以馬列主義觀點劃不清，也不能以它他來劃分。爲誰服務的問題也是哲學中的一個問題，馬列主義哲學觀點解釋不通。如孔子他爲統治階級服務，也爲人民服務，到底如何解釋呢？”

“政治經濟學完全是虛造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大可爭辯，有待修正。”

“馬列主義不論在蘇聯或中國都已墮落到實用主義的邊沿，辯證法變成了詭辯術，凡是對我有利的，都是好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經常發生矛盾的，當章伯鈞等人提出調整方案時，共產黨就怕起來了。我說：黨中央整個是右派！”

“馬列主義沒什麼發展，幾十年來都是炒現飯，蘇聯的經濟學家也都是翻來覆去地炒現飯。”

“馬列主義是教條，看起來頭痛，我不相信現實生活中就是這些條條，我要找真理。”

“我們的政治課都是教條主義，搞政治和重視政治的人是政治流氓。”

政治課給人一根棒子。政治課與國民黨的黨義與三民主義是一樣的。我搞政治課真難，是給人一條枷鎖。政治課要選修，馬列主義既然是真理就不怕人不選。”

“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在貫徹黨的思想政策中起了支配作用，使人們的思想受到不應有的束縛。（按：在黨內佔統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是馬列主義，在他看來馬列主義就是教條主義，使人民的思想僵化）例如：搬婦罵街式學術批判，機械思想教育等，因此思想解放成了一個響亮的口號。”

“許多人的腦子都已經教條化，只能整天看看馬列主義之類，看到聲音略有不同者便大驚小怪，此乃庸俗之人。……最近我校有同學到漢口演講、貼標語，市民們將我們當成反革命，這種人真不愧為‘阿Q’之子孫。”

現在人民日報沒有什麼看頭，教條主義佔統治地位，只有文匯報才值得一看，既靈動又大胆。人民日報唯一的優點是幾十幾百年後可以當做一部歷史資料，因為人民日報只知道記錄一些歷史事實，像一本歷史書。”

“當前社會科學都是對斯大林崇拜的教條主義產物，如果有像樣的東西，那也只有到資本主義國家去找。”

“唯心主義在哲學發展中是起過一定的作用的，它起了助長思想發展的作用，它看到了唯物主義者所忽視的事實，它觀察到了不易解釋的現象，它更注意到了不易解決的問題。例如主體有能動作用這件事實為過去的唯物主義者所忽略，而唯心主義者却觀察到了。”

“我發現了一個真理，即二元論是正確的。同一事物這樣看也可以，那樣看也可以，我們去吃飯也可以，不吃飯也可以。”

“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是一定階級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也是一定階級的產物，馬克思一生也不過只說明了一個問題——階級鬥爭，除此以外，別無所有。別人說馬克思主義不朽，我敢打賭，隨着歷史的

變遷，它也會煙消雲散，永垂不朽的只有研究自然科學的牛頓、瓦特等人。有人揭發我說馬列主義是要煙消雲散的。我講過，我現在還在這裏講，馬列主義肯定是要煙消雲散的。為什麼說馬列主義將來會煙消雲散呢？我的論點是這樣的：馬列主義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定階級的產物，那麼馬列主義也是屬於一種歷史範疇的東西。那麼它有它的歷史任務，它的歷史任務完了，它就完了，我們現在喊馬列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都是表示人們對它的尊敬，羣衆對它的愛戴的感戴，你以為真的馬列主義就會活一萬歲嗎？那就是極端的糊塗，其實不會這樣，就是將來的馬列主義也不會像這樣，比如說共產主義建成了一千年兩千年，一萬年兩萬年以後，馬列主義是不會有的，也沒有什麼用處了，當然就可以煙消雲散了。當然，它作為人類的一種思想意識形態，是會保存在人類的思想寶庫里的，就像過去的孔子思想、孟子思想、莊子、老子思想，以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孟德斯鳩思想、盧梭、佛爾泰思想，他們也是永遠保存在人類思想寶庫里的，永遠不朽，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馬列主義也是不朽的，因為這也要放進去。但是如果以為幾千年幾萬年以後還有一個‘馬列主義教研室’，每天講馬列主義，我就不相信這樣，我敢肯定要煙消雲散，事實一定會這樣子！”

##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 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你們不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宗派主義，不要把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了黨專政，這種統治是奴隸主統治，是奴隸主專政。（註：奴隸主專政是歷史上剝削階級最野蠻、最殘酷專政。奴隸主享有一切特權，對奴隸可以任意屠殺，買賣與贈與，奴隸不當作人，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黨員不承認別人有人格，黨員沒有革命的人道主義。因此，由於宗派主義造成黨外老先生和其他的人都變成奴隸。只不過，我們這些人是沒有帶枷鎖的奴隸而已。受到非人的待遇，是活的奴隸。所以我們現在倒退了幾千年。……，這種情況嚴重的影響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壽命，奪去了學生的青春。”

“公安機關是特務機關，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沒有兩樣”。

“無產階級專政應有新的定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和形式可以修改的。”

“應該縮小無產階級專政的範圍，不要專政得太寬了（？）你們不以為專政只是對敵人，而且包括組織組織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建設”（按：他右派分子故意混淆專政的對象與專政的職能，想以此來掩蓋其反動言論的實質）。

“我根本不承認有什麼制度，何況學校的生活制度”。

“我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掌握了政權意味決定一切。……中國目前之制度有巨大的缺陷，因此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不滿。根本并未建立起真正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此事在今天則是最主要的問題。……中國革命之落後性，中國革命有封建

性及略革（按：“略革”可能是指革命革率或革命不徹底。）之情緒，蘇聯個人崇拜之產生是由於帝俄是一個落後愚昧的國家，俄國革命之落後性，當然我不能否定其他原因，然此點極重要也。……你們避開最主要的東西（他指責自己的右派同道）不管，而去和幾個不學無術之黨員爭氣。……只有從根本上將三害根除才能最終解決問題。目前全國爭論最熱烈之問題，如黨委制之問題、黨的領導問題、民主自由人權平等之問題，均極必要。知識青年應將眼光看的更大更遠，大膽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並與全國各兄弟學校之爭鳴聯合起來以形成一個巨流，……”。

“社會主義是多種多樣的，是否有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三害’較少，為什麼‘三害’在我們國家裏這樣嚴重。我認為一顆種子只能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發芽生長，而是不會在沙漠中發芽生長的……。（按：這就是說他認為我國的社會制度是產生三害的沃土。）

“但是我對蘇聯的政治制度，有一點意見。這個意見是由於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後所想到的，當斯大林這個問題全部清楚以後，我感覺到很震驚，在蘇聯這樣的制度下，為什麼會發生像斯大林這樣的錯誤？這個問題各持一端，鐵托同志講斯大林錯誤是制度的產物，而蘇聯說主要由於個人品質即歸咎於個人的原因。那麼鐵托同志那個‘制度’兩個字的含義何在呢？不大清楚，如果是指社會主義制度，那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如果是指的政治制度，那我認為也不能說他沒有一點理由。你說像斯大林所犯的這樣大的錯誤，難道僅僅是個人原因嗎？個人負責嗎？難道說這個制度沒有一點缺陷，沒有一點毛病？這個問題很難令人同意”。

“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害的根源，‘黨天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同義詞，前者是貶義，後者是褒義。從‘三害’的現象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那麼優越。”

“斯大林的錯誤與制度有關，蘇聯沒有國會制，斯大林的權力沒

有約束。資本主義國家有國會，總就要幹什麼，要得到國會批准才行”。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實質是加強人民羣衆對黨的監督，如果沒有這些監督，誰能保證共產黨不再產生三害？三害和三大主義不能混淆，三大主義是每個共產黨員都有，要使三大主義不致發展成三害，就要加強監督”。

“章伯鈞的第一篇文章，提出的只是設計院等問題，並不反動。但你們要靈活解釋成反動的也可以，我最怕共產黨的‘靈活’。我認為由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等四個設計院，設計一些成品（政治上的基本問題），但並沒有決定權，然後交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施行，這有什麼不好呢？人民代表是領導羣衆的，這不民主。其次，人民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如果不得到共產黨的同意，提出來也沒有用。政治協商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是形式主義”。

“章伯鈞的三點建議，我完全贊成，這個政治設計院沒有什麼不好，可以提出政治主張給共產黨參考執行，章伯鈞等人的意見沒有什麼可怕，他們是想把國家怎樣搞得更好。兩院制我也贊成。共產黨提出政治主張就行了，不需要搞什麼組織保證，好的主張羣衆自然會擁護。”

“民主在共產主義會消滅的問題，我認為到共產主義社會以人民爲主還是要有存在，馬克思如果提出共產主義民主票消滅，那馬克思是錯了。有同學說民主的尺度放寬，決定敵我力量對比，毛主席也這麼提，我有疑問，根據此定義就是把民主和專政混淆了。敵人力量大時專政應加強，不該對人民削弱民主，民主是爲了人民的，不是爲了敵人。鎮反以來敵人越少並不是民主，而是專政方式改變了，說敵人強大我們的民主則削弱這不合歷史事實。沙皇時人民力量強大時，沙皇採用的是擴大民主。爲了團結廣大階層反對敵人，我們解放前，爲了打倒蔣介石而擴大民主，加強統一戰線。另外，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提出敵人力量越強越要充分發動羣衆，即充分發揚民主。哲學系同學的說法 and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說法有矛盾，解決問題對今天討論有好

處，對黨的缺點改進有好處，對黨今後制定政策也有好處。

民主是不是目的，是目的又是方法，民主集中制是好的，但以前集中太多，民主太少，民主是對人民的，無所謂放寬。說領導提名是集中了多數人智慧，是迷信的態度，五三年以後像這樣集中就該改變，今天提出擴大民主並非恰到好處”。

“民主是目的，也是方式（但不僅僅是方式），有的人在爭取民主中犧牲了生命，難道他們是爲了爭取一個‘方式’嗎？

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權利是上級指定的。人們意志沒辦法表達出來，人民代表的選舉不民主即是一例。如果在民主權利方向上下沒有配合的好就會出官僚主義。現實生活中民主理論有問題，我不同意民主就是一種手段，這是官僚主義的提法，我認為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說反革命存在，民主不能太多，我們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好人，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沒查出，就讓這麼多人沒民主是不恰當的，如選舉等方面都是例子。過去只強調集中、專政而忽視民主是不對的”。

“只從執行政策方面來說，儘管有黨外人士參加政府共同執行政策，也體現不了人民民主專政，必需從決定政策方面來看，也就是說在決定政策時黨外人士是怎樣和共產黨協商的，如果是共產黨事先做好了一套交給黨外人士照例通過那仍舊是黨專政。……現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有問題的”。

（按：右派分子認爲人民民主專政仍是一黨專政，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是有問題的。他們挑撥黨外民主人士與黨平起平坐。）

“民主集中制好。而具體去看是形式主義。這次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了。以前有意見沒說，現在都說了。以前黨提出什麼就全部舉手贊成，實際上不可能沒有不同意見的。以前人民代表是沒有行使他的權利，不應只是集中，忽視民主”。

“說資本主義是假民主我相信，但是如果說我們社會主義是真民主，我不服氣。現在除了沒有剝削以外，其他的都不如過去好，甚至

還不如國民黨。兩種社會制度並存有好處，我們公有制影響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也影響我們。資本主義政治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民主的”。

“有人說不能把我們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們的民主只在面的表現上比資本主義國家強？深度上是不是比資本主義國家強？”

“美國雖然沒有充分的民主，但是還有民主的形式；而在東方各國，特別是中國和俄國，沒有經過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連民主的形式也沒有，所以斯大林能夠專制獨裁，而中國的農民習慣於封建統治，沒有什麼民主的要求，因此黨員也就可以違法亂紀”。

“……看了錫托同志卡德爾同志的演說後更感興趣，了解了南斯拉夫的觀點，我得出了一個公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加上廣泛的民主自由，等於理想社會。要發展社會主義不是單純的只掌握了政權然後依靠一定的國家權力和計劃機構，還有另一個方面，那就是注意各種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的健全，而其主要內容就是民主自由”。

（按：這是採取兩面手法，跟着帝國主義一個調子唱：共產黨只注意經濟，不重視人民的民主自由。）

“說老子的思想實現了是牽強附會不值一駁，如果吃的好穿的好而沒有民主生活，我們不願過這種生活。如果不要民主，就只是吃飯的高級動物。民主也是目的，大民主也可以用，頑強的官僚主義非用大民主不可。教條我們要，但不要不看事實。”

“社會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民主。在美國，人民可以罵政府，罵總統。可是在我國人民說一聲政府不好就不行。資本主義國家對專政的對象——敵對階級——還給予民主。如工人階級還有選舉權。資產階級民主也能夠反映羣衆意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我還有疑問。國民黨比現在還要民主些，淮海戰役失敗後，就有人能罵蔣介石，而現在不行了”。

“一黨制造成了斯大林的獨裁。多黨制比共產黨一個黨領導要好，因為兩黨要競選，可以刺激他們把工作搞好。艾登犯了錯誤

很快就被糾正，而斯大林的錯誤長期不能得到糾正。中國根本沒有什麼多黨，因為各民主黨派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所以不成爲黨。”

（按：他認爲中國應有與共產黨政治路線完全不同的政黨。）

“資本主義國家有競選制度，競選人發表演說，公佈自己的施政綱領，人民可以自由選擇投誰的票。在蘇聯不是這樣的，大家都要投斯大林的票，但不聽得斯大林要幹什麼”。

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領袖，差不多都是連任當下去，直到死爲止。（馬林科夫例外）這樣你這些人發生錯誤而不自覺的話，就會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不如資本主義國家的競選來得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好，資本主義上層建築好”。（按：這是指社會主義的選舉制度不如資本主義的選舉制度民主。）

“選舉問題：武大是採取等額提名，團、學生會，人大代表都是領導提名，這不民主，我不反對領導提名，但是否同學也可以提名呢？領導可以提名，爲什麼羣衆不可以提名呢？領導說，領導提的名，羣衆不選也可以，但是不能在羣衆中醞釀，又不能讓羣衆提，結果還是領導提的名。我認爲，同學提的名也可以宣傳，他可以發表競選演說，這才是民主的”。

“人大開會沒有爭論，沒有像資產階級議會那樣激烈的爭論，人大沒發揮作用”。

“我們應該實行競選，誰有本領誰就可以選上，波蘭也不是搞競選嗎？（按：波蘭的競選，波共中央已有批判）聯合提名不好，民主黨派有本領就領導”。

“對於選舉，我很有研究，選舉是擇精選華，如果需要五個人，僅僅只五個候選人，就不算選舉。選舉權是自己有權利來選舉自己願選的人，我校學生會，團委會的選舉就不民主，人民代表的選舉也是如此。我們的選舉既不是選舉（像法國經常舉行的投信任票。其不同者。是我們所投的都是‘信任票’），更沒有尊重我們的選舉權。領導提名固然可信，但並非一個好辦法。等額提名更不是好辦法，雖然這樣可

使‘票數集中’，但卻沒有尊重我們的權利。因此，很多人不喜歡選舉，目前的選舉是對人民權利的輕視，是官僚主義的溫床，這已到了不能不改的時候了。這種方式在革命勝利之初是有必要的，可是到今天由於社會秩序基本安定，人民覺悟提高，而越來越顯得不合理了。今後的選舉，如學生會應該從基層提名。社會主義的選舉優於資本主義，但不要流於形式”

“我對等額選舉有意見，說它只是形式問題，就是如此也應注意。有人這麼解釋，說領導是集中了羣衆的智慧，另外，你不想選他可以選別人，其實這根本做不到，就是說，領導相信而羣衆不滿意的可以當選，而自己信任的人，因為領導沒提名，你雖然選了，也選不上洪山區選王明發爲代表，實際上不民主，團代會上對團委提了不少意見，有人說團委書記不適合做團的工作，大庭鼓掌。可是因爲等額選舉，還是選上了。”

聽說蘇聯的工人有的這一屆是蘇維埃代表，下次可能不是，沒什麼面子問題，我們的支委如果沒連選連任就覺得自己垮台了。

不同意等額選舉和領導提名。這會形成幹部光會阿諛逢迎。領導滿意的羣衆不一定同意。政治品質好，不見得工作勝任。這問題不是個別的問題，這是全國性的普遍性的問題。各人民代表大會分配到各就去選，就是由領導分配的。湖北選的人民代表有些是外省人，老百姓根本就不了解他。

我們有錯必改，這是對的，也正是黨的偉大之處。

等額選舉領導指定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主要的是方法上不民主，我們是選也得選，不選也得選，如主席團的產生主席團中那麼多人有一人我不同意，鼓掌時怎麼鼓掌呢？如這樣下去會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個人崇拜在中國的影響：幹部中存在個人崇拜，和蘇聯的個人崇拜及封建家長制的影響分不開。我們馬列主義老師講：除了黨的最高領導之外是難免犯錯誤的。爲什麼把最高領導除外呢？爲什麼各高等學校的校徽都是毛主席的字呢？毛主席的舊詞被庸俗社會學的臧克家大吹一頓，搞的轟轟烈烈。過分推崇是不必要的，毛主席是謙虛的，不

讓提‘毛澤東思想’，而我們的幹部喜歡奉承，這和等額選舉，領導提名分不開，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要權威，但不是盲目崇拜。”

“等額選舉我不同意，爲了保證黨的領導，剛解放時必要，而中國青年在今天提出它好就不對。個人崇拜嚴重的表現在臧克家對毛主席詩詞不適當的誇大，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詩人’，我不同意，看了此文後，我認爲他是庸俗的”。

“我們的選舉制度在程序和方式上有很大的缺點，等額提名的原則，是不能作到真正民主的，我主張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競選發表競選演說，以他的競選綱領來取得人民的信任。李達校長是湖南省人，是武大校長，但他却是安徽的人民代表，這是不合理的”。

“要明辯是非，不能用調和主義態度，有人說人大選舉不民主，黨員大會是黨員他們有民主，人大是人民代表會，人民是主人翁，爲什麼不能實行民主選舉呢？如果不相信人民，爲什麼叫人民對團團呢？我認爲等額選舉變成奉承的風氣，不是指的我班。因聽說上面集中了系羣衆智慧，實際不一定如此，如伍憲選從波蘭回來以後，馬上弄到學聯去，他們系反對，才撤換了。我認爲上面並不能代表羣衆意見，從群眾上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解放後個性得不到自由發展，個人才能得不到發展。由於青年人個性自由發展受到了妨礙與限制，青年人安於現狀，普遍缺乏對事業的進取心和冒險精神是目前一大弊病。許多上海的青年學生到西安，蘭州去支援西北地區的建設，去的時候是興高采烈，而一碰到困難就退縮了，都紛紛表示不願干了，要回上海。這就是生活缺乏刺激，人們缺乏對事業的進取心和冒險精神所至。”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在開發太平洋西岸地區時，就曾經出現過一批大財閥和科學家，這批財閥中有些並不是出身於地主貴族階級的，他們是普通的工人，只是憑着自己的才幹本領以及對事業的進取心和那種冒險精神爬上去的”。

“個性和集體主義的問題，二者分不開。共產主義十分美滿，可以有充分的個性自由，沒個性自由即沒科學發展。周揚同志提出過：



黨性掩蓋了個性。教條主義也是掩蓋了個性發展的。我們支部有人說二十年來白活了，反映了悲哀的感情，個性沒得到發展；另外，我們以前對領導的意見就不收提。周揚曾提出過：填鴨式的方式是可悲的。黨性和個性是可以統一的，可以互相促進發展。我們班思想比較活躍，說明同學要求個性發展，別的理由由於教條主義和機械唯物論的統治，一下難以發展”。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均可拋。”

（按：不自由，毋寧死，原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提出的口號。在封建社會中沒有任何民主自由，當時提出這一口號是進步的。解放後，我們獲得了真正的民主自由；而右派分子却向黨提出爭自由的口號，這就成為反動的了。）

“國民黨時期，城市裏很隨便可以找到一碗飯吃，而現在不行了，什麼都卡死你。我們的民主有限，找工作強調組織分配，而資本主義國家有自由選舉職業的權利。”

“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比國民黨時代還不如，沒有自由了，大民主產生是小民主沒有解決問題的結果，大民主還是好的。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社會，南斯拉夫的任何人都可以向領導人提出批評，南斯拉夫是在蘇聯前面了”。

“憲法上第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自由……這個數字是無窮大，這是憲法的規定。那末，似乎說完全自由是對的了，可是不知道是誰給加上了一條註解，叫做‘正確的’，也叫‘符合人民利益的’，凡是這樣的言論出版自由就有自由。這就打了一個對折。不過這個對折我難護。可是究竟怎樣內言論出版等才是‘正確的’呢？你說正確，我說不正確，那末就拿出來讓人民羣衆評一評吧！當然囉，人民羣衆不好評，那就說代表人民羣衆的政權機構來評。這就又打了一個對折，這個對折我在猶豫之下也擁護了。假如政權機構評錯了怎麼辦？是啊！

登登消息就不登囉！你去法院告他，又要看法院的意見如何，這就是一個折扣。這樣下去，就折則無窮小了。小到什麼程度呢？小

到只有上商瀟瀟或者像我們今天這樣的寫大字報了。可是要不是今天的話，可能還不能寫呢？”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人民對政府不滿意，還可以張貼標語、大字報、舉行遊行示威，總不過是波逮捕，但有社會輿論支持。可是解放後，只要發發牢騷、開開玩笑就會被扣上帽子。還有人在暗地裏記帳，別人記我帳，我也記過別人的帳。現在講了不滿的話，不是槍斃，而是給苦頭吃，槍斃了還好。”

“解放後所講的自由與我們以前所知道的確不同。言論自由確實沒有封住嘴不許說，也沒有把你抓去，但記了一筆帳，集中起來算帳。這種做法與人的自由是不符合的。民主生活缺少法制，都是一些教條，工人農民也沒有民主生活，沒有積極性，工人反映勞動環境是黨培養的。學校什麼代表也是黨培養的”。

“解放後許多正義感都是假的，不怕馬屁的人受到打擊。圖書館的××就是由於不怕馬屁受到打擊的。如果不隨便講話，他的升官之路就方便一些。”

“過去我們沒有民主，不論講什麼，都被扣上帽子。談談印度，就被扣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帽子。談談南斯拉夫就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

“人民日報‘再論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一文發表，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意見談出後，團總支書記說我系發生了反蘇反黨的言論，就是違反了民主和自由。我們同學們的顧慮是必要的，他還說團員向這種現象鬥爭，必要時以黨籍團籍處分。我不同意他所說的是反黨反蘇的言論，以後似乎存貨不多而收回去了。這次說不查檔案不查歷史，也就是說過去說了什麼就查查檔案、查歷史了。不敢發言可能受舊社會的影響，但也可能是在新社會有妨礙民主、自由的地方。”

“人與人間是沒有通訊自由的，信件要經過公安機關檢查，甚至把它砸下來。人的行動也沒有自由，一個人的行動常受監督，就像跟蹤一樣。憲法上雖規定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不同觀點的文章，保險不發表。”

“社會主義真沉悶啊！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黨派還可以自由發言，我們就開不得口。過去國民黨有一個書報檢查機關，解放後這個機關是沒有了，可是控制得更緊了，在每一個報社、雜誌社、出版社裏共產黨員都是大大小小的檢查官”。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完全沒有新聞自由，而是說我們的新聞報導受一定的限制，這在解放後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全國的報紙、廣播電台、雜誌社基本上都是一色的，在全國的非黨報紙據我所知道的只有四家，那就是大公報、文匯報、光明日報、新民報，除了這四家報紙外，全都是黨報。報紙、雜誌、電台全都是黨辦的，這有沒有好處呢？好處也有的，就是比較一致吧，要反右派都反右派，要增產節約都增產節約，要百花齊放都提倡百花齊放，所以在鼓勵人民同心同德，向着一個目標前進，它是有好處的，就是從上到下協同動作，一個動作。在我們的報紙裏面都是維護社會主義的，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報紙，我認為這是好的。現在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官司就打不清，有的主張社會主義，有的主張資本主義，有的主張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人民容易受到各種壞東西的影響。在我們國家內基本上都是健康的，都是正確的，那麼這一點是有好處的，但也有壞處。有些報紙都是清一色的。這產生什麼壞處呢？就是一般化、公式化。這個太嚴重了，過去大家還是講在文化藝術作品裏面有公式化概念化，可是報紙裏比文藝創作裏還要嚴重，有些新聞的公式化簡直嚴重得不可收拾，我舉個例子，比如舉行酒會吧，最後一定講酒會是有熱烈的氣氛中進行，差不多七八年來每次酒會都是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又比如中央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同志接見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團，那麼接看就寫在座的有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胡克實，就完了，寫得非常枯燥，非常一般化。那麼介紹一個新的城市，就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怎麼怎麼不好，電話不靈，道路不平，解放後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是怎樣怎樣好，最後就是今後展望怎樣怎樣。有個時期報紙上大規模介紹土產品，有些產品可向外面換回鋼材多少噸，它總是用鋼材打比，很奇怪，不

用其它的比，不管是草料也好，雞毛也好，茶葉也好，總是說可以換回多少鋼材，我就很奇怪，不能換回別的東西嗎？老是鋼材。這正是說一個問題，說明我們報紙由於是清一色，所以在很多地方失掉了生動活潑內容，它就流於一般化。它為什麼這樣子呢？全國只有一個通訊社，就是新華社，你用它的稿子也好，不用也好，反正只此一家；那麼我們的報紙呢，都是黨辦的，就是賠了本也是黨掏錢，這些個報紙的領導人，他對於報紙的銷路總是放在其次，強調政治性是最好的，但是對賺錢他本是不大管的，至於這報紙是否受讀者歡迎，大家是否真心實意掏錢來買這份報，就不大管，如果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那像這樣辦報早就沒有飯吃，因為資本主義讀者是有選擇性的，譬如說他可以看到“泰晤士報”，可以看到“約克遜報”可以看到“星期日論壇報”可以看到“紐約時報”，如果辦得不好的話，他可以不要你的報紙，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報紙，力求把內容辦得生動活潑一些，否則它就沒有銷路，他就沒有飯吃。現在我們這裏呢？國家辦報是有好處，壞處就是養成某些工作人員不踏實，馬馬虎虎的作風，是在新聞工作上不求改進，總是老一套，最主要問題就是‘供給制思想’吧，反正辦好辦壞都是政府的，沒有一種東西刺激他努力向上，努力把報紙辦得活潑一些，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求把報紙辦得像資本主義那樣了，每天發表一些女人的消息哪，或者好萊塢的電影介紹，但是我要求報紙在某些地方，在技術上像資本主義國家某些地方學習——在標題上、欄欄上新鮮、活潑、大方、醒目，帶有刺激性，能夠鼓動人，辦得漂亮一些，對於同樣的新聞有不同的寫法，可以形式多樣化一些嘛，在新聞學中也可以‘百花齊放’，你說‘宴會一定在友好氣氛中進行’，你可以寫成別的東西也可以嘛，應該鼓勵在新聞中間也產生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風格。我們現在看報紙的確只看到政治性的內容，在藝術上沒有什麼享受，這是很乾枯的，那麼，針對這些問題我過去有這樣一些看法，我認為可以允許私人辦通訊社、辦報社。那麼現在國家可以允許私人辦刊物了，比方瀋陽辦了個“芒種”，就是私人辦的，巴金他們就私人辦了個“收穫”，像“詩刊”基本

上是臧克家他們私人搞的，我看他們搞了以後，天下也沒有大亂哪！沒有什麼了不得。我們可以讓私人辦通訊社，辦報紙，私人辦的通訊社有好處，能夠和國營通訊社競爭一下，你辦得不好，其他的報社會選幾的新聞，不選你的新聞，那你就吃不開，你就不能靠你們那國營的牌子來吃飯，你就不得不努力，你不努力的話你就威信掃地，你就沒有人看。那麼多辦幾個通訊社，專業通訊社也好，綜合通訊社也好，也可以‘百花齊放’搞下子。搞一個通訊社專門報道文教消息可以呀，搞一個通訊社專門報道農業也可以呀，像蘇聯的‘文學報’一樣，採取風格多樣化的辦法，頭版頭條不一定專門發表社論，我們現在報紙好像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好像只有社論才可以放在頭版頭條，記得丁玲同志過去在延安辦‘解放日報’的時候曾提了這樣一個意見，她說這個東西不一定要從形式來決定，從內容來決定要好些；她又說，只要在當天來說是最重要的東西都可以放頭條，比方說毛主席寫了一首詩寫得很好，在當天是最重要的，就可以放在頭條；比方說中國和印度尼西亞賽了一場足球，在當天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可以放在頭條。這個就不一定叫資本主義的報紙，無產階級國家也還要知道打球的情況吧，也還要欣賞文學藝術吧，現在我們的報紙都有公式化，就是說人民日報做了一個榜樣放在那裏，各個報紙照學，人民日報怎樣作，下面就怎樣作，其實只要我們懂得方向是爲了社會主義，那麼就是黨辦的報紙，也可以來個‘百花齊放’，每個報紙都有自己的特點，富於當地地方的色彩，有自己獨特的文筆，我記得過去解放前的報紙，也有特別受人歡迎的欄目，有的是‘星期論文’，比較好，它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副刊辦得特別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通訊欄辦得爲，很吸引人；有的是國外大事的述評辦得好，各有各的特點。解放後的報紙，你說那個報紙有什麼獨特點呢？你說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各有它的什麼特點呢？我就很難說出來。也就是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差不多，湖北日報和湖南日報差不多，湖南日報和江西日報差不多，沒有什麼區別。要有私人辦的報紙就可以改變這種情況。你說在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的旁邊又出來一個民辦報紙，你說湖北日報和長

江日報的編輯是不是心裏有點不舒服，你辦得不好，人家就不買你的報紙，不要看你是市委宣傳部辦的報，因爲人家掏錢他不管是你營、私營，正如像看演戲一樣，他不見得要跑到國營劇場去看，私營劇場要好他一樣去看，你說我是國營劇場一定要看我的戲，這個道理恐怕講不通，現在允許私人辦戲園，允許私人辦刊物，爲什麼不允許私人辦報和辦通訊社呢？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是說私人辦是不是違反革命分子辦，不是這個意思，那反革命分子不但不能辦報紙，那講話也不許他講。你說私人辦報是不是走到資產階級方向，你看全國有四家非黨報紙，就有三家出了毛病——文匯報、光明報、新民報，我也承認這次批判他們的報紙是出了毛病，不過出了毛病可以糾正嘛，出了毛病之後人家還是看出來了，黨和國家還是看出來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還是願意改進，他們向人民請罪嘛，那麼他們辦得不好，出了漏洞，更能顯得人民日報的正確來。另外我認為應該擴大報紙的報道面，現在我們的報紙的報道面是不夠大的，總是那些東西，剛才我講適當登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我過去還有這樣的意見，我認為怕什麼呢？艾森豪威爾的報告也可以登登，看他到底講些什麼鬼話，怕人家受蒙蔽，可以在登載的同時發一個評論，把他評一下，那麼過去對這東西不這樣作，所以我感到很不可理解。‘紐約時報’把毛主席的報告全文發表了，那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大的問題也可以全文發表的，譬如艾登在下院的演說，富爾在議會的報告，艾森豪威爾在美國國會的講演，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的全文，發表了以後再加以評論，人民不會上當的，看了艾森豪威爾一篇報告就相信資本主義啦，這反而是不相信人民羣衆的表現，不相信人民羣衆是有覺悟的，是能夠認識到的。過去在內部辦的‘參考消息’給高級幹部看的，在學校裏現在放寬了尺度，發到講師一級，不過面擴大了，內容就縮小了，保密的範圍就小了一些，那上面的東西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我也看了一點，當然不是偷看，我也是經過別人允許的，其實我看那裏面也沒有什麼東西完全值得保密的。那上面有篇消息談到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蔓延，這東西有什麼保密的呢？這東西放在參考消息裏面，好像

只有講師以上的知識分子才能看，這流行性感冒蔓延在公開報上登也沒什麼了不得，參考一下，尤其關於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消息，那是全可以登，讓全國人民知道那有什麼不可以。至於那些外國代表團對中國的看法，外國記者所寫的，對中國當前重大的運動，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們發表的評論，也可以摘要介紹一下。讓農民看到了是不是腦子糊塗了，有些文化水平較低的、沒有政治頭腦的，那你就有選擇的登嘛，或者人民日報登，黃州專區報、什麼農民報就可以不登；你還可以分一分工嘛，就可以把報道而擴大一些。現在老實講我們有些糊塗，只看到這一邊情況就沒有看到那一邊情況，不知道資本主義對我們的看法怎樣，對我們的反映怎樣。

另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某些理論文章，也可以登一登，當然文匯報犯了很多的錯誤！不過它有一點還是優點，是可以肯定的，文匯報第四版有一欄叫‘外論選輯’，就是專門登載外國富有代表性的意見，這對於我們了解世界大事，了解資本主義國家輿論界的情況，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層動態，有很大的好處。當然有些人能夠看到參考材料就有些了解囉！但是絕大部分人看不到就是‘瞎子摸象’，根本不了解情況。我記得最近關於禁運的問題，好像美國控制不住這些國家了，很多國家要開放‘禁運’了，這個問題我們只能看到我們這方面的意見，看到外國很一般的意見；現在外國工商界他們報紙，有些資本家個人的看法怎樣，不大清楚，文匯報這方面作得比較好一點，我記得關於‘禁運’方面他們登過一些文章，登過美國‘經濟學人’雜誌，登過‘朝日新聞’，‘朝日新聞’報，好像登過美國‘新政治家與民主戰士週刊’，登過他們東西，這可看出他們這些雜誌、報紙實際是代表外國某一個階層意見和看法，都是某一個階層的喉舌，看看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頭腦會更清醒一些，但是過去這樣做就是文匯報一個報紙，其它的報紙都沒有這樣作。另外我覺得現在對新聞記者的束縛比較多，過去一兩月上海、北京很多新聞記者座談，談新聞記者倒靠得很，到處保密，這裏保密那裏保密，你說國防事業應該保密，工業的某些部門應該保密，但是我

們保密得很寬，教育有些地方也保密，最笑得可笑的是北京西郊動物園到了一些動物，記者去訪問時說要保密，好像動物報道出去都有失國家機密，這在很多地方造成記者很大的不便，層層限制。比如武漢一個記者談要到長江大橋去訪問先要搞一張總的採訪證，就是長江大橋工程局發的一張採訪證，然後如果你想到橋上去看還要有橋上採訪證，如果你要到橋下去看，還要有水上採訪證，好像你到工地去看有工地採訪證，推而廣之，怎麼得了，有廚房，有宿舍，有衛生科，那是太廣了，就是人爲造成了很多束縛，如果你不相信這記者，你根本不給他採訪證，如果你相信，你就發給他一個總的採訪證，不分什麼橋上橋下，你說這記者能看橋上就不能看橋下，好像他在橋上是忠實於社會主義的，到橋下就叛變了那有這種情況呢。過去有些地方對新聞記者人格也是尊重不夠的，像勞動報記者控訴說，有了外國代表團來了，他跑去張相，派出所把他抓去關一點半鐘，說不該隨便照像，這個東西也影響我們的新聞工作，很多地方造成很多人爲的束縛，使新聞記者的活動處處遭受困難。我認為這束縛應該把它打破，應該打破。關於新聞自由問題我就談到這裏”。

“報紙是强有力的武器，報紙的輿論每天都影響人民思想的變化，有人說發表新聞時要考慮無產階級利益是對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在新聞工作中保護無產階級利益，如果有積極效果就登，我同意，好的東西應該大量宣傳，蘇聯發明原子能發電站，在國內大小刊物、圖片、電影等等都進行了宣傳，過於重複宣傳一個問題不必要，適當的也應介紹歐美國家的科學成就，我認為不會使我們思想動搖，比方，美國有原子彈，告訴了人民，我們更加注意提高警惕，如果不知道美國成就，就會不注意自己的提高，我們可以掌握一些原則，即首先發表蘇聯的成就，其次發表歐美的，而且可以把登歐美成就的消息篇幅大些，地位顯著些，尤其是英國的原子能發電站比蘇聯高許多倍，可是把英國的原子能發電站的問題登豆腐干那麼大。我們只了解自己不了解別人，在處理工作時會片面，這幾年我們長期的宣傳美國經濟下降，這是不合事實的，美國共產黨開會對美國經濟狀況的決議，指出

美國經濟逐年、漸月上升，抹煞事實不好，明明人家在發展，我們看見了也不承認，這樣逐漸會成為神經病。看到他們的成就會刺激我們，使我們更快提高，這才是無產階級利益，不登別人的成就就是自欺欺人，另外，我們的報紙有過於找岔子的現象，大的方面着眼資本主義不好，我們反對它，但也不應過分刺激別人，有礙於和平共處，當別人遇到一點困難時（馬拉汽車）就大力宣傳，是以個別說成一般。

“××的發言，並不能改變我對那些阿諛奉承的小人的看法。新聞報紙問題，梁漱冥也是政協代表，發言為何不登？隨手拈來一個例子：赫魯曉夫——布爾加寧——訪問南斯拉夫前不久，報紙上報導南斯拉夫經濟如何不好，而他們訪問南斯拉夫以後，馬上又報導南斯拉夫經濟如何好。前後兩個報導不同，不能拿片面的東西教育人民，應該拿真理教育人民，這是不全面的例子。王任重給我作了報告，報紙上報導說：‘很受歡迎，大部分同學記了筆記’，實際上大部分同學沒記筆記，不受歡迎。河南是災區，救災是怎樣呢？有一次是缺25天糧食，平定指標是6斤雜粉，而說是‘救災痛的很好’，連幹部也會問心有愧。選人民代表，我參加過兩次，選的代表，大部分是人民不認識的，胡風就是湖北人民代表，認得他的有幾個人？說台灣人無法生活賣血，這是無人道，但漢口就有人無法向協和賣血；同是爲了生活，這有什麼兩樣？‘新武大’是黨委機關報，凡是批評黨委的稿件就不登。如波茲蘭事件，前後兩回報導不同，顯然後一回對，但第一次報導是那裏來的？”

“有人說真正的新聞自由離不開階級觀點，我認為我們的新聞是不自由的。如梁漱冥的受批判，我們看不到他的發言，只看到批判他的東西。如果不知道他的發言是什麼，就不能批判。自由是人民的，梁是人民，他的意見如果登就反映了我們的新聞自由，不登是一個缺陷；另外，有些是好的就登，壞的就不登。如河南省的政協代表說河南今年沒餓死一個人、沒偷盜等等……以此說明合作化的優越性，我認為以安陽的情況說明全河南都是這樣就不合事實，河南省逃荒的

很多，今年河南耕牛死亡一半以上，給農業生產帶來很大的打擊，（牛肉賣到一角錢三斤，說明耕畜的傷亡）暴露了合作化的缺點。新聞不自由表現在新聞的片面性。”

“我們的報紙報喜不報憂，這次回家過年玩龍燈擠死了許多人，可是報上沒登，似乎登了就不光彩。新聞報導問題，我們對資本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對的，但不要吹牛，說他們的生活提高了，這是說謊。梁漱冥的反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發言應登出來。”

“新聞報導不是自由的，如‘新武大’就有一個太上皇，有兩條規定：①不准批評黨委，②不准批評校部。有檢查制度，這不能令人容忍。桂林有一個人給報紙寫稿批評上級，但黨委看了，畫個×，我的一個朋友，是新聞記者，他說：‘他寫稿要先送到北京去，再轉給地方，否則登了，你以後到他那地方去就會遭到打擊’。他們像掌握丁生殺大權。新聞報導我認為是‘胆小無術’，鄧小平的報告中就是這樣。登了什麼，不見得就是承認什麼，我們登了‘真理報’記者的報導，却不登波蘭記者的，如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為什麼不登？斯大林三、七分，怎樣分？新聞報導的檢查，是官僚主義的溫床。‘新世界’每次發表美國的經濟狀況，總說是下降下降，可是這次美共的報告，並不是這樣，科學技術，並非洪水猛獸，不敢登，為什麼不敢登？蘇聯發明了小小的東西，就大登特登，而美國早就發明了單軌火車，可是就不敢登載。”

“報紙新聞上，我認為登領導的缺點不影響無產階級利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東西，很高興。揭露了官僚主義會使他害怕，記者的權利是很大的，深刻揭露會使他注意。不同意鄧小平的關於新聞報導的意見，我知道中央委員會也有某些同志不歡迎對黨的批評，如果這樣做就是給官僚主義找窩藏的地方。如我們家鄉一個農民因為統購統銷太厲害，餓的自殺，而政府說他是吃的太飽了而死的，這引起羣衆的憤慨，如登出來是會教育幹部的。單純說維護無產階級利益而沒有真正的維護無產階級利益。”

“我國的罷工及內部的缺點沒有報導，對資本主義的缺點誇大，

用很大很大的標題登載了他們罷工的消息。過去我們報導美國人民生活如何如何貧困，失業人數在增長，而57年5月23日美共發表的經濟情況公報中提出生產增長了42%，就業人數是空前最多的，人民的工資也提高了，只有5%的人生生活貧困，因此認為兩者相比不可理解。我認為資本主義雖貧困，還是比我國人民以及人民民主國家人民生活還好些，報導中好像認為美國人民貧困得要死，直其實他們生活得很好，中國人民貧困的還不止5%，因此，認為我們報導不真實，只報導一面，並認為報上報導台灣人民生活痛苦，而不報導解放後中國人民的生活痛苦。”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可以辦兩種報紙，一種是執政黨的報紙，另外一種是在野黨的。或者說無產階級可以辦一個報紙，資產階級也可以辦一個報紙，一方面可以宣傳共產主義！一方面也可宣傳資本主義。”

“新聞報導方面，不是實事求是的。反面消息報導的少，是經過觀點修改的。對波茲南、牙利事件，前後報導不同。斯大林錯誤在報上報導的少，而硬把結論讓人接受。實際上，肯動思想的人會提出不少疑問的。”

“新聞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報紙成了廣告牌、傳聲筒、留聲機、翻版書。”

“新聞不自由有兩點根據：①沒有政論性的文章，對國內外大事沒有獨特有見解，對政府政策沒有評論。②積極的內容和體裁都很狹隘。報導重大的經濟情況……但是沒有深入人民生活各方面的細緻的報導。”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是赤裸裸的金錢關係，現在共產黨統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政治關係。”

“在階級社會（今天的社會）人與人間的關係是不可捉摸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那樣優越，著名的詩人馬雅科夫斯基，著名小說家法捷耶夫為什麼要自殺，自殺的原因是什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酷的，應該從人的態度來對待人。要另求‘世外桃園’”。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間，有這麼一種現象，無以名之，名之曰：精神世界裏的級別。

請允許我預先聲明，為了力爭香花，避免毒草，我不得不向親愛的讀者說明白：我從來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對於小資產的平均主義，也久已不感興趣了。因此，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以及為實施這一制度而必需存在的級別，例如有中央一級的幹部和部長，也有省一級的廳和廳長之類，我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我所要對之發一番議論，不是這些。

使人們感到吃驚的，乃是這種應當在政治上存在的級別也侵入不需要它的人類精神世界裏，並且頑強地盤踞在那裏，支配着我們的思維活動。

在我們的文藝界裏，不知道是誰規定的，但確實是為大家所默認的，有大作家、大編輯，有小作家、小編輯，有大大小小的作家和大大小小的編輯，而凌駕於他們之上的，還有所謂權威編輯。

如果說，這些權威，大、中、小等各種級別能夠根據他們經常的勞動成果而隨時加以合理的調整，使其有形的勞動和無形的級別相適應，倒也罷了，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如象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如果他說認作權威了，就永遠是權威，遇事是權威；如果不幸而歸入了‘小’字輩，那麼，除了偶然的幸運外，那麼就是永遠是小，遇事是小，在算定了終身的命書上，做小伏低便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六朝時代距離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但那個時代的門閥制度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裏却仍然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具有高高的、或較高的級別的人，的確是值得人‘豔羨’的。

他們有的是‘正確’的化身，雖然參加過，並且領導過反對以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研究‘紅樓夢’的鬥爭，但在不久之後，又寫出了可以與‘羣芳閣夜宴圖說’比美的考證寶玉曾過斑疹傷寒的名文，而不自覺其為自己所曾經大力批評過的思想的追隨者。

有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盡管所寫的書出版之後，出



版者曾經接過1700封批評的信，然而却沒有一封可以發表出來。如果萬一泄漏了天機，可怎麼好呢？沒有關係，還可以將就有這種批評的雜誌全部收回銷毀。

有的亂搞男女關係，已經人民法院判處徒刑。但在緩刑之餘，依然逍遙法外，高步詩壇，着自己‘美妙’的蘆笛。

有的是被壓制的新生力量，但一登龍門，身价十倍，就不僅對自已多年受過教的老師灑出一副獨家經理馬克思主義的商店老板的面孔，向之貫輸馬克思主義ABC，而且還以婆婆的身份將另外一些新生力量作媳婦來加以呵斥了。

諸如此類。

反過來，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倒霉。

這些現象，吸引着一部分人去追逐着那類高的較高的，盡管是無形的級別，當然，也招致了更多的人去反對它。

又是不要以爲這種現象百分之百都是壞的，它還能刺激文藝科學的發展哩。由於這的鼓提倡、被容忍，我們至少發展了一門原有的科學，那就是‘文壇登龍術’，此外，又建立了一門新科學，那就是‘文壇名單學’。

要給‘文壇登龍術’和‘文壇名單學’勾畫出一個輪廓或者下一個定義，不是我這種在精神世界裏級別極低（甚至還沒有級別，只是未入流）的人所能勝任的。因此，我希望一些對這類學問有研究的同志們未參加‘爭鳴’。

很長期以來我們都熱心於討論世界觀與創作方法，藝術與政治的關係等重大問題，這完全是必要的。但還有許多不合理的，也可以說是腐朽的東西，在支配着我們的思想，我們却没有大張旗鼓地，大聲疾呼地去揭發它、反對它。這種無形的級別也正是其中之一。難道它不是阻礙我們前進的絆腳石嗎？

個人崇拜的精髓，去你的吧！現在是我們向你告別的時候了。”

“我們社會上分四等人，第一等是黨員，第二等是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羣衆。在這個社會裏是不平等的，我們這些非

黨員畢業後還企望好工作嗎？以後分配工作好的是黨員員的，其他不是重要的才是羣衆的”。

“斯大林功績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狠狠地打擊了敵人，但是斯大林就不太懂得怎麼相處和人民的關係，就不懂得區分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蘇聯爲什麼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呢？恐怕和斯大林的認識模糊是有關係；就是蘇聯肅反的擴大化，把很多無辜的善良的公民和完全沒罪的共產黨員殺害了，就是把人民內部的問題當作敵我矛盾的問題，同時斯大林在他晚年高居在上不了解人民羣衆的疾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人民的愛求，對人民羣衆不夠尊重，對人民民主權利不夠尊重，就是說他的主觀上當然是爲人民謀幸福，建設社會主義，當然也沒有想到一個革命黨不只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即使爲了建設社會主義也還是要尊重人民羣衆，這問題在波匈事件裏得到最好的說明了。大家知道波蘭事件發生在前，匈牙利事件發生在後，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是搞得很厲害的，是拿着槍桿幹的，那麼哥穆爾卡在去年11月20日作的報告裏面他承認了羣衆這樣作是對的，他認爲一個執政黨陶醉在勝利裏面是最可怕的，他只看到經濟數字的上漲，看到學校多辦了幾間，看了什麼合作社增加了多少，或者是雙輪雙轡增加多少，光從物質上去考慮這些問題，（我這是引伸他的意見，他並沒有講雙輪雙轡的例子），沒有了解黨和羣衆的關係，那是很危險的。在波茲南事件裏的確是揭露了黨和政府工作中的許多陰暗面，這些東西當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不過沒有辦法，它是事實。他說過去在工農羣裏面，在政治生活裏面，有很多不正常的現象，他說波茲南事件的確是給黨和政府的一預警告，這樣看起來就是在波蘭過去也是這問題沒有處理好，波蘭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嘛！解放後的發展、建設成就也很大，但人民還是不滿意，人民不滿意不僅是說有肉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這就夠了，因爲人民不是生物，他不限於生物的要求，他還爲人的要求，執政黨只注意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而沒有注意到尊重他的權利，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給他一個人的生活，他還是不滿意的。”

“我覺得，在武大，民主空氣非常不夠，誰提意見，便會扣上一頂大帽子。有一次，我們住宅區的合作社要撤銷，大家感到買菜等等要上坡下坡，非常不便，請求不要撤銷，沒有允許，於是大家簽名上書再一次要求考慮不要撤銷，可是結果不但事情沒有辦到，還扣上了一頂大帽子，說這是請願，是‘反黨、反領導’。這真是把大學教授當作小孩子來吓唬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來以後，學校黨的領導叫大家提意見，我當時心裏有顧慮，但覺得不提又不好，就提了些小意見，不敢提大意見。後來又怎樣呢？有些黨員不高興了，說‘×××意見可多哪！’

“我認為，解放起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來以前，那才是初春天氣，乍暖乍寒，正合着‘四月八，凍煞鴨’的一句俗話，知識分子一方面心裏非常歡喜，一方面又有些畏寒。自從聽了毛主席的講話，這才感到春暖花開的時季了。要把武大搞好，必須打破這架銅牆鐵壁，黨員有責任，羣衆也有責任。黨團領導不能自視爲特殊人物，應當把羣衆，把黨外知識分子看作一家。不過，現在離這個要求還遠得很，還是希望而已。”

“違法亂紀，侵犯人權的黨員逍遙法外，難道神聖的憲法是特爲黨外羣衆特制的‘王法’嗎？參加鳴放的老教授受人慢罵、追蹙和秘密監視，難道是新社會的人權的嗎？幹這些無恥的勾當，與舊社會的流氓有何不同？這樣的人橫行在上，在下的人那有自由可言！珞珈山上一片冷冰冰的氣氛，甚至連年成不好，氣候不好都不提說了，任何學校也不象武大過去教工們受到的那樣懷慘，大家也悶在心中不敢說出來。”

### 攻擊人事、檔案制度等

“羣衆的意見針對人事部門，人事部門給大家作鑑定是操生殺之權，黨外人士經常受到岐視排擠。人事處爲什麼有大權來宰制一個人？這一方面是人的問題，黨員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另一方面

也是制度的問題，造成了武大黨羣之間的隔閡。我覺得有必要組織一個人事處工作組，來徹底檢查人事處過去幾年的工作，考慮變更人事制度本身——要好好研究各方面的利弊。現在人事處的權力過大，過於集中，應該分散下放。武大一切人員的升遷任免，在行政部門人員必須經行政主管部門，教員要經系裏面同意，不能由人事處來決定。爲了從根本上剷除宗派主義，必須實行‘人事開放’，人事部門必須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是解決矛盾的根本問題。”

“另一個問題也是與人事處有關的，我覺得應該讓每個人與自己的資料見面。檔案袋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自己不知道，這樣在思想土形成很大的負擔。這些不是黨的祕密，而是與本人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應該讓他本人知道。不調動工作還好，要是調動了工作，新的工作崗位對於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光憑檔案袋的。爲了實事求是，消除大家的誤會的檔案袋應經本人核對。希望領導上很好的考慮這個問題。假如領導上是相信人的話，是可以這樣做的。”

“人事處是一個神祕的獨立王國，它掌握、生、殺、予、奪之大權，掌握羣衆的政治生命，它保存着每個人的材料袋，這個袋子已經成爲每個教職員工的沉重包袱，我們不知道裏面放進了什麼東西！人事處隨時用檢查的眼光看待我們，造成了隔閡，造成了羣衆的敵對情緒。”

“一到人事處就毛骨悚然，辦事的人見人來了老是把文件往櫃子裏塞，機密得不行了，好像大家都都有問題，誰也不敢進來，生、殺、予、奪之權操在他們手中，人事處就是造成武大的原因之一。工作方法變成了偵查機關，時刻拿着小本子記你的事，處處保祕，人人受到懷疑。此外，他們的權力太大，什麼事都管，以黨代政。”

“目前高等學校中的人事處又可以說是言宗派主義情緒的‘溫室’。……總之，今天在高等學校中沒有比人事處更爲脫離羣衆，更爲不得人心的組織了，如果說高等學校的黨羣關係之間真有一道牆，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人事處就是這道牆的主要建築者。爲了搞好高等學校中的黨羣關係，必須拆牆墻。首先，就必須攻進現有

的‘諱莫如深’的人事工作制度。人事處應看作普通行政單位，不一定要有黨的領導”。

“人事處權力太大，所有人事安排，好像除人事處以外，別人連知道都不應該知道。有些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不知道自己的單位裏有多少教師和職員，因為人來人去，他們都不知道。留助教、畢業生分配、留蘇學生選拔更不用說了。畢業生分派到那裏，工作情況如何，教員根本不知道，其實知道了，對教學有很大好處。爲了拆牆，爲了建立黨政領導與羣衆間的互信，我覺得人事制度似乎應該加以改進，材料袋拿出來，雙方看一看，彼此同意的，雙方簽章，看法不一致的，雙方可以保留。”

“人事處是清一色的黨員，現在還沒有鳴起來，互相包庇。這次學習只牽涉到具體問題，對於高級的問題，如民主辦校的問題，人事制度問題（體制問題），也應該解決。凡黨外人走進人事處，就是有特殊嫌疑，受到心靈折磨。”

每人工作調動時，應該把自己的材料看一下，由雙方簽署意見，對其中某些不同意的可互相保留。”

“人事工作全是黨員，人事處、科變成了獨立王國，加上腐朽，變成了黑暗的王國。系主任要查學生的檔案袋不行，一定要黨員去查。人事處有一個科三個科長兩個幹部，一個科只有兩個科長幹部，他們犯了錯誤別人無法監督，而他們可以隨便處治人，使人身加上暗影，食慾衰退，工作不起勁。”

“人事工作幹部應該是德才兼備，不一定是黨團員不可。”

“人事制度的材料問題，這是個缺點的判決。我就知道有對我誣蔑的材料，這是我在一次會上看到的記錄。這，我以後調動工作了，怎麼辦呢？上次中我發表被表揚過，可是徐繼庸就是不承認。我建議：工作調動時，要公開材料袋，同意或不同意，可以當面談。”

有人說人事處簡直是警察特務機構，我們幾十歲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們十幾歲的小孩子手裏，今後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寫不同意。三反，思想改造時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

寫過。羣衆爲什麼不可幹人事工作，爲什麼非黨團員不可。”

“我認為將來一定要改組人事處，這不僅在於他們自上而下違法亂紀，宗派主義就是沒有這些也要改組，因為他們缺乏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連一個便條都不清楚。如果在檔案裏搞錯了一個字對我們就是政治問題，像這樣怎麼能領導我們教授！”

“他媽的，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要把檔案拿出來！幾年來，我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每個時期，每次運動，他們都作了結論鑑定，放進什麼材料，特別是在篇反中，不知道給我搞了些什麼進去。應該拿出來公開。我不單自己這樣做，而且鼓勵我的朋友也這樣做。這是我目前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審查幹部就是不相信幹部、我們搞得很厲害，而美國居民調查委員會進行的忠誠調查還沒有我們搞得很，我們倒還經常罵人家。”

“學校人事處不應該存檔案，應該把檔案存在公安機關裏，不然的話就會加深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

“武大人事處更是黑暗王國，我們的生殺就掌握在這些人手里，人事處幹部工作水平低，工資拿得多，人事處的裙帶關係也很嚴重，文化水平最低的人也在檔案科工作。這怎麼能搞好高等學校工作，這些人不撤換我就很熱心。‘蘇聯高等學校就沒有人事部門。’

“人事處如此糟，我們的命運掌握在這些‘三害份子’的手裏，以後他們要把我們分到那裏，我們就得到那裏。人事處掌握了生殺大權，是黑暗的小王國、武大最黑暗的一環。人事處都是小學畢業文化水平的幹部，怎樣能領導大家，又怎樣能貫徹知識分子政策。必須打垮人事處，人事處是我們生死問題。”

“三害”流毒全校，本質在於制度問題，我們應該有職有權。分配工作等問題只有老師才能決定，學生用非所學，上面還說學生質量不高等等，因此應參加到裏面去，本校應趕快組織如何改善學校行政機構的專門委員會擬出方案，提交高教部、國務院。這樣，才能辦好學校，趕上世界科學水平。”

“武大黨對民主黨派的作用不夠重視的，這不僅是因為對民主黨派在高等學校作用認識不足，也是對民主黨派本身就認識不足。似乎民主黨派是專門收容破銅爛鐵的。他們（指黨領導同志）根本不要羣衆，當然也不要民主黨派，因為民主黨派本就是有組織的羣衆，也就是聯系羣衆的橋樑，他們既不要羣衆就不會要橋樑。統一戰線是裝門面，實際上是一黨專政。”

“黨的方針（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都是根據實際需要提出的，根據我的體會，確實有很大的作用，第一、是反映情況，羣衆有話不願向黨員談，不願意在工會行政會上談，都願在自己的組織裏談，同時我們向黨反映情況是代表組織，由組織負責就沒有顧慮。第二、是對黨開展批評。第三、是爲黨貫徹政策。但這方針是否能真正不變呢？我聽到兩種反映：一種認爲民主黨派的存亡既然不決定於它自己，而是決定於黨，今天黨需要民主黨派就說長期共存，以後如果一旦不需要時也可以收回這句話。另一種反映：是認爲即使民主黨派真能被允許長期共存，但是年輕人都願意參加，特別是民革，現在的成員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了，老的死了，後繼無人，豈不自然消滅了嗎？因此要真正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還得要求黨對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給以大力支持。”

“以前我黨的黨對民主黨派是不尊重的。黨對民主黨派也不夠信任，……校刊上對各民主黨派的排列次序很混亂。雖然名次的前後，並不表示重要的程度，而只是說明的一些歷史關係，但是，我聽說，這個先後次序是經過毛主席周密考慮後才決定的，而我們學校的黨委却不懂得，可見黨委的負責同志對於统战工作的知識是何等貧乏！學校裏的重大問題，黨從來不跟民主黨派協商，例如工資改革時……黨總是說‘反復協商’，其實往往連一次也沒有協商過。”

“有人說民主黨派是黨的尾巴，其實連尾巴都趕不上，尾巴還可以趕蒼蠅。”

“解放軍除了吃飯，就是出操，我們這種人（指非黨羣衆）在部隊有什麼出頭，我申請了好幾次才讓我復員，軍隊教條主義很多，特

別是連隊，講笑話時說錯話，就在班裏、排裏、或蕭反時搞你一下。”

“我們解放軍以前是很好的，這兩年不打仗，慢慢腐化了，我看到很多解放軍的軍官帶了一些女人在街上走，館子戲院都是解放軍，現在的解放軍有些和滿清的八旗兵、綠營兵差不多，太腐化了。”

## 關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

### 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誣毀蘇聯，誣毀斯大林，破壞中蘇友誼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應該怎麼樣？以及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應該怎樣？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現在看起來最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團結，儘可能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原則我認為也是適合的。過去在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有排他性的，例如，對東歐的國家基本上是採取沙文主義的態度，以領導者自居，以長輩自居，對她們不夠尊重。蘇南關係是斯大林同志人為地破壞的，斯大林同志應當負很大的責任。斯大林同志的錯誤與匈牙利事件的發生有一定的關係。我覺得在斯大林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排他性，只注意團結社會主義國家，而對於別的國家基本上是採取排斥態度的。赫魯曉夫在這點上做得比較好，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內，彼此相互關係過去也是解決得不好，這去資本主義進諍，說是東歐國家好像是衛國，蘇聯是太陽和月亮。你要說這一點也沒有道理，就也不相信，的確有一點衛星的味道，的確是那樣，很多地方由於他們是小國，由於力量不強，黨的力量各方面都不強，因此對蘇聯有點害怕和過分尊重，蘇聯的確是這樣，把他們當小國，不尊重他們，譬如匈牙利黨中央第一書記撤換問題就拿莫斯科去商量，這就是很不合理的現象，當然自波匈事件以後，蘇聯政府認識到這樣的錯誤，我們看波匈事件蘇聯政府也有很大的改進，譬如發表蘇聯政府宣言，對自己過去錯誤作了檢查。關於同波蘭作生意賺了波蘭的錢也退了一部分，關於蘇聯在外面駐軍的問題重新締結了協定，這都是同過去協定比較嚴格的。就是蘇聯軍隊不能

隨便行動，必須當地政府的同意。我認為是有必要的，但是蘇聯是大國，波蘭、捷克是小國，不過就國家來說都是一樣，我們現在比尼泊爾大得多，我們也沒有欺侮尼泊爾，既然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小國不能歧視，對自己的小兄弟那為什麼要歧視呢？應該團結友愛，在大家庭裏生活，這問題我認為是在 20 大以後，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才好解決的，在以前是沒有解決的，因此在 20 大以後就解決了兩個帶根本性問題，我認為這是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健康地發展創造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不是說從前不健康，就是從前有缺點，這點沒有解決。”

“蘇聯三十多年來和別國關係就不好，並不是完全因為國際帝國主義包圍，如蘇聯在別國設企業，在我國建立石油公司，說是幫助我們，但是石油住蘇聯運，中東鐵路在 1936 年賣給日本，勝利後又奪去，解放後不還給我們，毛主席五〇年到蘇聯還是共管，本來是我們的，本刊都拿去了，後來還說無償送給中國。蘇聯以前太狂妄，似乎要建設什麼秩序，一切要領導。以前王明等還說把中國做一個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幸而毛主席反對了。蘇聯對外擴張，例如芬蘭問題。又想把新疆邊境建立加盟共和國，民族軍都是蘇聯掌握，我們說帝國主義兇，但是蘇聯這些例子怎麼解釋呢？抗日勝利後，把物資運到蘇聯去了，其實打敗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的功勞，蘇聯專家在中國可以決定一切，廠長沒權，一個小問題都要向莫斯科請示。

蘇聯出兵匈牙利，可以看出匈牙利失去了獨立。一切靠蘇聯。另外，出兵不合國際法，就是華沙條約也不合。第一次出兵，匈牙利人民反對，說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匈牙利人民警惕不高，讓反革命分子進來了。反對一邊倒。”

“匈牙利人民手無寸鐵，起來反對政府，卡達爾把一切責任推在拉科西身上，這是不公正的，把蘇聯放過去了。一切要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聯系起來，對蘇聯的缺點應嚴正指出，蘇聯對小國比對他的加盟共和國還不如，要小國對他像父兄，要聽他的話，撤換自己的領袖還要蘇聯批准，嚴重的損害了國家的尊嚴。蘇聯過分崇拜斯大林，拉

科西像斯大林一樣不許人民有自由言論。斯大林的大屠殺對匈牙利的黨中央委員波拉科西屠殺有直接影響，從經濟上看，蘇聯不要波蘭還給七億美元的借款了，因為以前蘇聯對波蘭的煤不等價交換，別的問題上佔便宜更不知多少，讓波蘭一定要低價把煤賣給蘇聯，也是危害了人民生活。思想上大國沙文主義也嚴重，老子天下第一，從不提出向外國學習，什麼都是他第一，似乎全世界的精華都集中到他那裏去了。文學上，似乎只要是社會主義實現主義的，連沙皇的侵略也似乎了不起，其實在經濟上很多地方落後，比不上美國、日本。蘇聯不許別人爭論，以為只有他正確，使別人不敢講話，別人不同的意見被認為是異端、邪說，用火燒死，‘一個國家科學是否昌明和一個國家人民思想是否活躍有關’。蘇聯不同意我們百家爭鳴的方針，他那一套需要改變，知識份子自尊心很強，愛國家的尊嚴，如不注意是危險的。”

“說青年人馬列主義水平不高，看問題不全面，而自認為水平高的，却犯錯誤，大國沙文主義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蘇聯對別國的關係是不識廬的，如專家來中國視察，說我們武大從校長到學生都不講衛生，這是不顧別國的自尊心的。以前以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說法解釋東方戰線，現在再拿出一套就吃不開了。蘇聯是有錯誤就要承認，但赫魯曉夫他們的作法也不見得對，中國說了幾句話，他的態度就變了，蘇聯黨是不正派的。

匈牙利事件後，各國黨發表了看法，中國的態度是慎重的，我們“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鐵托也有反對；我們要實事求是。”

“我同意蘇聯幫助我們是全面的，但並不是無私的，歷史上有過無私的幫助，如白求恩。1938年蘇聯幫助我們打日本也是無私的，蘇聯專家幫助我們不見得完全是無私的。”

“我們以前的學習是奴才式的學習方法，一切問題都要蘇聯專家解決，都向蘇聯學習，這種公式主義是受不住考驗的，理髮都要蘇聯專家指導。”

“反蘇情緒上，男女關係不是最主要的，反蘇情緒是有根據的，

匈牙利的選舉是操在蘇聯手中，干涉內政。美軍在中國犯紀律也很少，沈崇事件畢竟是少的，不該從數量對比，應看影響。中國再獨立放二十年，新疆也會像蒙古一樣的獨立，蘇聯一定會煽動新疆獨立，合併到蘇聯去。”

“如果新疆人民願意的話，就可以成立蘇維埃聯邦，這不對。如西藏，以前也想像我們，而受帝國主義統治，結果我們爭取過來了，蘇聯佔了我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我們是反對的，十七世紀搶去波蘭的土地可以歸還，十九世紀搶去我們的也該歸還，專門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來解決問題是不行的，靠一個國家力量把別國歸併，我堅決反對。”

“中國是蘇聯的附庸。蘇聯專家分布在我們各種建設機構之中，蘇聯發表宣言要調回自己的專家，我表示衷心慶幸。我在‘新武大’上看見武大來了蘇聯專家，國務院有蘇聯顧問，我很反感，我國政權機構中為什麼要有蘇聯顧問呢？這不是監視我國的政治措施嗎？我國建設不要什麼蘇聯專家來幫助，中國有自己的建設人材。”

“過去領導對老幹部非常不尊重，來一個蘇聯專家，都要排隊去歡迎，等幾個鐘頭，其實，蘇聯在中國專家也不怎麼樣。武大對蘇聯專家也不過是個大學生畢業生程度。”

“反對一邊倒，應保證有一定獨立性，蘇聯以前還是知的，蘇聯紀律不好不是主要的，問題是沒依法處分。波蘭關係聲明提出，蘇聯調動通知波蘭政府，蘇聯軍隊運用波蘭交通工具、房子要通知波蘭政府，說明蘇聯和他們的關係是老子對兒子，不是兄弟關係，東歐有些國家不是獨立的，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拉夫、波羅的海三小國，而印度才是真正獨立的。匈牙利事件是革命的，外國通過內西起作用。如果人民不動的話，反革命運動不起來，如果不是經過暴動就不能不獨自主義。說可以有言論自由、遊行自由、人身自由，而蘇聯就不是這樣。他們自己做了破壞法制的榜樣。不通過匈牙利暴動則不會給蘇聯及各國說起警鐘。如不是匈牙利事件我們的憲法中的民主是不能實現的。匈牙利人民光榮的，血使我們今天可以在這兒自由的討論，如果



是以前一定不允許的。”

“我們學習蘇聯是教條主義，如軍隊中的服裝，學習中考試用五分制等等。派到中國來的專家太多了，應該把政治教育方面的專家搞回去。”

“莫斯科的大學生喜歡看美國小說，喜歡聽美國音樂，這是因為蘇聯的教條主義嚴重的結果，使文藝電影音樂都干巴巴的。我不願到蘇聯去留學，蘇聯的教條主義很嚴重學不到什麼東西，我希望到美國、英國、印度去。”

“斯大林主義問題，是鐵托提出的，他怎麼樣提出我不知道，我談個人認識。我不是鐵托的代表，首先不要肯定有沒有斯大林主義，用事實說明好了。”

有人說斯大林的功是主要的，過是次要的，功主要是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打败了德國法西斯。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是列寧提出的，斯大林是實踐者，把功勞歸在斯大林身上不公平，說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斯大林的功勞是不對的，應該是斯大林和人民一起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執行工業化時是有缺點的，過分強調了重工業，人民生活受到了影響，斯大林死後有改變，把很大力量放在農業上，組織青年開荒，生產大量拖拉機，輕工業投資加強了，斯大林在這一點上功過混在一起了。在肅反上，在社會主義建成功，敵我們爭越尖銳的理論指導下殺了不少人。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對國際問題作了錯誤估計，提出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二十大提出了糾正；這個問題不是絕對的，不是任何情況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在斯大林著作中特別強調資本主義總危機，看成現實問題，這種理論曾被肯定，可是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另外，他對帝國主義經濟情況做了錯誤估計，說帝國主義經濟日益下降，可是，帝國主義經濟是上升的。理論上的錯誤帶來了政策上的錯誤，特別強調而大陣營，沒第三條路線，這不是增強社會主義力量，而是削弱社會主義的力量，印度等國不被尊重，這對我們不利，世界上有第三種路線，如印度、印尼、緬甸等國，可以爭

取，而斯大林以前不重視這個問題，斯大林死後有很大改善，團結了亞非國家，社會主義加和平地區，增強了我們的力量，斯大林以前這些錯誤從無產階級利益出發應反對，事實上今天在反對，反對錯誤對我們有好處，至於提不提這種名字，值得考慮，如果提，對我們有害，不提也可以，毛主席不提倡公開大敵，可是主張陰放一個，陽放一個，就是要這樣作的。”

“我們認識斯大林的功勞，論他的功，我高舉雙手喊 ypa，可是論他的錯誤我說他是混蛋，把缺點說成微不足道我不同意。斯大林主義問題，我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是完整的，是不純粹的，從這一點說，反對斯大林主義也未嘗不可。”

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在世時，有些問題不明確，可是有些事不能說不了解，他們自己說‘處境有困難’，‘我們是蘇維埃第三代’，從背面嗅到，他不是不了解斯大林的錯誤。說南斯拉夫反對斯大林主義是修正主義，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我問：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從各方面看，他不是個資產階級專政，是不同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鐵托同志沒給‘斯大林主義’下定義，我認為是指的斯大林的缺點、錯誤，他在聯共黨史上誇大個人作用，秘密警察超出法權之上，‘社會主義越發展，敵人破壞活動越尖銳的理論’，對芬蘭土地的佔領，對美國經濟情況不適當的估計，提出斯大林主義即反對這些東西，當然鐵托提出反對斯大林主義不一定反對斯大林的優點，如我反對唯心主義也不是完全反對，錯的東西不值得提倡就要反對。”

鐵托提出，‘斯大林分子’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尤其蘇聯的不滿。赫魯曉夫說，如果反對斯大林分子，那我們願意做斯大林分子，似乎連斯大林的錯誤也接受了，他不能代表蘇聯的公民，他如果這樣就是把自已生命當兒戲，或是對人民生命殘酷無情。

赫魯曉夫是有功勞的，是斯大林在世時，斯大林的錯誤就發覺了，可是他們自認為處境困難，如果提出有被殺害的危險，勝利者代表大會上殺的人不一定是壞人，可能有些是反對斯大林的錯誤，如

果赫魯曉夫堅持真理，應該斗爭，可是他為了自己的生命而不提，可以說是全權與妻子之臣。

反修正主義，是因為南斯拉夫有缺點，即根據馬克思主義反對不正確的東西，斯大林主義不是完整的，也是要反對他的不正確的，即反對獨斷、專橫、大國沙文主義，說提出批評妨礙國際團結，這不能說服人，批評有什麼妨礙團結的呢？現在所以肯定斯大林，是因為斯大林是共產主義運動最後的偶像，即保持權威，我認為需要真理，不需要權威，反對斯大林主義不是那麼簡單的，是別有用心。

“斯大林的憲法是最徹底、最民主的憲法，有人說資產階級憲法是一張廢紙，可是斯大林自己破壞法制，殺害大批中央委員，如果真是民主的憲法，這些問題怎麼解釋？對赫魯曉夫統治時代是否有民主、自由我懷疑。”

“斯大林的殘暴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是制度的產物。我對斯大林深惡痛絕，恨不得把他的屍體從坟墓中掘出來，親手一塊塊的割他的肉。我對中共中央‘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二文，不能贊同。南斯拉夫卡德爾的演說，是天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這條偉大辯論冤死了，引起了世界正義人民的公憤，可是斯大林殺了許多正義的人，巨大的瘋狂當然同樣是令人憤慨的，兩個都是階級立場問題。我不同意把斯大林錯誤說成悲劇。把奧爾忠尼啟斯逼的自殺，說明他是爭權奪利。我同意斯大林切過西六開，不同意三七開。”

“赫魯曉夫先受到排擠，現在上了台，說明蘇聯共產黨是在爭權奪利。”

### 歪曲匈牙利事件

“對匈牙利問題的看法，第一次出兵不應該，而且是罪行，第二次出兵是不得不出兵，火已經點燃了。雖然痛苦也不能不出兵，出兵是爲了挽救匈牙利（佔領陣地）。 ”

“第二次出兵是必要的，而且是痛苦的（因為這種邏輯太多了），第二次出兵是第一次干涉所引起的，政府對人民的意見不重視，又請外國兵拿刺刀示威，人民激怒了，要驅除自以爲是拯救者的蘇軍，蘇軍退回去是在輿論遣責下進行的。……蘇軍第一次出兵，造成了騎虎難下的局面，所以不能不第二次出兵，這是遺憾的。……蘇聯紅軍在匈牙利的死傷，我認為不值得同情，就和美軍超過三八線的死傷一樣，人民打死他，是罪有應得。人民死傷是很大的，運動不是少數人，是廣泛的隊伍，政府的軍隊無能鎮壓而請了外國軍隊，蘇聯因爲人民力量太強大，不能不武力鎮壓，人民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是不幸的，精神上的痛苦加上肉體上被蘇聯紅軍打死打傷，不幸的是人民，而不是赫魯曉夫，不是格羅、卡達爾。……對人民應說服，人民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政府只能循循善誘，沒權用刺刀逼着人民走，我同意法國五十多個作家對蘇聯的抗議。不能用刺刀逼着他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人民已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哪怕是痛苦的道路，只要人民自己願意，爲什麼不叫他選擇呢？這是方法問題。匈牙利事件不能只從無產階級利益出發解決問題，人民沒有認識到的時候，強迫接受不行。”

“有人認爲開始是人民的革命行動，後來變成了反革命性質。卡達爾說開始就是反革命事件，這是使死了的人民無辜的背上了叛國罪，我是同情人民反對政府。從蘇軍和匈牙利人民的關係上看，蘇軍不是我們黨史上說的那麼完美無缺，大國主義及不守紀律是有的。蘇軍在東北辦報提詞上有人說他是污蔑，我相信蘇是好人，他不會違諾，可以看出，蘇軍在東北是有過問題的。這次回家時碰上一個部隊同志，他說明蘇聯軍隊不守紀律，他們有自己的兵營，如果中國人走過，他們認爲來歷不明就開始開槍打死；八一五時，蘇軍有一路到北朝鮮，給別人留的印象不好。……反蘇情況在東歐是普遍現象，應該考慮蘇軍和別國居民的關係問題。從道理上講爲了顧全世界和平不該反蘇，但問題不那麼簡單，蘇軍在在別國是爲了保衛別人，如果保衛者成了危害者當

然要反對。這是匈牙利事件原因之一。

匈牙利人民生活問題，資金調配不合理，輕工業、農業投資少，人民生活受影響，人民要求改變這種情況，如果是可以解決的不會起來暴動。暴動是醞釀了好久的，以前一定提過而沒改善。說明了官僚主義。人民起來推翻這種腐朽的機構是對的，我要是匈牙利人民我也要拿起槍桿。

匈牙利事件是人民革命，反動分子參加是有的，因為政府鎮壓人民，使反動分子參加了暴動，因為匈牙利政府不能附合人民利益。而反革命能附合人民要求所以人民跟反革命分子走。

匈牙利一定不民主，人民代表會不會有權，掌握國家命運的不是人民，而是一、二個壞蛋的領導人物，我對匈牙利人民是同情的。

匈牙利學蘇聯帽徽，改國慶日這是毫沒氣節，沒民族自尊心，把蘇聯當作光榮是變態的洋奴。

鐵托基本上對，但有些地方狡猾了些，斯大林主義是斯大林自己提出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不同在於政治組織是否健全，和羣衆的關係等等，如果從這方面看是存在斯大林主義的，斯大林屠殺是爭權奪利，有些不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品質問題，如匈牙利領袖生活腐化墮落，和舊政權沒什麼分別。

“有人說匈牙利事件國際帝國起了主要作用。有人又說事件完全是反革命分子搞的，如果不是口說的話，則是缺乏考慮，有一種論調，一切問題都推在帝國主義頭上，以往這樣是從概念出發，不合乎真理，我們對匈牙利事件也要複雜的看待。匈牙利事件的造成，匈牙利的黨和政府要負主要責任，拉科西、格羅在以往我是崇拜的，在法西斯法庭上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但執政之後變質了，他領導的黨和政府不糾正缺點和錯誤，他要負責任，如果官僚主義錯誤不嚴重，人民不會起來的，如果只是帝國主義幾個電台號召，全國人民會起來嗎？拉科西的永遠被開除出黨是罪有應得的；另外蘇聯政府以父與子的關係對匈牙利造成了匈牙利軍隊和人民的反蘇，拉科西是喪失民族氣節的人，匈牙利事件是蘇聯自食其果，這一些問題斯大林也要負

責。總之，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外因是要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蘇聯第二次出兵匈牙利我同意鐵托的看法，為什麼必要又錯誤呢？必要而錯誤的事多得很。如‘第四十一’的小說中描寫的部隊和大部隊斷絕聯系而搶了路蛇隊這是必要的，但是不光榮。又如一個革命者爲了解放區去，從監獄出來沒法而偷盜，這並不光榮，可是必要，並不矛盾。有些人對鐵托個人似乎吹毛求疵，他看問題深刻正確，勇於維護真理這就是政治家的風度，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我們以前畫人家就是一條狗拴在帝國主義脖子上，難道是政治家的風度嗎？我們要看他的意見是否正確，他的態度就是不好而意見正確就該採納。鐵托是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對現實做了最正確的判斷，不是他提出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在此談這些問題，我們受到了鐵托同志的啓發，我們要獨立用自己腦子來考慮問題。開口就是無產階級利益不解決問題，無產階級利益是抽象的，我們應考慮國際慣例和國際法，我們抓住國際法，大呼帝國主義不合國際法，是不是我們有利時就抓住國際法，不利時就不要國際法呢？我們自己犯了國際法就說國際法有階級性的……，蘇聯出兵匈牙利造成的後果是不可估計的，如法國五十多個作家離開了我們，他們是進步的，他們反對蘇聯是錯誤了嗎？我們的報紙向來是封鎖消息的，社會主義好，但用刺刀帶來就是錯誤的，歷史給他下了結論如何也翻不過來。”

“把匈牙利事件說成主要由於帝國主義，是自己騙自己。”

“第一次出兵不對，第二次出兵也不對，第一次是斯大林式的向外擴張，人民反蘇不是幾個人的問題，蘇聯出兵把問題擴大，複雜了。第二次出兵所以必要是因為蘇聯第一次出兵已造成了不好的局面，不能不第二次出兵。國際法的問題，蘇聯向來不合國際法，只要合乎他的利益就是國際法，只強調無產階級利益便認為一切是合法的，這一套已騙不住人民了，他爲了一國利益是談不到國際法的，第二次出兵不合法，華沙條約規定，帝國主義出兵時才可以出兵，而蘇聯在人民內部鬥爭時出兵是干涉內政。”

“匈牙利事件的歷史意義：

1. 斯大林式的工作方法已吃不開了。
2. 人民是永遠不朽的。
3. 給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爭來了民主和自由，匈牙利人民的血沒白流。
4. 匈牙利人民的失敗是對反革命沒有警惕，以後無論那國暴動時一定要注意警惕。
5. 匈牙利事件是十月革命後第一次重大事件。”

## 對南斯拉夫的看法

“匈牙利事件後，鐵托發言，有許多人不大習慣，這是因為我們平時聽慣了歌功頌德的東西，我們聽慣‘我們完全支持’，‘我們完全贊同’。我們世界各國共產黨以前是一個話筒說話的。南斯拉夫發言說人家破壞國際主義團結，而我們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就不破壞國際主義團結嗎？對同志的批評如果是正確的接受，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從莫斯科到北京認識都是一致的。

南斯拉夫進行的革命比東歐各國徹底，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武裝，他們力量較強，不如別國聽話，所以斯大林打壓南斯拉夫，開除南斯拉夫出社會主義陣營，對南斯拉夫人民的自尊心及鐵托個人都是傷害了的，用各種辦法攻擊南斯拉夫及鐵托，扣各種帽子。而南斯拉夫還不錯，不咎既往，願意和蘇聯和好。蘇聯的確在各方面走入了死胡同。赫魯曉夫是較英明的，正在改進國際關係。南斯拉夫是我們的好伙伴，不能把關係搞壞，鐵托對國際上的大事，作爲同志是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在鐵托提的問題上，具體的事實，真還很發憤激呢，而從其他問題上聽笑別人。南斯拉夫是值得同情的，他們自己在無援助的條件下堅持下來了。有點困難有什麼可議笑的呢？沒辦法的時候向美國借點錢，又沒有在政治上追隨美國。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還援助呢，爲什麼不可以幫助南斯拉夫自己的同志呢？他自身有缺點，農業不好，但發言權還是有的，他的發言很精闢，提

供了在匈牙利事件上我們不知道的事例，提的尖銳，就是敵人提的也要考慮一下的。批評應當像魚和水一樣，這是我們提的，可是別人一批評就暴跳如雷。承認向社會主義過渡有多種形式是英明的，另外和平地區這問題也是好的，縮小了帝國主義勢力，緬甸、印尼、柬埔寨都要團結，而南斯拉夫當然更應團結，以前對南斯拉夫的政策錯了，今天仍然繼續在錯下去，如不糾正是不應該的。”

一個國家在另一國家的統治下是很不對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只是在共同聲明上，會議公報上，會議揭發子是平等的，但是在其他問題上，蘇聯是用自己的力量統治別國的。軍事、政治上蘇聯控制了匈牙利，拉科西簡直不是匈牙利人民的領袖而蘇聯的奴僕，在匈牙利事件暴發的原因上，蘇聯和東歐各國關係是致命點。蘇聯出兵匈牙利問題完全同意鐵托的看法是‘必要的，但是錯誤的’，用外國人的力量發順本國人是愚蠢，可是不出兵匈牙利就完蛋了。所以又是必要的，這不是矛盾而是辯證的。如芬蘭的土地被蘇聯佔去，對蘇聯的勝利有好處，但是割別國一塊土地是錯誤的。這是辯證的關係。

社會主義二黨之間意見有分歧提出不同看法是允許的，如果說鐵托發言不利於國際團結，但是比較起蘇聯統治別國引起不團結要好的多了。

蘇聯以往處於孤立地位是可以理解的，而南斯拉夫一直處於孤立地位。四面楚歌，處境是非常困難的。可是他們堅持下來了，鐵托是了不起的。現在情況正在改變，應該使別國有獨立自主權，一國統治一國是不正常的，幫助是不可以。

“我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什麼時候開始感興趣呢？批判了斯大林以後。因為我是從這點來理解南斯拉夫的：感到南斯拉夫人有骨氣，當時在斯大林專橫粗暴的外交政策指導之下，差不多東歐國家基本上都是察顏觀色然後行事的，基本上是這樣的；但是南斯拉夫就與斯大林對抗，我感覺南斯拉夫有點味道，好象值得研究一下。所以批判斯大林以後，我就主動去了解南斯拉夫的情況，我感到南斯拉夫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有很大不同。南斯拉夫的優點之一吧，就是它的革

命是比較徹底的。南斯拉夫爲什麼革命比較徹底呢？她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他們在對敵鬥爭中培養起來的，在解放南斯拉夫的時候，是南斯拉夫的人民軍和蘇聯紅軍共同動作，在解放貝爾格萊德，把法西斯侵略者趕出南斯拉夫的間諜，他們是並肩戰作的，那末這就跟東歐情況，主要的由蘇聯的軍隊來解放的那些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爲南斯拉夫的革命是比較鞏固的，就是說南斯拉夫的黨是奮鬥中成長起來的，它原來就與人民羣衆有聯系，南斯拉夫領袖鐵托同志這樣的人是在鬥爭中與羣衆取得聯系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同時南斯拉夫領導人是有羣衆基礎的，就是南斯拉夫有力量吧，這就是爲什麼南斯拉夫在過去勇於跟斯大林碰碰，南斯拉夫在很多方面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在東歐有些國家在去年下半年普遍地產生了反蘇情緒，那是爲什麼呢？那就是說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在這些國人民心目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蘇聯某些政策損傷了他們人民的自尊心，造成這樣一個後果，但是，南斯拉夫她沒有吃這個虧，她就比較果斷一些，當時即使是在斯大林的威力之下，南斯拉夫並沒有屈服，當然後來在斯大林同志主持之下把南斯拉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南斯拉夫被開除以後，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就是處在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吧，孤伶伶地一個人。但是南斯拉夫的同志們，並不因爲自己困難而放棄社會主義，他們堅持下來了。這一點我認爲表現了南斯拉夫同志們的勇氣，很大的決心，據我個人對南斯拉夫的一些領袖們在這點上我是很敬佩的。我記得我們中央寫的文章裏面，也在談南斯拉夫同志們那段時間的心情是能夠理解的。的確是這樣子。南斯拉夫當時受了委屈，但是，它自己並沒有失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而且我認爲南斯拉夫是比較寬宏大量的。那末，當時它受到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很厲害的指責，說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是帝國主義‘走狗’，把他們開除了。在七八年前，南斯拉夫遭到了很大的攻擊，但是在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了貝爾格萊德以後，我們看到鐵托同志表現得還是挺好的，就是不答託住吧，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着想，他們沒有鬧意見，沒有鬧成見，蘇聯來主動找他們恢復關係，他們很愉快地

接受了，並沒有故意留難，而且也沒有發表聲明把蘇聯以前作得不對的地方罵一頓，沒有表現意氣用事，沒有表現這樣的東西。雖然鐵托同志是一個小國的領袖，但是在這一方面，我認爲他是表現了一個大國領袖的風度的，我個人是很敬佩他的。蘇聯在最近以來，是主動地改善了蘇南之間的關係，不過我認爲在蘇聯某些地方、某些看法，我還是不夠滿意。比方說，在匈牙利事件後，鐵托同志就匈牙利事件發表了一篇演說吧，但是，‘真理報’發表了一篇評論，評論鐵托的演說，那末當時裏面講到這樣一些問題，蘇聯他們有這樣的意見，還覺得你南斯拉夫還講人幹什麼？你自己有很多缺點嘛，比方你農業就搞得不好哇，比方你還接受美國的錢，要美國的錢，就在這點也攻擊了南斯拉夫，這點蘇聯是不夠好的，表現蘇聯還帶點情緒吧，蘇聯那末大一個國家，赫魯曉夫同志都是六十幾歲的人啦，還帶點情緒。我還記得好象我們中央也對這一點有兒意見，這當然是內部消息囉，好象在莫斯科也講到了這一個問題。其實南斯拉夫的農業發展，是不能令人滿意，也就是說南斯拉夫在過去幾年與外面是隔絕的，南斯拉夫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因此，南斯拉夫的工業有一定的發展，那末農業還是來不及照顧，這在農業方面還是有些缺點，那末今天大家作爲都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一員，大家都是向着一個共同目標前進，都是戰友，我認爲對於對方的缺點不應該嘲笑。蘇聯對於南斯拉夫農業落後，應該進行幫助，應該給予它貸款，給它輸出機器，向它派出農業專家，幫它規劃農業；我認爲應該採取這樣一個幫助態度。但是蘇聯在這方面作得不夠，並且把南斯拉夫農業落後當作一個口實，在必要時候來反駁南斯拉夫。對蘇聯這點我是不滿意的。我當時就講了，我說‘蘇聯真理報真扯蛋！’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真理報，我看到真理報這一段我不滿意，所以我就罵了真理報一句。另外，關於美援問題，我想談一談。美援當然不好，因爲它是釣魚用的吧，不過，如果是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那末我認爲在必要時接受一下，也沒有什麼關係。當南斯拉夫處在很困難的時候，是接受過美援，不過南斯拉夫並沒有出賣自己的民族獨立，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國家主

權；南斯拉夫沒有參加美帝國主義所策劃的排他性的軍事集團；南斯拉夫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國土給美國當軍事基地。南斯拉夫就是用了美國幾個錢，將來還是要還給它的。而且在內政、外交上保持了它的獨立性，並不是拿了幾個錢之後，就讓美國牽着鼻子走。所以我認為當時接受美援，當然不夠好，不過也該應理解人家那種情況，是很困難。那末今天你說它不應該向美國借錢，那你就借幾個錢給它嘛；我認為蘇聯現在可以借幾個錢給他，讓它把美國的錢還了就是。不應該拿這來嘲笑人家。今天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邊，不僅是南斯拉夫接受美援，波蘭政府也接受美援。波蘭政府它說如果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我們願意接受美援。它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去談判，就是你不用帶政治條件，我何樂而不用一下呢？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是吧？所以拿這個東西來攻擊南斯拉夫，我認為是不夠好的。當然我並不主張我們的國家去接受美援。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波蘭它要接受美援我不反對，但是作為中國來說，我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我有中國民族的自尊心。過去美國在中國搞得怎麼樣呢，我看到了一點，所以我不願意中國政府去接受美援，當然我們的國家也不願意接受美援。另外我對南斯拉夫的一些內政問題，有些興趣。南斯拉夫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吧，就是它的經濟權是下放的，就是國家對於這個經濟企業的生產不作直接的領導。當然也訂計劃，也有方針，也有個具體的安排，還不過不是象我們這邊這樣子控制得很嚴密。那末這樣作，是否有好處呢？也可能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這壞處可能是不夠集中吧，那就是國家對全國的經濟情況，不能得心應手很好地指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防止了很多的官僚主義。那末蘇聯現在就是這樣作，大體上是差不多的。我認為以後管理經濟的權力是可以下放的，每一個工廠生產什麼東西，不一定要中央和國務院來管理，那末中央可以通過一個方針，一個計劃，把這個權力都委下來，讓下面管。有人攻擊這一點，叫作修正主義，什麼修正主義？就是黨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我認為這不是什麼修正主義，因為如果是完全沒有領導就是修正主義，但是呢，南斯拉夫是領導，不過領導的方式不同。那末蘇聯又把經濟權下

放，放到各個州，各個共和國，這是不是蘇聯也是修正主義呢？我的看法不是。

另外，我對南斯拉夫的工廠工人委員會也是有興趣的。南斯拉夫在工廠裏面，最高管理機構是工人委員會。工人委員會是好呢還是不好呢？這值得研究，南斯拉夫好象也是在試行嘛！我看我們國家裏也好象在試行，什麼職工委員會，也是在試行中，我認為也不妨多試試，蘇聯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多試行，但是其他國家有什麼新鮮東西，新鮮材料，也不妨拿到我們國家來試一試。如果好的話，就拿來採用，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至於方式方法，我認為是沒有階級性的，只要是好的就可以採用，如果工人管理委員會這個形式好的話，我認為可以採用，沒有什麼了不得。

南斯拉夫國家裏面對文學藝術是不作直接干預的，這是他們在最近幾年來的改進。我記得在南斯拉夫電影過的時候，南斯拉夫電影藝術家會到中國來跟中國電影界談到這樣一些問題（他們說過去的南斯拉夫也是採取行政領導的辦法，採用行政機構來領導藝術，因此意識去也發生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就是把文學藝術這樣一種特殊的性質抹殺了，好象領導工廠生產、農村生產一樣，這就是忽視文學藝術的特點！這就使得過去南斯拉夫的文學藝術事業不夠繁榮，不夠興盛，人民也不滿意，後來南斯拉夫的黨放棄了這點後，他們作了改變，特別是根本性的改變。他們改變的方法是對文學藝術事業不作直接干預，但有一個方針，就是為人民服務吧，但是它沒有象我們國家裏這樣層層的一套機構，文學藝術家可以自由組合。那次電影藝術家主要是談的電影方面的情況，他們說一些導演、編劇、演員、美工、攝制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員可以自由組合在一起，自己願意創造什麼就創造什麼，這樣就避免了行政上的過多干涉，使藝術家們產生比較大的積極性，這個方法在南斯拉夫使用的結果是好的，經驗證明，是能夠推動文學藝術發展的。）南斯拉夫電影代表團團長談到這個情況很興奮，他談我們過去電影專業不夠好的，人民也不滿意，最近一年來我們的電影專業有了很大提高。我們在學校也看過南斯拉夫電



影，我拿來與中國電影比較了一下，也與蘇聯電影比較了一下，我認為他們的水平是很高的，的確是這樣，水平是高。在這方面中國也好象叫過一陣，比如去年底和今年年初，在上海有些電影作家提出來了，當時好象名單也擬好了，不過現在也沒有下文了。據我看也可以試一試，上海電影制片廠就可以按南斯拉夫這個經驗試一試，但是一直就好象沒有搞過，長春電影制片廠也還是那個老辦法嘛，這是固步自封，不作改進，那是不會有進步的，有很多東西都要經過不斷實驗，就是不要保守！人家的一點一滴經驗都該應重視，可是中國電影過去叫了一陣好象就沒有下落了。當然，我對於南斯拉夫某些優點的肯定，並不等於說我主張我們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沒有這樣的意見，南斯拉夫的道路是根據南斯拉夫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它適合於南斯拉夫，並不一定適合於中國，所以我不要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但是，我希望對南斯拉夫的具體經驗，應該引起注意，供參考，很好地研究一下。現在對南斯拉夫準備了一頂帽，就是修正主義，一談南斯拉夫就給你戴上一頂帽子，就是修正主義，你就不能講話。我就有些想不通，到底什麼是修正主義呢？有些同志對修正主義自己都不懂，但是可以隨便罵別人是修正主義。只要它能向社會主義，只要它能提高自己人民生活，修正主義有什麼了不得；如果不能提高人民生活，不能使國家富強，就是馬列主義也不贊成。換句話說，如果馬列主義真要修正的話，那末就是修正一下也沒有什麼可怕，馬列主義本來是在不斷地修正之中，換句話說，就是在發展之中，應修正的就修正，所以我認為在名詞上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當然，我對南斯拉夫也有一些地方不滿，南斯拉夫比較驕傲一些，比如主張它的道路是最好的，好象全社會主義陣營都應該走他的道路，所以它這個就錯了，但是別人走就不一定對，所以鐵托同志在這方面缺乏個人的謙虛，我同意過去報紙上對他的一些批評。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態度也不好，有點大欺小的味道。在南斯拉夫裏面還有些現象是消極現象，就是在南斯拉夫市場上美國電器佔很多，大約佔了90%以上，這種現象還是不好的，黃色電影進入到南斯拉夫，自由市場泛濫得比較厲害——

些，國家控制的市場比較小，資本主義市場比較大，所以我認為南斯拉夫是有缺點的，現在我們看南斯拉夫要全面看，優點和缺點都羅列出來。”

“對於南斯拉夫在抗日勝利後，解放後，所看到的是把鐵托畫成狗、帝國主義幫兇，看蘇聯的小說上把格魯都說成是由貝爾格萊德派去的，1955年的看法變了，南斯拉夫是朋友了，鐵托也不是走狗，報上登的和以前不同了，究竟是以前人民日報進了謠，還是以後的人民日報進了謠？以前我們對南斯拉夫的態度不對，1948年蘇聯把南斯拉夫開除社會主義陣營，是因為鐵托不依照蘇聯的主張去做，而是按自己國家的辦法去做，這就打擊別人，有人說鐵托發言不謙虛，起碼人家的報上沒有把咱們畫成狗，鐵托的發言有些偏激可以原諒，而大部發言對的。”

# 關於整風運動及反右派鬥爭

## 關於整風運動

### 歪曲整風運動的性質、目的、原因

“從目前情況看，運動超出了幫助黨除‘三害’的範圍。已是羣衆爭取民主，爭人權和人的尊嚴的運動。幾年來由於法制不健全，人權受到了侵害；而侵害者未受法律制裁。人們要求社會主義的民主是很正確的。只要是維護社會主義的利益，誰也不能斗爭他。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高形式是保障民主和人權。幫助黨除‘三害’，是治標而非治本之辦法。‘三害’是現象，非本質。‘三害’所以發生，其根源在於法制不健全，黨員有特權，（鬧人、斗爭，可以不持證據）；同時跟中國人民一向受壓迫，沒有民主傳統有關。雖然憲法，共同綱領規定了公民的權利，但是實際上，其中很多地方被剝奪了。致使違法者可以逍遙法外，為此，應該有一個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運動，要求國家有健全的法律，對破壞人權者予以制裁。同時還要反對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理論，如爲阻錯誤的人辯護‘陽莊必須過正’等等。

目前運動只停滯在知識分子中，廣大工農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民主權利，當權利被侵犯時，只好憤郁于心。當前要向人民羣衆宣傳他們應該享受到的民主權利，羣衆運動轉向爭取民主和保障人權是正確的方向。爲了使方向正確，應該向‘根源’發展。否則，再過三年，‘三害’仍然猖狂于輿的”。

“整風運動的性質，在武大基本上就可說是幫助黨整風，但是帶有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的性質，由於三反，肅反中陷害大量無辜好人，使三害分子和被斗錯人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如果黨今天不承認爭民主爭人權性質，那麼整風就是關門整風，是宗派主義整風，根本不

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因爲人民內部矛盾完全是三反、肅反中制造出來的，這種矛盾還帶有對抗性矛盾的性質。目前除三害已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改變根本制度才能解決問題。”

“現在的時代是理性萬歲的時代，在這次運動中要求得思想徹底解放，我們反對作樣子，也反對別人一根棍子（按：應該是反對‘思想束縛’）三害是現象，根本問題是人民沒有行使自己的權力機構，解放以後，我們就沒有行使罷免權的可能，例如羣衆要罷免×××、×××的學委委員，就沒有這樣一個機構，所以這次運動必須要搞徹底。不僅是除三害，而要超出這個範圍，必須爭民主、爭自由，健全法制。”

“運動已超出了整風的範圍，現在已發展到在全國清除三害，發揚民主，健全法制，保障人權的運動，違反法律即是破壞法制。如果不是違反了憲法，不是他們（按：指共產黨）做了見不得人的事，爲什麼外國代表團來學校參觀時，他們把那些人（按：指該院離反省者）要趕到運動場上去散步呢？我們要求撤換那些不稱職的幹部，要求給予那些違法的以法紀處分，我們要求行使罷免權，……同志們！你們說我們有什麼民主。目前運動必須是維護自由、維護憲法。”

“這次整風運動和五四運動有着同等的意義。”

“這次整風運動是一個民主運動，對領導來說是發揚民主，對羣衆來說是爭取民主。運動已超出了整風的範圍，我們要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權。三害不是根源，根源在於法制，要爭取真正的民主自由，我們要求全國熱愛真理的人們支持。”

“在過去，人們的思想是受到一定的約束的，因此不僅對違法亂紀的現象往往敢怒而不敢言，而且不敢大膽地懷疑現實，大膽地獨立思考，大膽地干預生活，大膽地創造未來。這就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沉悶氣氛，像一層烟霧似的籠罩在陰暗的角落裏，在這種氣氛的籠罩下，社會主義的花朵是很難開放的，所謂人類生活的青春

也是很難出現的。這一次中央提出了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這同時也是發揚民主的有力措施，因此在全國範圍內，不僅掀起了個反對“三害”的熱潮，也在人的思想意識中掀起了個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熱潮。這個熱潮作為思想解放的開端來看，有着比 1949 年革命勝利更為深刻，更為偉大的歷史意義，也是它的必然結果，只有為人民羣衆不僅在政治上獲得最終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獲得解放時，人類盼望了幾千年的青春時代就來到了。”

“現在運動的性質已經超過了幫助黨整風的範圍，是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的運動。我們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治病救黨，治病救國”。

“現在我坦白地告訴你們，就是向共產黨爭，因為共產黨是當權者，必須用‘給黨委施加壓力’的手段，以‘爭取的行動，使執政者迅速擴大民主’。‘運動不僅限於本校，而且要擴大到校外去’。

“某些方面不應該限制的而被限制了，或者把民主自由的範圍無邊際的縮小，這是一種錯誤。……在我們國家裏是存在着這種不必要的限制的，而擴大民主的本身正說明了有不必要的限制的存在。我所說的限制包括二個方面：人爲的和不自覺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賦與人民廣泛的民主自由，但是維護社會主義的當權者作了某些不必要的限制，……當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的時候，我自然會放棄這個口號。”

“我認為，向共產黨爭民主、爭自由是完全可以的，我可以提出六條依據：

(一) 不同觀點的學說不許同時并存，只許唯物主義，不許唯心主義，只許米丘林學說存在，不許摩爾根學說存在等。

(二) 不同觀點的論著沒有同等的出版機會，例如支持李森科和勒柏辛斯卡姬觀點的論著可以出版，反對他們觀點的被認為是反對學習蘇聯而不予出版和恩格斯的“從猿到人”的不同的觀點不予出版等。

(三) 新聞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正如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所說的，報紙成了廣告牌、傳聲筒、留聲機、翻版書，這正說明了新聞的不自由，新聞採訪業受到了不必要的限制。

(四) 秘密彙報代替了正面的思想教育，妨礙了人們的言論自由，大帽子政策普遍存在。

(五) 等額選舉制度成了變相的任命，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的資格當作照顧民主人士的一種方式。

(六) 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在貫徹黨的思想政策中起了支配作用，使人們的思想受到不應有的束縛。例如，濫罵罵街式的學術批判，機械的思想教育等，因此思想解放成了一個響亮的口號。”

“有些無辜的公民，在三反‘思想改造’肅反運動中橫遭三害分子的迫害，他們坐監禁、抄家、甚至一天罰跪七小時，他們喪失了人的尊嚴，有的因君子可殺不可辱，而自殺身死，我應該為這些無辜的受難者鳴不平，難道今天結合剷除三害的整風運動，提出擴大民主權利，爭取維護人的尊嚴和保障人權的要求是不正確的嗎？”

“××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什麼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教授被叫做×犯××，隨便把人家關起來，這自由麼？”

在我們生活裏有這樣的情況。×××踢人七腳，×××，×××寫信給我說在運動中被打耳光等，就是實在的事實。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肅反中團員隨便打人，只受留團察看處分，就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現。這人權、民主不是成問題嗎？但這個口號被路透社、法新社知道了不好，可以換一個說法，我覺得要用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提法是對的。我們說共產黨是光榮、偉大的，不等於說它沒有缺點，那個舊口號不是壓下去就了事，應用健全的新口號來代替。”

“這次運動，在黨內是一次整風運動，在黨外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革命鬥爭。直至今天，這種民主革命運動仍被一些人理解為在黨的領導下幫助黨整風，這種理論調上，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別有用心，他們要我們睜眼睛，關在籠子裏，仍像過去一樣用鼻子去生活，……但是我們要大吼一聲，這是辦不到的。”

“為了根除‘三害’不僅需要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必要的制度，擴大民主生活，保證今後我校各部門工作都能夠受到羣衆的監督。因此，我們希望全體教職員工同志今後在黨委會和學委會的領導下，除繼續大鳴大放，繼續揭露內部矛盾外，還要開始對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加以研究和討論。”

“運動往何處去？往解決矛盾的地方去。目前羣衆很積極，熱情高，做法很正直、英勇，領導走在後面；某張大字報上寫劉真同志是保守牌牙痛，還很對。有很多問題由於某種原因不便向羣衆宣佈，領導在唱雙簧，先拿一套試一下，如果能通過就算了，不能通過就出第二張牌，例如合作社改名問題，其本質是宗派主義，相信不學無術的人，反對正直的老教授，這次先由陳治卿作檢討，看來很深刻，但裏面隱藏了很多的問題，羣衆不滿意，張希光只好出面解釋，他的這次講話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流暢得多，可見事先有很好的準備。又如對張勃川夫人問題，兩個二年前我就向王任重提過，在羣衆的意見提得沒辦法的時候，黨委才決定將他調黨委會，這一來羣衆又憤怒起來了，昨天下午才不得不調到衛生科，這也是一套把戲，關於黨員福利金問題，昨天宣佈全部退掉，這是唯心主義的工作方法，有困難的人就不應該退，而有的人，如羅誠運，熊守讓（四年升十一級）就應該退；我對劉真同志為首的黨委會是信任的，但覺得他對有的問題也處理得不漂亮，我以為黨員應該真正與‘三害’作鬥爭，很多黨員是深受羣衆愛戴，而有的黨員對別人是0-1甚至0-0，對自己是0+1，對人是馬列主義，對自己是馬虎主義。”

“應該把目前運動由細尾末節的鎖事引向重大的根本問題，你們（訪問者）提出的黨委制即這類問題，只停留於大字報，大喊大罵是

不夠的。”

“提雞毛蒜皮的沒有用，應該提全國性（根本性）的問題。”

“陳仁炳向黨算舊賬，這個一件有意義的事，是正確的。三反、肅反不知道陷害多少好人，制造了人民內部矛盾。不算這些舊賬，就是否認人民內部矛盾的存在。解放日報的社論‘論算舊賬’除了維護三害，維護強權以外，還有什麼意義？”

“幾年來，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特別是在肅反運動中，還留了不少問題，人民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化了，好像一座火山，一旦爆發將不可收拾，毛主席坐在寶座上已感到屁股股，故發動整風，讓火從小口中慢慢放出來，一下子放得太大也不行，會把他們燒死。”

“整風是由於羣衆對黨的意見太多，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太嚴重，黨看到情況不好才提整風，否則便會垮台，整風是向黨提意見只應提缺點不要提優點。”

“中國搞的一團糟，不整風要鬧匈牙利事件。”

“這次大鳴大放是由匈牙利事件才能獲得的，匈牙利事件的意義多麼重大啊！鳴放後一定要感謝他們。匈牙利人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以前我認為人民內部沒有矛盾，現在這樣尖銳了，如果不提出‘鳴放’，中國就危險了，這一下子人們可以把壓抑在內心的痛苦發洩出來。”

“以前是共產黨整別人，現在別人整整共產黨也是應該的。不整風黨要腐化了，到那時龜兒子才不退黨。”

## 歪曲黨的整風運動的方針

“學生會、學生黨團支部、班三角：你們是廣大同學的真實領導嗎？你們在以前的各種運動中都是大吹大擂的，這次為什麼捲（偃）旗息鼓、裹足不前呢？你們難道只能唯‘官’兒的鼻息是承嗎？三害的毒氣不亞于封建禮教，我們現在的學校不會比巴金先生描繪的

‘家’要好。難道你們願意扮演高麗新的角色嗎？是解剖你們的時候到了，你們是‘官兒’的爪牙，還是同學的好領導，這個運動會給公正的宣判（判），我們熱忱都（希）望你們不要唯‘官’話是聽。我們熱忱地希望你們大胆的領導廣大同學‘放’起來，‘鳴’起來，徹底摧（毀）除萬惡‘三害’。”

“我想這次整風運動，是比較特殊一些，與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都不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黨發動羣衆來整自己，所以我就感覺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現得縮手縮腳一點，害怕一點，怕痛，不夠積極。

“據我當時的感覺，是不是下層黨組織和某些黨員本身並沒有認識到整風運動的重大意義；提出要整風、提出要開座談會，恐怕還是組織性的保證，服從上級的決議。我在當時是這樣講：我說這個運動是比較特殊一些，羣衆如果不主動起來的話，那末這個整個運動就不會弄得徹底。因為這個運動不像過去那樣，全黨上下一致動手，同心合力，這裏面有的先進，有的落後，有的決心大，有的決心小，所以我認為在有的地方，黨的決心表示得不夠的地方，羣衆就應該主動些。而在羣衆起來以後，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就是不能按照黨的原來意圖劃一個小圈子，在這個圈子裏面要你講什麼就講什麼。不要你講什麼，你就不講。所以我認為整風運動既然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的利益問題，那就不能依照某些黨組織的狹隘觀點、保守觀點，或怕痛，而羣衆就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你要我批評公文旅行，我就講一講這個現象，你要我批評留助教留黨員，我就談些雞毛蒜皮的現象。我當時有了這樣的錯覺，要羣衆起來，打開一下局面。這種思想在我腦子裏是逐漸發展的，到了五月中旬和下旬，我就聽說中南民族學院語文專修科，成立了自己的行動委員會，同學們有自己組織了，對院內的重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還打算到北京向國務院請願。我當時在思想上是同意這樣一個組織的，我認為他們只要不造反，只起來提些意見，那有什麼不可以呢？”

“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在貧窮和苦難中呻吟了幾千年，我們的祖

先，一代又一代的爲自己的子孫祝福；這祝福，不是教堂裏牧師的晚禱，不是偽善者的假仁假義，更不是絕望的人對虛幻的呼救，這祝福是生存權利的呼聲，是個性解放的呼聲，是人類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幸福，創造未來、創造光明偉大的生活的呼聲，這聲音低微而親切，誠摯而感人，它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流傳了數千年，這聲音愈來愈清晰，愈來愈響亮，它像激怒的海濤，黑夜的風暴，它席捲了封建王朝、買辦官庭，可是直到今天，它才冲破了愚昧、胆怯、呆板、沉默的外壳，飛向大地，飛向光明，飛法生活，飛向幸福的明天，像一羣自由的小鳥。”

在過去一段鳴放中，羣衆已經揭露了不少的問題，有些甚至於是相當嚴重的違法亂紀的問題。我們希望校部領導同志重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與廣泛性，並採取主動的誠懇的態度，把其中必須解決而且可能解決的問題，立即解決。拖延與敷衍，只有增加羣衆的反感，增加迅速改善黨羣關係的困難。”

“對黨可以算舊賬，對朋友則不應算。”

“這次整風運動是黨吸取匈牙利的事件，來一個先下手爲強，怕搞出匈牙利事件來，……整風運動是匈牙利事件的變相，是自上而下的大民主。現在黨支部徵求意見爲時過早。大搞一下再說，他們想爭取主動，我偏不讓他們主動。其實，我們的主要目的還不是搞黨員而是搞全校性的大問題”。

“運動性質是爭人權、爭民主，黃××（班長）統治了我們，我們要向他爭民主，”

“現在很累，但爲了‘真理’，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

“對三害份子整風，和風細雨是不解決問題的”。

“什麼大民主小民主，我根本不同意這種提法，我要搞大民主”。

“搞大民主有什麼了不起，幹反革命我都敢幹”。

“現在（鳴放時）非要羣衆這樣的壓力才行，不然的話，他們（黨員）彼此都是一樣，還批評什麼呢？”

“現在，黨中央整風是‘和風細雨’的方針，我要把它改成‘狂風暴雨’，我是喜歡狂風暴雨的。”

“發動羣衆起來鳴放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放出一個匈牙利，就是一個匈牙利。”

“羣衆，工農和市民對大學生不了解，長江日報如果不登武大鳴放新聞的話，我要上街頭，往農村工廠去做宣傳”。“示威遊行我帶頭。”

“這次整風運動，不僅要整黨，而且要清黨”。

“一時爆發起來的憤怒的火焰席卷一切！凡有良心的人均紛紛披劍而起，而那些官僚黨員先生們，學法條（註：即將政治當飯吃，沒得馬列主義就要餓死的君子）的法官們以及借此時機向官僚立功的獅子狗們，並居然欲鳴而鳴不下去，欲爭而結果惱羞成怒，哈哈！”

“自從同學大鳴大放後，運動顯然起了大的變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學們很英勇，今後運動不能忽視這個力量，有人看見過漫畫中諷刺，覺得似乎有問題，我認為目前運動進展的很健康，與歷次運動比，這次運動很正常，羣衆有理智，也很有節制，雖然個別地方看來有點膿瘡，但是主流是正確的，同學們絲毫沒有錯，不要氣餒。”

“我不贊成隨便使用大民主到大街去遊行，但是在學校範圍內搞一搞可以。”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過程，我們應該看黨委領導的具體情況，不要隨便施加壓力，壓力是我們手中一張王牌，不是萬不得已不應該隨便攤牌。”

“同學們所出的大字報差不多我都看了。運動進展得很正常健康，符合發展的規律，這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人們看到了八年來所產生的流弊。××說：‘我們要求和風細雨，但出現了狂風暴雨。’大字報的名字似乎有點狂風暴雨，但出現了狂風暴雨的形勢，很嚇人，但它們把人民羣衆所受的冤屈尖銳地揭露出來了。武大的黨羣關係是銅牆鐵壁，光靠教工是不能推倒銅牆鐵壁的，必須要有同學們的力量參加進來，才能攻破，才能把武大的壘坎、骯髒的東西掃

清。這個‘狂風暴雨’是完全必要的。”

“整風運動是否深透，第一，要看黨員是否能起來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因為往往有這種情況：黨內原是有爭論的，到運動來時，就團結一致對外，反而爲官僚主義者辯護，上海有些學校教員在一起談話時，聽說黨委書記來了就說紅燈關了，不吭聲，這就是宗派主義的結果。第二，要看低級人員是否敢起來向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鬥爭，在武大教員中，有一種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種是以沉默代替抗議的，另一種是問多少說多少。這一次，應當都發動起來，學校有個總務長，是黨員，他的愛人的薪水提得高得不合理，有人反對，在黨反時，就說他反對總務長的愛人，就是反對黨，對許多事，比較低級人員敢怒而不敢言。”

“最近珞珈山上氣壓很低，每個人都很沉重，如果向惡化的方向轉，那就是座談會（我們）都不來了。同學爲什麼要到外面去發洩（意指搞大民主）？因有些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沒有及時解決，應認真地都不認真，如安先鋒問題，蕭陳五等問題。人民日報社論出來後，更沉重了，不敢說，怕報復。”

“現在羣衆有要兌現的情緒，若再不兌現，就會產生兩種結果：（一）消沉下去；（二）鬧大民主，有一個團員曾提出過這樣的意見。”

“這兩天感到空氣很沉悶，不是沒有話說，而是不想說，這樣發展下去，可能大會小會都沒有人來了，大字報也不出了。劉真報告中（指6月5日報告）號召黨團員表明政治態度，這就使得許多黨團員體會成風轉了。因此，出現了許多教育別人的大字報，空洞的教條說不出道理。”

“我對現在（6月5日後）的運動，提出幾點意見：①對某些錯誤的做法應批判，如黨員出的大字報。②我族也有人接到恐嚇信，應批判，大家要提高警惕，如果是黨員幹的，更應批判，因爲破壞了運動。③運動能否發展看幾個報告：a 全校性的團員報告，b 桂老劉云山問題的報告，特別重要的是韓德培的報告。”

“...黨委對黨員羣衆的思想發動是不夠的，在運動中大多數黨員



未與羣衆在一起揭發‘三害’，有的不但不揭露，而且還拖後腿。黨委什麼時候發動了黨員呢？就在六月五日的報告前作的一個報告中提出叫大家爭鳴，所以六月五日報告時號召黨員同志表示政治態度參加爭鳴，結果許多黨員來圍剿批判，有一個黨員出三個報刊來批評，引起停刊是件痛心的事情。”

“宋慶齡、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等中央的黨外人士，為什麼不聽放呢？真很難解釋，我懷疑是‘黨中央對發動整風的誠意不足相信，或者是受到限制。劉真6月5日的報告是對鳴放的一種壓制，但是，也不能怪劉真同志，黨中央到省委都是這樣，這是‘內部指示’。”

“過去一貫起帶頭作用的人，現在為什麼落後了。我主張系學生小組只要個把黨員就行了。阻止鳴放就是領導路線、幹部不能代表同學們的意見，反而壓制同學。”

“劉真同志召集的是黨員及團支書會議當然他們不願意‘鳴放’

…我們堅決要搞起來。”

“我那個報辦不下去了，什麼都是我一個人搞，我班有兩個黨員專門辦了報來打擊我辦的報，所以我決定停刊。我主張搞大民主、遊行，憲法規定那有什麼不可以。明天（六月八日）停刊戴黑紗，繞路拋出一週，你要保密。”

### 妄圖奪取整風運動的領導權

“整風是自發搞起來的，談不上黨的領導，我們與黨委是平行的，誰也不能領導誰。”

“武大這次整風運動，不是黨委領導的而是羣衆的自發運動。”

“整風運動不一定要黨員領導，要相信羣衆。”

“這次運動是中三一手搞起來的，沒有中三，就沒有今天。中三爲我們開闢了光輝的道路，我們要在全系大會肯定中三是領導力量，我們應靠攏中三，向中三學習。”

“報刊（指大字報）要絕對獨立，不接受一切領導，如系學習分會、班學習小組等。”

“這次運動和歷次一切運動的性質都不同，不能由黨來領導，×××（黨支書）×××（黨員）來領導，就是‘三害’來領導，他們根本不能領導，把他們趕出去！團也不能領導運動，不能派代表到系分會去。”

“我們不能讓黨員參加這次運動的領導。黨員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這次領導。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黨團員都沒有資格領導，像我們所接觸的中文系的那些團員（按：指右派分子）就有資格領導。”

“整風爲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辦法，以前爲何不用，從這些作法來看，對黨員還是不同些。要處理問題，就要改組黨委會、團委會，它們不能領導羣衆斗自己，應該讓別人來領導才行。”

“這次運動，是解放以來第一次民主。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誰要阻礙運動，就要粉身碎骨，黨代表只是形式，實際上是我們來領導。”

“羣衆揭露領導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和對黨員同志提意見，是爲了幫助黨整風，因之，對於揭露事實和提出批評意見的人，絕對不許壓制和報復，這是黨的政策。我們堅決擁護這一政策，並願意爲保證這一政策的貫徹而奮鬥。今後如有壓制批評和私人報復的事實發生，希望大家據實檢舉，我們負責向有關機關（從省市人民委員會直到中央人民政府，從省市統戰部直到黨中央）反映。希望全體師生員工同志掃除顧慮，更大膽地鳴放。”

“我們擁護黨委會和學委會的領導，我們希望全體黨委同志都能夠積極地主動地站在運動的前列，爲全體黨員同志作表率。黨委會對於那些有思想顧慮不敢大膽投入運動的個別黨委和某些黨員，應該積極進行教育，使他們能夠迅速地提高認識，使整個黨委會的步調更能整齊一致，從而也就更爲有利於整個運動的開展。”

“這個運動不要黨委領導，由民主黨派領導還會搞得好些。”

“打破從劉真到‘共青團員’的圍剿，沖出武大‘三害’的牢獄，

到省委會，到民間去。”

“學校黨委在羣衆壓力下也大胆放手領導起來了，我們的運動發展是健康的，但遺憾的是學校黨委的某些措施和態度不能令人滿意，羣衆的要求得不到黨委果斷及時的答覆，情緒有低落趨勢，特別是今天劉真作的報告（按：指六月五日的報告）中的某些論點，羣衆感到學校黨委有右傾保守思想。因此，我們誠意地請您（王任重同志）到我們學校來主持這一運動，……聽一聽羣衆的呼聲。”

“這個運動是羣衆自發的搞起來的，中三出力不少，武大黨委會太保守，羣衆必須加大壓力，現在這運動中有兩個領導，到底誰是領導，將來時間會證明。”

## 關於反右派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還是脫離不了教條主義。究竟那個人是右派，不應該早下結論，應該讓羣衆討論以後再下結論。”

“人民日報殺氣騰騰，橫不講理，再不走，有掉腦袋的危險。”

“報上搞來搞去，我一點不相信誰是台派份子，除了毛主席發表文章指名。”

“現在報紙上工人農民說黨壓力很大，這種搞法是有組織的。人民日報社論批評早了一些，組織工人農民批評是不是好？他們的發言是否有說服力呢！如果組織高級知識分子系統地批判那就好了。人民日報批判（右派）過火，不應該用這種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美國的總統還可以被罵得狗血淋頭，而儲安平對毛主席提了一下意見，人民日報就馬上組織力量反擊，這是不是與‘百家爭鳴’方針矛盾呢？連‘草木篇’都可以發表，難道人們對領袖提一下意見不可以嗎？人民日報組織力量反擊儲安平，這好像胡風事件一樣，是理論上的前奏曲，將來必定把肅清反革命看待，如果儲安平有錯誤的話，追究責任來，黨中央有一定的責任，為什麼黨中央號召人們大膽提意見呢？”

“人民日報社論令人寒心，殺氣騰騰，我早就知道要來這一手。

反扑一下的。”

“人民日報發表反擊右派的社論這是黨中央缺乏容量，對自己力量缺乏信心，驚惶失措的表現。”

“人民日報說工人發言了，這帶有宗派主義情緒，黨對我們見外，如果說現在是工人發言了，那我們以前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在鳴，好像我們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我不服，我覺得我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我們每個人不能說自己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八年來我們在黨的教育下應該是有了進步，否認這點就否認了黨的教育，今天我們需要黨對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信任。”

“不過社論（人民日報社論）也有缺點，只要知識分子，民主黨派鳴放，不許工農鳴放，這樣機械地劃分界限不夠恰當，這樣一來似乎讓人感覺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切都是資產階級化的，沒有一點無產階級味道，而工人農民一切都是無產階級化的，都是正確的，實際上解放八年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有很大的進步，解放初期說我不是‘紅色專家’還沒有意見，但是現在這樣講我就不能服氣了”。

“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必須反左派，因左派也是對運動不利的”。

“劉真同志說我校友派分子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向黨進攻，我認為不是的。同學們停刊、到工廠、到農村提出爭民主等口號，都是黨委不解決問題造成的，應由黨委負責，不能怪羣衆，——我是一個學術機關，就得像個樣子，經常搞政治活動，不像話。”

“幫助黨整風我現在才明白，我們是客人，主人請我們吃饅頭，你却要吃麵，主人要你提三大主義，你却要爭民主，主人自然不高興。

羣衆在整風中究竟處於什麼地位？現在我才明白，我們是做客的，這像主人出門：請客人看門，也好像請人炒菜。黨請我們幫地洗臉，我們却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腳，這當然不合規格。主人要你提三個主義，三個主義以外，你就不要多嘴。我們這些人在迷魂陣中積

極地鑽了一個多月，現在比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們講義沒有寫，現在有三條出路，一條是繼續幫助黨整風洗臉，一條是將來幫助黨整風，一條是自動退出，我現在還沒有決定，將來是要自動退出的。要是幫助黨整風，學委會便可以改稱‘黨委會’。”

“武大具體情況與其他地方不同（按：右派分子認為武大整風運動是正常而健康的）××同志似乎分析得簡單了些，武大並沒有出現儲安平之類的言論，我個人還看不出有誰故意想把這運動引上歪路。我個人認為這樣提更恰當些，目前（指6月12日前）武大還沒有發現有意把運動引向錯誤道路的言論，對某些不正確的口號也不能一概而論。”

“儲安平的發言出發點是誠懇的響應了黨的號召，暢所欲言，他不是別有用心，因而不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如果說儲的發言有錯誤那也是難免的，誰能保證自己的發言是100%的正確，斯大林也犯錯誤，他的發言重要部分是正確的。章伯鈞如何反黨希毛主席加以分析，毛主席是會接受儲安平的意見的，只是不公開發了，我希望有更多偉大的人指出右派分子為什麼是右派分子。對‘沒有共產黨人民也不會賣國’的話，從目前的批判看來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共產黨算老賬，把馬哲民剛剛解放時說的話都搬出來了。……你看，報上搞儲安平，搞的多厲害。”

“簡直他媽的混蛋，人家提出黨天下、政治设计院並沒有說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這是瞎推論，這簡直是他媽的斷章取義，污蔑好人。如果照人民日報這樣，我可以將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話都推到反革命上去。”

“儲安平的意見本身是錯誤的，有一點應該肯定，能像他這樣直接向毛主席提意見，解放後還是第一次，這是很可貴的，有了先例以後人們都可以向領袖提意見了。”

“讓他們停吧！（按：指右派分子煽動大字報停刊這回事。）再

不行，民主黨派也來個聖師而退。”

“每次運動都有很大的副作用，這次反右派鬥爭的副作用更大了，知識分子以後再也不敢說話了，積極性再也發揮不起來了。我們十二年科學規劃也完不成了。甚至一些在外國留學的看法到這種情況也不會回來了。”

“1，右派的帽子不能亂戴，要謹慎，要右派分子本人同意才能扣帽子；2，今天的作法（按：指開展反右派的鬥爭）與幾個月前陳其通的作法有何區別；3，政治問題也應讓他放出來，不應動員工農起來，這樣殺氣騰騰，是不能解決問題的；4，人民日報社論（按：指六月八日起一系列反擊右派的社論）是否有錯誤；5，右派感染性大都是由於黨委不能及時解決問題；武大右派不及三害嚴重。”

“這次學習主要是學習分清右派言論和偏激言論，不是要找出幾個右派分子。王主任說要大家參加反右派鬥爭。但是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反右派時不要像‘三反’時×××那樣，先訂出打幾隻老虎的計劃，後為完成計劃亂抓好人，給他披上老虎皮。批判右派言論要特別慎重，不要亂提名（特別強調）”

“對右派要批判，但不能在政治上施加壓力進行圍剿，不要把右派看得那麼嚴重，實際上左就是右，中國有幾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右派要‘撲滅’‘圍剿’……我不同意。”

“對右派分子要批判，但他們是高知識分子，有本領有才華自尊心很強，所以在方式方法上要注意，他們不是黨員沒有修養，經不起風暴，所以不能用反三害分子的方式去搞他們，現在在大字報上批評揭發，不是最好方式，應當採取更適合他們口味的形式。黨有嚴重的錯誤，正當大鳴大放起來就扣右派分子的帽子找一些典型把他們壓下去，黨真要想改善黨羣關係就應該繼續大鳴大放，不要搞什麼反右派。右派是思想領域中的事，在全國範圍內只有極少數的右派分子，不要把階級鬥爭提得那麼突出，提得那麼高，否則會犯斯大林錯誤。”

“在同學中間劃分左右派，只有更加加深內部矛盾，沒有好處，應該以理服人，首先應推翻劃分左右派的論點，目前報紙沒有做到這一點，反對恢復到反對胡風的那種情況。對胡風的意見書黨應從新考慮，我們班上過去很多人是昧着良心講話，盲目的大喊大叫……。”

“共產黨會耍手段，放、收、鑒三部曲。共產黨善於製造階級鬥爭，反右派就是製造出來的；總有一天，鬥來鬥去，自己會在自己製造的階級鬥爭中搞垮。”

“反右派就是變相的肅反干脆再來一次肅反把我們這些人都殺掉，留下清一色。”

“‘鳴放’是共產黨的策略、手段、是引蛇打蛇，現在整風停下來了，專門反右派。”

“我以沒要沉默，沉默一生！過去是要人家提意見，現在反過來當頭一棒，要說我是右派分子就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就反革命分子，×××要置我於死地，我不自絕於人，人也不要自絕於我才好，最多不過是一死而已。”

“我們沉默，讓他們批判好了，最多不過檢討一下而已！不怕，他們（指知道他言行的人）都是不會講的。……他們（指反右派的同志）搞很了，我硬不講，需要我，搞的好，我講一點，不這樣，還是要保留一部分。”

“現在整風整什麼鬼的風，自己（按：指黨）的問題一點也沒有解決，反而對別人進行一個大反撲。這次反右派是共產黨早就佈置好了的，是陰謀……。反右派的人本身就是右派分子。娘賣×的，與共產黨對立的的就是右派，以前要人家談，現在又整人家，共產黨成了一個宗派集團。”

“把北京醫學院炸彈事件和目前右派分子的進攻聯繫起來是不對的，沒有根據的。投炸彈的人是刑事犯，不是思想犯。我們要重法制，法院沒有證明他和右派分子有聯繫，我們就不能說這是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表現。反右派是手段，反三害是目的；反三害是主要的，反右派是次要的。”

“右派分子的話有錯誤可以通過百家爭鳴來解決，為什麼要組織力量，為什麼要一棍子打死呢？黨提出反右派是對人民的不信任，是小題大作。反右派提得這樣嚴重，是否黨對國內主要矛盾估計錯了，是不是階級鬥爭不是基本結束而是更加嚴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提錯了。反右派鬥爭是一種污辱，是一種人身攻擊。”

“反右派在全國是必要的，在我校則不必要。右派沒有經濟基礎，政權和兵權，何必用這樣大的規模反擊，這樣是否會影響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平解放台灣。”

“在批判右派言論時，要對這個人的言論作全面考查，否則不利於團結。所以我怕這次又會擴大化。”

“運動進行了一月多，我們感到主流是健康的，絕大部分意見是與人為善，由於各人生活領域和氣質不同，故意見不同，有人激昂，有人溫和。我是關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我說的語都是很全面的，要簡單取義說我是右派分子，那我只好承認。我還不是有意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個人主義很重，我的個性很偏激，政治修養不夠，說話標新立異，言語鋒利，不假思索……。”

“過去在大鳴大放中說的話都沒有通過腦子不能算，這些都是開玩笑和氣憤話，不能代表思想，我是抱着誠心誠意來幫助黨整風的，只是想把幾年以來所見到的黨的缺點提出來供參考，自己希望成為揭露三害的積極分子，不過由於說話很隨便，不考慮後果，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所以說錯了一些。”

“據我了解，很多過去是被關、被鬥的人，或者是有問題長期被了解、被懷疑、被冷淡的人。總之，是所謂受‘三害’之苦最深的人，這些人是渣子，長期被人看不起……。因此不應當說：他們是反撲，趁機報復和別有用心的人，不應當岐視他們。很多黨員，不好好支持他們，反而處處折他們的台。應當把他們變成反‘三害’的生力軍。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在武大只是黨和這些‘積極分子’的矛盾。黨應當對他們抱着高度關懷與同情和體貼，用最大的誠懇與耐心去接近他們，應當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如果這一部分消極力量不能化

為積極力量，還有什麼消極力量可化呢？”

“蘇共二十大提出由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階級鬥爭越來越緩和，我們的反右派是否與這一理論不符；我們的搞法好像是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了，與二十大的提法有矛盾。”

“大鳴大放剛開始就來反右派，這是違反憲法的，是違反言論自由的，這樣做我感到很悲觀。”

## 關於立場問題

“我也並不是一般的反對立場，不過我也常常感到這點，就是把立場問題絕對化以後，的確，容易鑽到又一個牛角尖去。在某些現象上不能完全由立場來解釋，比較簡單的現象，用立場來解釋比較容易，比方說農民分了地主的田，農民說是好，地主說是不好，這很清楚，這很簡單，但是生活上的問題不是這麼簡單，有些複雜問題就很難解釋，這我過去並沒有否定來講，而是說我對這問題感到興趣，我過去曾經講過這樣的問題——立場也好，黨性也好，這樣的東西同科學性、真實性是否有距離，是否有矛盾，關於矛盾有對抗性有非對抗性，這是不是每時每刻都是一致的、統一的，過去我在班上也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舉個例子吧，就是南斯拉夫，我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的，在蘇南關係不好的時候，記得蘇聯曾經把南斯拉夫罵得很厲害，說南斯拉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說南斯拉夫鐵托、蘭科維奇是匪幫，說南斯拉夫是警察林立，說南斯拉夫到處是緩刑架，說南斯拉夫經濟破產，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說南斯拉夫國內暗無天日，當時我記得蘇聯那些小說也好，電影也好，總是說空降隊伍大部分是由貝爾格萊德起飛的，當時，談到民主國家裏面的問題，南斯拉夫大使館就受不了，現在看起來當時在各方面簡直是污蔑南斯拉夫，當時還畫上把鐵托同志畫成一個狗，頸子上綁一個鍊子，手上拿一把斧頭，血淋淋的，當時經常在情報局出版的刊物——‘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這雜誌

上發表，當時根據蘇聯看法，南斯拉夫不好。中國也好，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好，都跟着蘇聯罵南斯拉夫。後來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改善了關係以後，又說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好的，說基本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囉，公有制達到70%囉，主要是工農專政囉，這些七七八八的話來了。我們報紙刊物馬上改變了態度，如新觀察就登了一篇“鐵托元帥下命令”一首詩，登了一張南斯拉夫牌小孩照片，說這胖小孩多麼可愛囉，從各方面來粉飾南斯拉夫，我不相信南斯拉夫會在一天之內截然變成一個不同的國家，這裏面就有問題了。從前的報紙也是有立場的，以後的報紙也是有立場的，可以說報紙還是一條線的，蘇聯是‘真理報’，我們是人民日報，黨沒有改組，編輯還是原來的人，為什麼前後對於南斯拉夫完全不同。這問題是值得人深思。是不是當時為了立場，為了黨性就抹煞了事實，看不見事實，比方說蘇南關係不好的時候，是不是蘇聯也了解了南斯拉夫一部分真實情況呢？難道蘇聯的領導人從上到下都認為南斯拉夫是一團糟，還是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了貝爾格萊德一看不是那樣子，以後就改了，是不是那樣簡單，我看不至於，就我說，黨性和立場有時服從於國家的利益，國家認為需要怎樣作才好，就強調這東西，有時很使人相信這一點，就任比較複雜的現象面前，很難用立場來解釋。我跟很多人爭了，他爭不贏，就說你這是立場問題，你沒有立場。這問題不能說服我，要說服我你用道理來說服，最後你沒有辦法了，就說你是立場問題，光拿立場來說，這不是好漢。沒有事實，搞來搞去光跟人家扣個帽子。在生活裏面存在互相矛盾、無法解釋的事很多，我過去苦惱，我不願意說我的立場的問題，但是這問題得不到解決。

我再舉個例子，比方說關於國際法的問題，在朝鮮戰爭中，我們就抓住國際法的問題，就說是美帝國主義對戰俘非人道待遇哪，你不符合國際法哪，根據國際法把它體責了一通，後來發生細菌戰的時候，又根據國際法說你不符合國際法哪，那時很強調國際法；後來到匈牙利事件的時候，有人就提出這樣的觀點，說蘇聯出兵匈牙利是否合乎國際法，我們有些同志把我們罵了一頓，什麼國際法

不國際法，國際法是資產階級的，要什麼國際法？我們根本不管那一套，我們從無產階級利益來考慮，不要受資本主義國際法的束縛，所以搞得我很糊塗。你說你干脆就不承認國際法，那在朝鮮戰場上也不承認國際法，因為那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但是有時候承認，有時候不承認，那換句話說就是這個意思：對我有利的就承認，對我沒有利的就不承認。是不是這樣一個問題呢？我說是的。至於有時是不是過分強調立場，有時感到與真實性和科學性有些距離，過去這是我們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再有個問題如像蘇加諾和尼赫魯這樣的人，我相信他們基本方向沒有改變多少，我國對他們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剛解放的時候，對蘇加諾也好，對尼赫魯也好，看法都是不好的，我記得剛解放不久，出了一本‘新名詞詞典’，後面附了很多人名，像專家名人，有反動派的，各個欄目，蘇加諾是放在反動派裏面，但是去年蘇加諾到中國來來訪問的時候，我們說蘇加諾是偉大的領袖，叫做什麼加諾兄，到處叫，你說蘇加諾究竟是好的壞，要是壞就不應該叫他來，要是好的話，為什麼過去叫他‘反動派’？過去說尼赫魯是滑頭的，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是有時在外交詞令上，比方赫魯曉夫到印度的時候說尼赫魯是偉大的政治家，但這種話是有立場的，這和科學性是有點距離。是不是偉大的政治家，這是個問題，當時為了對國家有利，就需要這樣講一講，這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說，有時立場問題並不是‘萬靈膏藥’，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簡單的問題上是比較有效，在複雜的問題上不一定能搞通的。那麼，我這個錯誤是來歷很久的了，如果大家不能把我的意見擊破，我一直要帶到棺材裏去。當然我認為在這次把問題搞清楚，立場也好，黨性也好，與科學性、真實性是不是有距離，是不是完全一致？與無產階級利益與客觀實際是否完全一致？如果這問題能解決的話，那我思想會大大提高一步。”

“從過去我認為看問題應有立場，現在事實告訴我們，對立場發生了懷疑，如蘇南會談前後對南斯拉夫的報導不同，認為一個立場兩種不同的報導，這樣有時說這個東西是黑的，有時又說成白的，因此，立場也是片面的，可以任意使用，一個立場可以兩樣。真理報批評鐵

托說霍查之流，……是人身攻擊，干涉內政，而過去罵鐵托罵艾森豪威爾，那更是人身攻擊，干涉內政，這在立場上並不符合事實真相，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不是立場了，過去認為有了立場看問題會全面，不會犯錯誤，現在我認為有了立場看問題會片面，會犯錯誤。我們的報導及帝國主義的報導都是因為立場問題而看不到完全真實的消息。”

“不要被立場所綁着了。一個人的正確與不正確並不一定於他是不是黨團員，（按：應指並不決定於立場）而決定於他的生活經驗。”

“立場，黨性與科學性有矛盾，什麼立場不立場，要入黨的人才有立場。”

“我對‘土改’‘肅反’中兒子斗老子的事搞得不慣，我覺得有損人的本性，這樣搞得六親不認錯斗了自己的父親，做兒子的怎樣收場。解放後人與人的關係是冷酷的，兒子斗老子，搞得六親不認。”

“我留戀過去，留戀地主的生活”，“我祖父（大地主）對我很好，支持我上學，我以後工作時一定要好好的報答他”。

“在鳴放以前，我就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和你們共產黨的思想體系不相容。”“我的政治信念是很堅定的，無論你馬列主義怎樣煽動，我也不改變我的政治主張。”



## 附 錄

### 武大民主黨派對目前我校整風運動的意見

我校自從全體同學積極參加整風學習、大鳴大放以後，「除三害」的力量是大大地增強了。我們對黨委會支持同學大鳴大放的政策，堅決擁護；我們對同學在揭露「三害」工作中的辛勤和英勇表示欽佩。爲了使這次運動今後發展得更深入、更徹底，我們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九三的武大基層組織聯合提出如下的主張：

一、羣衆揭露領導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和對黨員同志提意見，是爲了幫助黨整風，因之，對於揭露事實和提出批評意見的人，絕對不許壓制和報復，這是黨的政策。我們堅決擁護這一政策，並願意爲保證這一政策的貫徹而奮鬥。今後如有壓制批評和私人報復的事實發生，希望大家據實檢舉，我們負責向有關機關（從省市人民委員會直到中央人民政府，從省市統戰部直到黨中央）反映。希望全體師生員工同志掃除顧慮，更大膽地鳴放。

二、在過去一段鳴放中，羣衆已經揭露了不少的問題，有些甚至於是相當嚴重的違法亂紀的問題。我們希望校部領導同志重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與廣泛性，並採取主動的誠懇的態度，把其中必須解決而且可能解決的問題，立即解決。拖延與敷衍，只有增加羣衆的反感，增加迅速改善黨羣關係的困難。

三、爲了根除「三害」，不僅需要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擴大民主生活，保證今後各校各部門工作都能夠受到羣衆的監督。因此，我們希望全體教職員工同志今後在黨委會和學委會的領導下，除繼續大鳴大放，繼續揭露內部矛盾外，還要開始對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加以研究和討論。

四、我們擁護黨委會和學委會的領導，我們希望全體黨委同志都

能夠積極地主動地站在運動的前列，為全體黨員同志作表率。黨委會對於那些有思想顧慮不敢大胆投入運動的個別黨委和某些黨員，應該積極進行教育，使他們能夠迅速地提高認識，使整個黨委會的步調更能整齊一致，從而也就更有利於整個運動的開展。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武大支部
中國民主同盟	武大支部
中國民主建國會	武大支部
中國農工民主黨	武大小組
中國民主促進會	武大小組
九三學社	武大小組

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

## “精神世界里的級別”

程 千 帆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間，有這麼一種現象，無以名之，名之曰：精神世界里的級別。

請允許我預先聲明，為了‘力爭香花，避免毒草’，我不得不向親愛的讀者說明白：我從來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對於小資產的平均主義，也久已乎不感興趣了。因此，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以及為實施這一制度而必須存在的級別，例如有中央一級的部和部長，也有省一級的廳和廳長之類，我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我所要對之發一番議論，不是這些。

使人們感到吃驚的，乃是這種應當在政治上存在的級別也侵入不需要它存在的人類精神世界里，並且頑強地盤踞在那里，支配着我們的思維活動。

在我們的文藝界里，不知道是誰規定的，但確實是為大家所默認的，有大作家、大編輯，有小作家、小編輯，有不大不小的作家和不大不小的編輯，而凌駕於他們之上的，還有所謂權威作家和權威編輯。如果說，這些權威，大、中、小等各種級別能夠根據他們經常的

勞動成果而隨時加以合理的調整，使其有形的勞動和無形的級別相適應，倒也罷了，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如象有一種不成文法，如果他被認為是權威了，就永遠是權威，遇事是權威；如果不幸而歸入了‘小’學輩，那麼，除了偶然的幸運外，那麼就是永遠是小，遇事是小，在算定了終身的命案上，做小代低便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六朝時代距離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但那個時代的門閥制度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裏却仍然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具有高高的、或較高的級別的人，的確是使得人‘聽差’的。

他們有的是‘正確’的化身，雖然參加過，并且領導過反對以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研究‘紅樓夢’的鬥爭，但在不久之後，又寫出了可以與‘夢遊閣夜索隱’媲美的美的奇證寶玉書，逐漸地擦去了名文，而不肯覺察其自己所曾經大力提倡過的思想的遺蹟。

有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儘管所寫的書出版之後，出版會經過1700封批評的信，然而却沒有一封可以發表出來。如果真一泄露了天機，可怎麼好呢？沒有關係，還可以將就有這種批評的雜誌全部收回銷毀。

有的亂搞男女關係，已經人民法院判處徒刑。但在級別之微，依然逍遙法外，高步蔚壇，吹着自己‘美妙’的蘆笛。

有的是被壓制的新生力量，但一登龍門，身價十倍，就不僅對自己多年受過教的老師擺出一副獨家經聖馬克思主義的商店老板的面孔，向之責難馬克思主義ABC，而且還以婆婆的身份將另外一些新生力量作媳婦來加以呵斥了。

諸如此類。

反過來，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倒楣。

這些現象，吸引着一部分人去追逐着那種高的較高的，盡管是無形的級別，當然，也招致了更多的人去反對它。

又是你不要以為這種現象百分之百都是壞的，它還能刺激文藝科學的發展哩。由於這的被提倡，被容忍，我們至少發展了一門原有的

科學，那就是‘文壇登龍術’，此外又建立了一門新科學，那就是‘文壇名單學’。

要給‘文壇登龍術’和‘文壇名單學’勾畫出一個輪廓或者下個定義，不是我這種位精神世界裏被列極低（甚至還沒有級別，只是未入流）的人所能勝任的。因此，我希望一些對這類學問有研究的同志們未參加‘爭鳴’。

很長期以來我們都熱心於討論世界觀與創作方法，藝術與政治的關係等重大問題，這完全是必要的。但還有許多不合理的，也可以說是腐朽的東西，在支配着我們的思想，我們卻沒有大張旗鼓地，大聲疾呼地去揭發它，反對它。這種無形的剝削也正是其中之一。難道它不是阻礙我們前進的絆腳石嗎？

個人崇拜的情靈，去你的吧！現在是我們向你告別的時候了。

57, 6, 12。長江文藝

## 從同志談到紅色專家

程 千 帆

發表在本刊第三號的‘同志’是一篇好文章。它反映了黨內外人士大家都具有的迫切願望：‘培養起一種崇高博大的同志之愛’。

但徐懋庸同志代表大家提出的這個願望，並不是沒有受到阻礙的。過去如此，現在也還不能說完全不是如此。要培養這種‘愛’，仍然需要一番努力。

目前，‘人人相見呼同志’似乎比較習慣了。但這習慣的養成。也有它自己的一段艱苦奮鬥的過程。在解放初期（在某些場合，一直到現在），我們這班所謂‘高級知識分子’，是黨內外人士稱為先生的，這表示尊敬，同時，也表示疏遠。換言之，即孔老夫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是也。以先生稱黨外人士的黨員們，雖然不一定‘讀孔孟之書’，但却在‘行先王之道’，有時不禁使神經過敏的人發生‘內訌憂而外夷狄’之感。

謂余不信，有事為證：大概是在50年，在我所工作的那個學校

裏，在某次集會上，一位化學家對一位擔任領導工作的老黨員說：‘你平常穿得隨隨便便地，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倒是同志’。這句話當然缺乏‘高度的思想性’，但也沒有什麼惡意，然而這竟領導同志卻登時勃然大怒了。他正言厲色地訓示是：‘同志是個很嚴肅的名詞，不能隨便亂用’。於是，化學家摸了一鼻子的灰，羣衆則面面相覷，啞口無言，大概是在55年，在我們學校的一次新黨員入黨的支部會上，當那個讀書的人通過以後，一些黨員當時就向他說實話，說他今後是個同志了。這就使我們這些來實先生不能不被迫承認：我們并不是同志，在許多場合，先生和同志這兩種稱呼，是非黨人士處境的非常靈敏的溫度計。如果忽然你是同志了，那麼你大概就認為是對勁的，如果忽然你又變成了先生，那麼，你就趕快作思想準備吧，大概在目前或不久的將來，大小總得出點事兒。

然而，時代修養是愈來愈進步的，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愈來愈獲得黨外人士所讚許，中國六億人民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終於排除了那些狹隘的宗派錯結。毛主席‘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出，又更進一步地照亮了每個人的思想，我相信，徐懋庸同志所建議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大概不久總該逐漸成為歷史上的陳迹了。

但很多陳舊的或不明確的概念仍然在社會上流行，有些家些，對團結到敵人問題前的方針政策來說，仍然存在着抵觸，對發動動全體人民投身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來說，仍然是一種障礙，有待於繼續研究改正。

例如：‘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制成的’這個提法，顯然就包含了另外一個概念，即廣大的非黨人士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在當初，這個提法，或許有其種理由，而在今天正繼續使用，就顯然是不科學的，不合於事實的。是不是特種材料制成的，主要是決定於每一個人的革命實踐，而不是決定於他有没有黨證。沒有黨證而全心全意地為社會主義事業獻身的戰士，何止千千萬萬，難道他們倒是普通材料制成的，而劉世吾，韓常新倒是特種材料制成的嗎？且不說這個提法不科學，

不合於事實，就算真是如此，在中國六億人口中，只有一千多萬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其餘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我看，將這個事實記在歷史中，也不覺得多麼光榮。

當然，我們絲毫不懷疑工人階級以及他的戰鬥先鋒隊——黨在人民生活中的具有決定性的領導作用。但‘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種自欺自騙的說法，多多少少使人感到有些宗派主義的排他性。這，在今天的革命形勢下，不能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沒有加以保留的必要。

從這裏，我又聯想到另外一個名詞：紅色專家。這個名詞在辭典裏還找不出。因此不能知道它的‘定義’。推想起來，可能包含下列兩個有區別的意義：第一指持有黨證的專家；第二、指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從事工作，來為人民服務的專家。

如果是前者，那麼，我想，現在中國的紅色專家是不不少的，這個觀念也是能為大家所接受的。但是很可惜，事實并非如此。

也是那一班不肖之輩！士都他為同志的共產黨員，曾經在我們的學校裏對黨員發過他非常著名的演說，大意是勸勉青年黨員們努力爭取做個紅色專家，這是很好的。但同時，他又非常精彩的說：那些舊知識分子，即使進步，也不過像半老徐娘臉上擦胭脂而已。當然，這位老黨員現在也進步了，決不會再說這種怪話。可是，從報紙上所討論的‘先專後紅’，‘先紅後專’，‘專紅并進’等問題看來，所謂‘紅’、就是指入黨。那麼，紅色專家，顯然是黨內專家的同義語了。

把專家分為黨內的和黨外的，並沒有什麼毛病。但把黨內專家稱為紅色專家而將黨外專家歸之於色專家或無色渺弱的專家，却無問題。

我們知道：紅色，在這裏，並不是一個美譽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它是與白色相對的。紅色代表無產階級，而白色則代表資產階級。

在中國人民中基本上已經只有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這三種

人的今天，不多在全體知識分子已經以自己的知識來為工農服務的今天，我們有什麼根據認為他們是非紅色專家呢？這樣的馬牙，除了削弱他們的積極性之外，又有什麼其它的效果呢？

以有無黨證來區別一個人是否紅色專家，和以有無黨證來區別一個人是否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樣，是不科學的、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們都知道：高爾基、魯迅、郭沫若以及其它許多的人，並不是共產黨員，但却是很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名符其實的紅色專家。

黨員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民中間的少數，否則黨就會失去其戰鬥先鋒隊的作用。但馬克思主義者却可以是人民中間的多數。如果不用黨證來區別，則紅色專家也必然會逐漸成為專家中間的多數，黨當前的迫切任務之一、則是促成這兩個多數的早日出現，而這，又是和徐懋庸同志所提出，‘培養一種崇高博大的同志之愛’的工作有聯聯的。

凡是一切可能使黨羣關係不正常的消解因素，在今天、都更加以黨報的必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和更迅速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加強社會主義建設。‘不買者敬其小者’，我們談的問題，也許並不重要，看法也許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但無論如何，這些問題是存在的，它需要解決。

為了祖國，為了世界上進步人類、護黨和非黨的全體人民，更加緊密的團結起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向社會主義社會大踏步地前進吧！

1957.4.30

文藝報

## “宗派主義的種種”

程 千 帆

整風運動是否深透，第一要看黨員是否能想求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因為往往有這種情況：黨內原是有爭論的，到運動來時，就團結一致對外，反而為官僚主義者辯護，上海有些學報教

員在一起談話時，總說黨書記來了，臉就紅了，不吭聲，想說是宗派主義的結果。第二要看做級人員是否敢起來向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鬥爭，在黨大會中，有一種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種是以沉默代替抗議的，另一種是問多少說多少，這一次，應當都發動起來，學校有個總務長，是黨員，他的愛人的薪水提得不合理，有人反對，在黨反時，就說他反對總務長的愛人，就是反對黨，對許多事，比較做級人員敢說而不敢言。

黨羣矛盾的幾個基本原因，是很多非黨知識分子還抱着資產階小資產階的尾巴，一下難以去掉，而在運動中黨員性急，在他們是鋼鐵不成鋼，然而羣衆思想確實一時扭不過來，這中間往往發生矛盾。

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時，徐悲庸說：‘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但決不意會着一個月內不能提高一大步’。我親因為兩星期內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們撤職了，其次，黨羣之間彼此不了解，黨員功臣自居，自高自大，幾個月前聽說農學院一位教授講了兩句粗話，竟責令檢討，檢討如果通不過就不許畢業了。有的教授遲遲到五分鐘也要通報。解放後，黨員有些特權。聽說劉真同志原在省發有多吃點肉的特權，到武大任黨委書記後，自覺放棄了這個特權，大家很歡迎。這種特權不僅對於干部不利，而且對青年思想也產生毒害，我有一次在德明飯店招待外賓，進房間去休息，衛生員說：‘今天是你長的孩子在洗澡，你過一下’。我只有在會客室等待，我還親耳聽到某部長一個九歲的孩子說：‘××電影只有我們能看’。把孩子養成了一個小貴族，黨員都應該像劉真同志那樣以身作則，許多矛盾就容易解決。

再談談政治上人爲的不平等待遇問題。當時，對於某些具體問題，黨內外是可以有區別的，羣衆沒有必要而且也不應當知道黨內一切問題。但有些事不但不合理，也不策略，不聰明，如傳達一個報告，傳達的內容完全一樣，却要分黨內黨外兩次傳達，又如我校運動教，選留學生，差不多是黨團員包下，羣衆連5%也沒有，是不是說羣衆的受治水平都很低，低到連運動教，選留學生都不行呢？其實過去所選的留學生和助教，水平並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在一

點上，至少不是大公無私的，最近已有人提出留學生公開考試。

有人說，斯大林也這樣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反過來說羣衆就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囉！當然黨員是無產階級中先進分子，但也不能說個個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說大多數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還差不多。反過來看，羣衆水平一般低於黨員，但也不能說，不是黨員的人，就沒有一個特殊材料制成的，如高爾基、魯迅、郭沫若，他們都不是黨員，但都是運動的革命作家。再一種是所謂‘紅色專家’，‘紅色’這個概念雖然不是一個美學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有紅色專家也就有白色專家，這像什麼話，我認爲這種說法有排他性。

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我建議：一、在全國範圍內對知識分子的改造經驗總結一下，總結出一些規律。我認爲改造知識分子，用粗暴的那一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1952年把我整了一下，整得我治不起頭來，只問業務不問政治，對我來說結果並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加強，而是資產階級思想加強了。可以總結一下大學校長、院長對待知識分子有那些成功的地方，在我看來，中山大學的校長馮乃超同志的辦法是成功的，徐悲庸的辦法是不成功的。二、黨應該研究知識分子的思想規律，掌握住這個思想規律，對他們思想改造就容易了。如清高、好發。議論卻是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搞古典文學的喜歡尊師重道，正因為如此，在運動中叫學生罵老師，我們受不了折磨；再一種是愛面子，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要求黨內同志對待我們，像對待黨員一樣細緻。

## 該是破除沉悶時候了

### 武大的“車”並不算太“破”

栗 寄 滄

幾年來，武漢大學經過一系列的運動後，是有進步的，但進步的速度實在太慢了。去年年底高教部李司長來校視察，我問他對武大印象如何；他說：初步印象是‘老牛拉破車’。其實，漢大的‘車’並不算太‘破’，問題在‘牛’的氣力不夠，拉不動。讓我們來摸摸武大的家底吧：教師費說，副教授以上的教師，無論論理科或文法科，都佔到全國大學同類教師總數的9%左右，這已超過各大學的平均數；武大藏書約六十萬冊的圖書，儀器設備也是中上等的；至于自然環境的優美，更是‘得天独厚’，連國際專家也表示留戀不舍。武大雖不具有這樣優越的人力物力的條件，可是它的進步却遠遠趕不上客觀形勢的發展。武大在許多兄弟學校的社會主義競賽中是落伍了。許多人因此而不惋惜。然而僅僅惋惜是無補于事的。我們必須找出阻止武大迅速前進的消極因素，並加以克服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 為何“士有歸心”人懷去志”

目前武大內部還存在着不少的問題，例如：有些人覺得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或肅反運動中受了‘委屈’有些人覺得自從調整到武大以來，就做了‘湖濱隱士’，‘十年寒窗無人問’，從來沒有得到鼓舞和溫暖，有些人覺得領導對自己不信任，工作上得不到適當安排，‘英雄無用武之地’，‘酒力無從發揮’；有些人還覺得武大的學術空氣太稀薄，領導對業務太外行，對高級知識份子的特點沒有足夠的瞭解和重視，因而“士有歸心，人懷去志”。這些內部矛盾如果不正確地加以

解決，武大是無法前進的。

可是，過去武大領導上是怎樣對待這些矛盾呢？他們對矛盾的態度，恰恰是人民日報的社論“為什麼要整風”一文中所指責的盲目的，不自覺的，絕對的態度。這就是片面地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一致，片面地強調領導的正確性和權威性，否認或者不重視人民內部的客觀存在的矛盾，否認或者不重視，領導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的态度；他們的工作方法，也正是“喜歡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對於名譽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權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而不願意深入羣衆，同羣衆甘共苦，堅苦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見同上社論）。顯然以這樣的態度和方法來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不僅不能把一切積極的力量調動起來，而且甚至某些積極的力量還要變成消極的力量。

### 領導人不開口，羣衆怎能無顧慮

最近，武大黨委會正在領導全體師生員工學習毛主席關於如何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並要求通過這次學習解決校內存在的主要問題。黨委會號召大家打破顧慮，大膽地‘鳴’這種顧慮是不正確的也是必要的。可是，在民主的氣息一向不濃厚，而黨羣關係也很不正常的情況下，要想使大家真能夠做到打破顧慮，大膽爭鳴，恐怕還要黨員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帶頭來鳴才行。然而截至現在為止，除新來的黨委書記而外，別的領導同志還沒有公開地表明態度。羣衆還不知道領導上是否真展開言路的‘雅量’以前，提意見就不能不有顧慮，從而‘鳴’得也就會不夠大膽，不夠徹底。其次，過去武大有不少黨員同志也和黨外民主開會時，只是耳聽，手記，很少發言，甚至于根本不發言。幾年來，在各種大會小會中，我極少看見一個黨員對另一個黨員批評意見，或對領導上提批評意見。他們對羣衆所提的意見，也很少表示態度，彷彿他們只是帶耳朵來開會的。這種沉默態度，對於目前發動羣衆打破顧慮，大膽爭鳴，是不利的。學習正確



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揭露和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是黨內外同志大家的任務，而不僅僅是黨外同志對黨內同志的問題。知識分子是敏感的，你默不做聲，羣衆就會願意到你是否願意聽，或是否真心地聽得進去，從而提意見也就不積極了。

### 沉默、等待，不能解決矛盾

武大是人民的大學，它無論在培養國家建設人才方面或是科學進軍方面，都應該擔負着重大的任務。目前的沉悶狀態，是不容許再繼續下去的。爲了更順利地解決現存的內部矛盾，我認爲無論黨內黨外，領導就領導，都應該誠心誠意把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開誠相見，參加爭鳴。任何人都不應該把自己看到置身於羣衆之外，或置身於羣衆之上。羣衆固然應該打破顧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領導上也應該採取「自覺的，分析的，自我批判的態度」和「堅持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只要能夠這樣，那麼，那怕客觀的條件再困難些，羣衆和領導之間的矛盾也會能夠順利解決的。不敢正視矛盾、揭露矛盾、害怕羣衆「放」了之後不能「收」，因而沉默、等待，結果不但不能解決矛盾，而且必然使矛盾更加複雜和尖銳。

### “老牛拉破車”武大要求支援主張

#### 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委會

梁 寄 滄

武大問題不但嚴重，而且很多。只談幾個根本性的問題。

首先要對省委會提意見：對武大關懷支持很不夠。武大幾年來很落後。去年高教部李司長來武大檢查工作，我問他初步印象如何，他說：“是‘老牛拉破車’”。其實‘車’並不算太破，問題在‘牛’

的力氣不夠，拉不動。李司長在做檢查武大工作的總結中說：武大在前進中，但很慢，大概落後了一年兩年。原因是黨的領導薄弱，組織渙散，紀律松懈，黨的組織不充實，領導後必長期沒有形成，領導干部不融洽，對中央政策方針缺乏研究，缺乏統一認識，對武大的傳統特點和實際情況缺乏調查研究，工作盲目性，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不能依靠羣衆。我認爲李司長對武大領導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但武大黨委會對李司長的批評，思想上有抵觸。舊黨委會代理書記張希光同志在黨代表大會所作的工作總結報告中仍是老一套，成績主要的，缺點是不可避免的。新黨委會的人選，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羣衆千呼萬喚，省委會只派了一個劉真同志。大家一再要求添個副校長，到現在沒添。武大教務處是唱空城計。二個還向科學進軍，一個有職無權，對教務工作不感興趣，常常需要走。人事處問題也很多。但高教部在放了一炮之後就揚長而去了，沒有下文。省委也沒督促，這也說明省委對武大關懷支持不夠。黨委會很吃力，在這次學習中，黨委會領導力量不强，大多數黨委沒有威信。各系科黨支書、黨支部都還沒有動起來。羣衆已經揭發出來的許多問題，到現在為止，連一個還沒有解決。因此羣衆有的有消極情緒，有的有急躁情緒。因此我們向省委會呼吁，加強領導，支援武大。

統戰部對武大統戰工作抓得不緊，劉真同志去後好了一些，但還是不夠。民主黨派在武大是可以起作用的，凡事如發動了民主黨派，就辦得好些。工資改革好事辦成壞事，沒有真正依靠民主黨派是主要原因之一，這次學習發動羣衆較好，主要是劉真同志去後能夠依靠了民主黨派。

高等學校人事制度和人事工作必須改進。人事處，一般人都說是獨立王國，是神祕的組織。本來人事處應該是一個受人歡迎的組織，因爲黨和政府了解我們以後，才能信任我們，合理地安排我們的工作。但事實上大家一談到人事處，就不免有點毛骨悚然。它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惹不起。

如果說黨軍間具有一道牆，我想，人事處至少是牆的主要建築者之一。人事處權力未大，所有人事安排，好壞除人事處以外別人連知道都不該知道。有些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不知道自己的單位里有多少教師和職員，因為人來人往，他們都不知道。留助教、畢業生分配、留黨學生選拔更不用說了。畢業生分配到哪里，工作情況如何，教員根本不知道，其實知道了，對教學有很大好處。人事處工作人員能力之低，到了驚人程度，我最理想上科學院搞研究工作，人事處給我填一張人員審查單送去，我一看，寥寥幾行就有六個錯誤。我大吃一驚，掌握我的政治命運的竟是這些人！這樣的人事工作，不能不使大家害怕。為了拆牆，為了建立黨軍領導與學軍間的互信，我覺得人事制度似乎應該加以改進，材料從速出來，雙方看一看，彼此同意的，雙方簽章，看法不一致的，雙方可以保留。

最後，談談高等學校中的黨派關係和如何實現黨的領導的問題。有人主張一切黨派退出學校，理由是多重關係，多重矛盾；同時影響科學研究時間。我不贊成這樣主張。我們在那裡，不僅要過文化生活，而且也要過政治生活。矛盾並不一定由黨派關係而生，反之，通過黨派協商，也可以消除許多矛盾。至於時間問題，只是個技術問題，不能成為黨派必須退出高等學校的理由。

黨委制問題，如果這個制度只是應付黨內的領導，我同意，但如果意味著以黨代政，我就不贊成。我主張在黨委領導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高等學校的民主生活。我主張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而這個校務委員會應該採取人民民主的組織形式。包括領導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有代表性的教授，要有發言權。這和現在武大的他有空架子的學術委員會無異同之處。這種形式，既可體現黨的領導，又可實現黨和民主黨派相互監督的作用。另外，黨和民主黨派還可以從學習中加強聯繫，這一點，過去在武大做得不夠。還有，通過組織生活也可以加強聯繫，我建議以黨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成員可以交叉參加組織生活以便相互學習，交流經驗。

——1957年5月24日湖北日報——

## 從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說到目前

### 高等學校中的人事工作制度

栗 浩

全國各高等學校在這次學習中曾經揭露了不少的內部矛盾。從這許多矛盾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就是：凡執行黨和政府對知識分子政策較好的學校，黨羣關係就好些，進步也快些，反之，黨羣關係就差些，進步也慢些。

黨是一向重視知識分子的，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發揮高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利用科學知識。因此，我們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需發展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與其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為了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第一、應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見周總理“黨團結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明確的，堅定的。然而這個政策在許多高等學校中並沒有很好地貫徹。

高等學校中不少黨組織領導同志，由於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情緒，對於非黨的教職員工，不僅不能推心置腹，以誠相見，而且在使用和安排上，也未能一視同仁，大公無私，他們有意無意地在黨與非黨之間劃了一條鴻溝，這就必然大大地阻礙了非黨教職人員積極性的發揮。例如：在人事安排上，目前高等學校中的校長、院長、處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如果正職均為黨外人士担任，則副職（或秘書）必由黨員担任，而所有重要的決策只通過黨員的系統，不通過非黨員

的系統，於是有的校、院長對學校裏的事是“一問三不知”；有的處長、科長指揮不動一個黨員的工友；有的系主任和教研組主任連自己系內、組內多少教師也說不清。助教的留用，留學生的選拔，教師的開課等，非黨的系組主任無權過問，甚至像全國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題目彙編之類的文件，也在“保密”之列而不讓一般非黨員的教師看。所有培養提高和加薪的機會，也是黨、團員在先，非黨、團員在後。總之，“政治”第一，業務第二。而所謂“政治條件”，又僅以是否取得黨、團員的稱號為唯一標準，而不問其是否真正具有黨、團員的高貴品質。武漢大學的法律系和經濟系，有不少課程原由非黨員的老教師擔任，教學效果一般也不壞。但一旦有從人大回來的黨、團員青年教師，老教師就得退位。老教師有的被迫改行，教外國文；有的被打入編譯室，鑽古董，搞資料編譯工作；有的被派充青年教師的助手，替青年教師編講義，寫講稿，解答問題，只是不許他們上台對學生講課。結果怎樣呢？老教師固然因用非所長而垂頭喪氣，青年教師也因經驗不足，根本不願干而弄得精疲力竭，焦頭爛額。高等學校中之出現這種怪現象顯然是宗派主義在某些黨員領導同志的頭腦中作祟的結果。

宗派主義在高等學校的肅反工作中也帶來了許多不良的後果。我們不否認，為了純潔人民的內部肅反是必要的。同時，不少高級知識分子歷史比較複雜也是事實。但領導肅反的黨員同志，由於帶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情緒，根本不信任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年以上的舊知識分子，在進行肅反工作時，往往不是先根據充分的調查研究，再確定鬥爭對象，而是偏聽某些片面的彙報，確定鬥爭對象以後，再去調查研究，其結果，鬥爭面就擴大了。而在鬥爭時，又往往採取粗暴的方式，絲毫不顧及“任何一個正直的勞動者都應該有的自尊”。肅反總結，長期拖拉（例如武大就拖拉一年半以上）。在斗別人的時候，就惡毒激烈，聲色俱厲；而在宣佈總結的時候，卻又冷冷清清，含糊其詞，不肯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樣，不僅被錯斗的人長期地抬不起頭來，而且使黨羣關係長期地陷於緊張、隔閡的不正常的狀

態。

當然高等學校中黨羣關係不好，原因很多，如像有些黨員同志有功臣思想、特權思想、驕傲自滿脫離羣衆等等，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則無疑的就是宗派主義。如果說宗派主義是造成高等學校中黨羣關係不好的主要原因，那麼，目前高等學校中的“人事處”又可以說是培養宗派主義情緒的“溫室”。人事處是了解和管理人事的，按理也應該受到羣衆的歡迎，因為一個幹部必須經過充分了解以後才能得到應有的信任和合理的使用和安排。可是，現在高等學校中的人事處，卻變成了一個極其神祕的組織，它有生殺予奪之權，掌握着所有師生員工的命運，但羣衆對於它究竟如何進行工作，却絕不許過問。教職員工的任聘選調，賞罰以及畢業生的分配等，事前非黨員的，（或非黨員而非親信的）教務長不知道，系主任，教研組主任不知道，一般教職員更不知道。人事處上的“材料袋”實際上也已成為每個人的沉重包袱。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材料袋中裝了些什麼東西，從而不免時時懷疑和顧慮領導對自己的信任，加以有些人工作，態度冷酷，作風生硬，他們把所有黨外的教職員工都看成被拿獲的階級異己份子。有的人事工作者，甚至於利用職權，作威作福，濫用私人，排除異己。我們武大在這次學習中就曾揭露了不少這方面的事實。總之，今天在高等學校中沒有比人事處更為脫離羣衆，更為不得人心的組織了，如果說高等學校的黨羣之間真有一道牆，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人事處就是這道牆的主要建築者。

為了搞好高等學校的黨羣關係，必須拆牆填溝，首先必須改造現有的“諱莫如深”的人事工作制度。人事處應該和其他組織一樣受到羣衆的監督，而不應該讓少數人假公濟私，為所欲為。除應少數有現行的政治問題的人外，人事處應該讓每個國家幹部知道自己的“材料袋”中究竟裝了些什麼東西，以便消除顧慮，安心工作，古語說：“士為知己者用”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在取得國家的充分信任以後，才能夠愉快地，充分的，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與工人農民一道為社會主義的建設服務。

——1957年6月4日 長江日報——

## 不成系統的幾個意見

劉興夏

### 一、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嗎？

“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這幾乎成了每一個總結報告中的神聖公式。在這個陳腐的公式中，不該掩藏許多污穢的東西。先說思想改造吧。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存在着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乃至於反動思想，原不足為怪的。要改造，這也是天經地義的。問題在於如何改造。按照中央的方針，主要通過自我改造。可是我們學校，卻主要是通過壓迫改造，大會小會地斗。同學批評老師的態度，和講一些，就要戴上一頂“右傾”的帽子。幾十年以前的老賬，硬要人家關在房子里回憶出來。作檢討的時候，報告人哭了，就是假裝的，全圖蒙混過關；笑了，又說人家撒不慌乎；不哭不笑，是無動于衷。有的時候，講了幾句就說等先準備能做好了的同學們請下台來。這不但符合於中央的方針，而且不合乎人情。被這樣斗過的人雖然不多，但是它在老教師中的影響是深遠的。根本方針都搞錯了，難道還可以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嗎？為了重新估價，接受教訓，我們覺得可以在範圍中做個調查，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的思想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覺改造的？又有多少人是被迫作檢討的？再說黨委宣傳部的平時思想工作，完全是無計劃的。教師的政治學習，幾年來都是東搬一刀西搬一刀；形式主義非常嚴重，不論任何學習，都是計劃一大堆，會議一連串，即令一個問題沒解決，到頭來還是“成績為主”。去年學習“八大”文件，黨委宣傳部等了好久得由省委的通知後，才匆匆忙忙地作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動員報告，成立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教工學習委員會（附派的）。羅鴻運同志把我們找去開了好幾次會，一直沒有搞清學習目的是什麼，（黨委的目的是照抄省委的）我們的任務也是糊里糊塗。當時羣衆的要求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在文法

科的一些系和馬列主義教研組，比較偏重於一些新的理論問題的討論；而在理科和文法科的另一些系則希望要學習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有一個老教授並且表示：“討論精神實質，我不參加。討論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時，一叫我就來。”然而黨委宣傳部並沒有重視羣衆的這些合理願望，一方面認為光學理論不好，應該多聯系批判自己的教條主義。另一方面，認為當時還沒有條件去批判領導上的“三害”。這種看法當然有合理的部分，學習理論當然應該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批判教條主義，但問題在於黨委對於如何結合文件的學習去批判教條主義沒有作具體的研究，而是從“凡是知識分子都有教條主義”的空洞概念出發去佈置學習。更錯誤的是害怕羣衆去觸動領導上的“三害”。所謂沒有條件，實際上是領導上缺乏隨時檢查工作糾正錯誤傾聽羣衆的意見的負責精神，一講學習，就是強調羣衆的自我批判，而不願意讓羣衆批評領導的缺點，這是我們在政治學習中最大的片面性錯誤，也是平時發揚民主不夠的具體表現。這種片面性同時也造成了實際政治生活中，黨員和領導者總是以改造者自居，羣衆總是被認為被改造者的片面教育觀點和作法的錯誤。在有一次學委會上，我們曾經建議既然黨委認為沒有條件讓羣衆發揮自由思想去觸動領導的“三害”，只是體會一下精神實質，空空洞洞地聯系一下教條主義，就不如干脆不來訂計劃呀，開會呀，與師團衆地為搞一番，因為羣衆對這種搞法實在夠討厭的了，高級知識分子難道還看不懂“八大”的政治報告嗎？何苦叫人們一定要在小組會上勉強應付一下呢？羅鴻運同志堅持說我們只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言下之意，是想要人相信：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是看得懂的，就是要這樣督促一番才會去看呵！這樣一次不符合羣衆要求的學習，當然不會取得任何結果，而在我們教工委的最後一次會上，羅鴻運對學委會的工作作評論時，仍然來了一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真是天曉得。這個公式實際上是“三害”的防空洞，在反對“三害”的同時，必須把這個陳腐公式也反掉。



偉主義領導者還說“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呢！

就憑清想，人們一定認為政治理論課與政治課應與黨委宣傳部有密切聯繫，可是不然。在羅曉暉同志任宣傳部長時，從來沒有到我們教研組來過，黨委宣傳部也從來沒有討論過我們政治課教學的方針，罵起教條主義來，上上下下都集中在我們頭上，難道我們願意這樣嗎？黨委要求我們宣傳當前的政策，可是許多可以給我們看的材料也不讓我們看，於是造成了不適當地宣傳一長制之類的錯誤。黨委要求我們聯系學生思想，可是黨委宣傳部本身就摸不清羣衆的思想狀況，當然談不上給我們什麼材料，黨委宣傳部這幾年的工作，實際上是忘掉了政治課的。只有一件事黨委是忘不了我們的，這就是要我們隨時去作萬金油幹部。

## 給武漢醫學院 ×× 的三封信

陳 景 勉

××：來信收到矣！殊因心情激動，未能如期回函，致歉！老友寄來相片我已收到，我很感謝。

幾天來本人感情已達總爆炸的程度。回憶數年來官僚老爺們的殘酷屠殺，拍馬屁的走狗們（按：官僚老爺是指黨的領導者，走狗是指黨團員和積極份子。），對無辜的人們的迫害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今天還是記憶猶此，血腥未散，真可謂之血洗的時代矣！今天是受害者說話的時候了，我們要報復。

最近以排山倒海之勢，爭鳴之聲，震撼各地；而武昌珞珈山却是沉默無聲，寒氣逼人，仍在官僚們恐怖統治之下；而我們這些自由的靈魂仍在官僚們實壓之重壓下。吁夫！

前天我們中文系的朋友們向黨委提出大鬧大放，立刻放、立刻鳴的正義要求，使得老爺們感到惱怒了，於是下令各支部要我們這些學理、法科的同學不要理會文科同學之意見。然而不是過去了，辦不到！次日清晨，從中文系中發出了巨大的呼聲，大字報飛遍各地，其內容之可怕，標語之驚人，鼓動力之巨大，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矣！其中有和營（按：和營是指影響、合夥辦的意思）之定期專刊，如“炮火”、“火焰”、“淋浴”等其他大字報，如合淚的控訴，“陰森森明月無光，黑魃魃鬼哭神號”之揭發及“張勃川滾出去”！“武大老牛破車”，“中國毒頭張勃川”（張勃川乃副校長也）。

諷刺性文章可謂多矣哉！現摘一則如下：張憲說“我讓這個黨員你當拉”！說的好，“讓”“當”二字尤其妙，在某些人看來黨員是官衙，入黨是當官，而當官的人豈可批評，怪不得他要吹鬍子瞪眼睛、連黨員也要讓人當了！

又有提名為：“不剷除官僚統治，誓不罷休”之控訴，其意如下“官僚主義者殺害了我們的同學——因為這革命不是繡花，官僚主義者用鬥爭、禁閉來摧殘我們的同學——因為這是教育的最好方式，啊！革命不是繡花，好一個革命不是繡花；啊！教育的最好方式，好一個最好的方式。嗚呼！可咒咀的東西！向死者哀悼，向生者鳴冤！”

一時大爆發起來的憤怒的火焰，席卷一切！凡有良心之人均紛紛地拔劍而起；而那些當官的黨員先生們，學法律（即將政治為飯吃，沒得馬列主義就要餓死的君子）的法官們，以及借此時機向官僚立功的獅子狗們，亦居然欲鳴而鳴不下去，欲爭而結果惱羞成怒。哈哈！真可謂萬年之雪恨動機矣！

當晚八時半，在我校小操場由黨委書記劉真（新調來）給全校做報告。在六時許，操場就是人山人海，中文系之大字報花花綠綠，盡忙眼底；而講台之前大書之曰：“反對右傾，大膽鳴放，武大還是寒氣逼人，我們要春天”；“張勃川滾出去”；“張勃川愛人當護士去”；“張勃川十大罪狀”。高呼口號之聲振天動地！而劉真之胆乃飛之天外矣！罪惡是見不得太陽的，而真理永遠屬於羣衆。劉之發言，用意惡毒，在於分散注意打擊鳴放，維護官僚的統治，以考試等來嚇同學（特別是理科）等等，其後仍禁止喊口號，中文系有數條大漢奮然上台，大聲高呼，號召起來鬥爭到底，獲得排山倒海之掌聲。而黨員們則順機搗亂會場，在同學發言時，公然號召同學退出會場並帶頭紛紛退去，並力竭聲嘶地大講：“鳴！走啊！走啊！鳴！鳴！鳴！”。



……然而我們這些人的命是操在這些人的手裏，我們的一生，我們的所有幸福和幻想，我們盼望的生活和未來，都會被這些人毀於一旦，我們可以被他們活活殺死，可以被他們鬥爭、禁閉。他們的雙手沾滿死去的無數青年男女的鮮血；沉痛的父母的眼淚。而他們還要嗚，還要趾高氣揚地叫！還要統治，還要領導，還要教育，還要考驗。天下之黑暗，如無窮盡之黑暗，愈來愈黑，可怕矣！回想過去的生活，真可謂鬼與神無，杜鵑泣血，慘不忍睹者矣！而在此混亂之中，劉真仍舊如饑不食眼前廝，下令散會，由數名手持博克（按：指手槍）之武士帶領之下上汽車逃之夭夭！

今天形勢愈來愈緊張，而鬥爭也尖銳與複雜了。然而任何力量，均將阻擋不住怒火。巨大的長達數米的巨幅標語出現了，程子帆（中文系教授，民主人士）也支持我們之鬥爭；黨員成了“過街老鼠”；同學紛紛捐獻紙張、筆墨。飯堂工友也捐獻漿糊，假如要罷課我舉雙手贊成，要鬥爭我堅決擁護，同學！官僚主義的罪大極了，與我們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過去他們整人如麻，大興阿房宮並雷厲風行；而今天搞到自己頭上，一切要從團結願望出發，和風細雨……同學，這是自己人啊！妙哉！好一個自己人！而我們即是敵人，是牛鬼蛇神，沒有生之權利的人，而只有他們才有和風細雨，小風小雨；哈哈！確實好意矣！再配上數株桃花玫瑰則更美哉！有人問這是對敵人，這是敵我不分，說的妙！妙！50%的同學是敵人，敵人多矣夥矣！

按余觀之，此次所爆發之標語，其力量其藝術足抵新中國開國以來之成就，而有過之！事情在發展中，我們要鬥爭，我們將繼續前去“勒”的戰爭，一時英雄之風，決非我們手所能形容者也。……（後略）

• 嘉勉 •

x

x

x

老友：自上月等你一信後，一去又是十天。在這期間，武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天都發生着新鮮的事，而每天都使我無限激動和悵惘；我預感到一種還在萌芽的新時代，新的生活和新的鬥爭！

我想答述一下運動的概況，上月28日，武大一千多學生包圍行政

大樓，要求鳴放的自由，要求民主，在羣衆壓力下，黨書記劉真被迫接受。①立刻大鳴大放，減輕考試。②公開人事檔案。③立刻改組“生死衙門”人事處，自此轟動整個珞珈山的鳴放運動自發地開展了。新的言論和口號層層疊出，以往生活中的憤恨，運動開展後，大量記者湧進珞珈山，但報紙却百心對我們實行新聞封鎖，於是又引起了一百多人包圍長江日報編輯部的事件。在運動中過去的積極分子成了落後分子，過去的落後分子成了積極分子，黨員成了“衆矢之的”並充當便衣警察和打手！一時問世的大字報，有一百多種都各有自己的編輯部，形式更是五花八門，如小品文，詩歌，長篇大論戲劇等等，每天晚上都舉行全校性的辯論會，都是羣衆倡議和領導的。每次辯論都達深夜，如主題爲：解放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酷無情的”“胡風集團是不是反革命集團”等等，參加的人有教授、同學、各兄弟學校代表一千人以上。光明、文匯報均有記者參加，其大至性的控訴會更是層出不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如陳懷九事件，×××等，當受害者在台上控訴時，在座師生，無不痛哭失聲，拳責之慘狀真是慘不忍睹!!!

夠了，只要有良心的人都會知道和同情受害者，都會憤恨這些喪盡天良的僧子手的，但是單憑憤怒和同情是不夠的，不能將運動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揭發上，不能局限於肅清三害，消滅一些官僚主義，或解決本校本單位的一些不合理的表面上面，我們必須把問題（按：應爲運動）向前推進一步，這次運動，在黨內是一次整風運動，在黨外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革命鬥爭！直至今天這種民主革命運動仍被一些人理解爲“在黨的領導下幫助黨整風”這種理論上，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別有用心。他們要我們蒙上眼睛，關在籠子裏，仍像過去一樣用鼻子去生活，企圖壓制羣衆自發性的民主高潮，但是我們要大喝一聲：這是辦不到的！鮮明的事實替我們辯護，請問有幾所大學是在黨的領導下“和風細雨”地幫助黨整風的？這無疑是自我安慰而已！

1949年的勝利，開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革命，消滅了資本主義

私有制，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這是社會的大進步！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原則，誰要回復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就要用整個生命去和他鬥爭，但是1949年的革命是在極不徹底的基礎上完成的！它帶有了強烈的封建性和農民的革命情緒，而在革命理論上則是幼稚，因而顯然地受到斯大林錯誤理論的影響，中國革命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主要是解決了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肅清了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餘，但是對於怎樣去締造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領導人民去建設社會主義建立新生活秩序這樣一些重大問題則是得不到解決。的革命的根本上目的是建立真正的生活，可是幾年來都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工業化的步驟就是值得懷疑的！幾年以來形成了新的統治階級，對這個問題作學究式的爭論是可笑的。因為憲法上並沒有規定那些人有特權，而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又好像與統治階級格格不入，是的，這點我不否認，但是我們在現實生活的痛切感受中體驗了它！共產黨形成了“家天下”大權在握，孤家統治；上至中央，下到空閒僻野，無不在共產黨員的統治和監視之下，什麼人坐什麼汽車，吃什麼樣的飯，穿什麼樣的衣服都有規定，人們被無形地劃分為等級，黨員是一級，團員是二級，普通羣衆是三級，官僚地主是奴隸，而在每一級之間又另工人出身，中農出身……。你如果不幸降在下等，就命定永遠不能翻身！你在中國就只能過下等人的生活。因為我們的黨老爺，非階級論者，已住在檔案和鑑定上為你算了命，共產黨員成了盛氣凌人的高官顯貴，你要申訴嗎？到哪裏去申？報紙雜誌，檢察院也是黨老爺，他們會把你當反革命！由於一黨專政和盲目的自大狂使共產黨變了質，與人民相距一萬八千里。中國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真正名符其實者不到二百萬！歷史證明，沒有任何政黨是完全正確的，任何專制統治到後來總會被人們的憤怒所毀滅！一黨專政無論如何不能把中國辦好的！他們不認識在革命基本結束，敵我矛盾趨於次要的時候就應該大膽地讓羣衆去干預政治，共同建立新國家！而他們只相信自己，因此一些惡味的做法就出現了。例如在文化科學上唱單調子等等。中國是6億人的中國，並不是共產黨的中國。每一個

人都有生的權利，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然而我們現實生活所告訴我們的，却是一幅怎樣的圖畫？我們盼望的生活青春，我們理想的未來幸福，難道就是這樣的嗎？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但是所使用的手段無疑是狂風暴雨，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受害而含冤，九泉者何止千萬！這種做法是無人道的，錯誤的。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了。成千上萬的人無辜受害，全國遍佈集中營，而其手段之殘酷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來得悲慘和可怕！在這裏法律都絲毫不起作用。共產黨員有無上的權力，有生殺之權，有私設法庭，任意捕人、關人、鬥人、黨的權力，在這裏我們得不到一點民主的影子！舉胡風事件而言吧（我不是替胡風辯護，只是舉例）就人民日報所揭發的材料而言是不足以判定胡風集團是一個全國性的反革命集團。因為並沒有公佈他們反革命活動的真相實據，而且在運動中只有原告說話的權力，被告根本不能替自己說話和辯護，於是就只能聽於人民日報的手中，報紙一些零星材料、張言雙語、斷章取義想當然地硬加上一個反革命的罪狀；而黨員作家附和趨勢的人則應聲而起你唱我和。要是有人想辯護一下那就會粉身碎骨。整個肅反運動是在一種可怕的方法論指導下開展的。它主要是：“力圖找出一些材料以證明其是反革命而在表面上沒有矛盾”這樣一種思想支配下，人民日報社會論“在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的今天，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就會越猖狂，鬥爭就會越激烈”。這顯然是斯大林錯誤式的翻版。肅反運動中，奇怪的是憲法根本不起作用，人身沒有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人的尊嚴受到破壞，共產黨人根本不要法律。在他們腦子裏只有鬥爭！鬥爭！打、殺、好強什麼都出來了，這令人想到過去的農民革命！

我們要求建立律師制度，律師是自由職業者，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他捍衛法律、人權和真理。目前的人民法院，檢查機關就是官僚分子的天下，黨員居其中焉，“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根本要不得的！

運動向何處去，我看這次運動，可能在很長的時間內繼續發展；

也可能以一場悲喜劇而告終，要看黨中央的態度和我們的努力。知識分子究竟能幹什麼，在這運動中看得很清楚。我們需要團結和堅持，擴大運動的範圍和影響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從上而下的發揚民主和從下而上的發揚民主大風暴究竟是不同的，我們需要徹底的解決絕不能滿足於某幾個人許諾式口頭上的承認，整一下風等等。這樣一些無關痛癢的生活檢討會上這無疑地視 華萊為“阿斗”可是事實上只有“阿斗”才會視華萊為“阿斗”！一切都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事無大小，一律按照法律行事。在南斯拉夫，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新的東西，這意味着新大林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我們必須擺脫斯大林主義的統治勢力，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最後人類所最終盼望的生活青春才會到來！北大成了這次運動的先鋒和號角，他們成立社團進行活動，並將成立“社會主義民主黨”……一切都在於努力，在於鬥爭！

可是目前存在一股逆流，一股暗流；它力圖倒轉運動的方向，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長時間的機械論統治，使得人們在精神上陷於麻木和保守狀態。共產黨員根本就不能領略這次運動得到勝利。因此我們須要採取大方向幹！當然我並沒有打倒它的意思，因為這是不合理的。總而言之，今天單是喊喊共產黨萬歲之類是不夠的，我們我們要喊強性的原則萬歲！真正的民主自由萬歲！真正的人權平等萬歲！

我很希望你在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假如不大影響你的考試的話，正等待着你的來信。 祝

好！

6. 6 放。

××：

你最近給我兩函均已收到，今晚特回此信，然由於時間之匆匆，未及思考，故不能令你滿意也。

中國之問題，若你有可能我們在暑期可以詳細的討論。我認為革

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掌握政權就意味決定一切。四九年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開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革命，並保證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前階段為後階段做了準備。並解決了後階段的談判。因此，我並未將中華（中國革命）的二個時期混淆（清）。革命假如只做了破壞舊的面並未建立新的，則不能謂其徹底也。中國目前的制度有巨大的缺陷，因此引起了全國人們不滿，根本並未建立起真正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如民主、自由、憲法、科學等等，而此點在今天則是最主要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缺點？不能說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物，因為這是不合理的，其原因是由於中國之落後，即中國革命之落後性，中國革命有封建性及暗革（按：“暗革”意指革命不徹底性）之情緒，蘇聯盟人學得之產物是由於帝國是一個落後國家的國家，俄國革命之落後性，當然我不能否定其他原因，然此點無疑重要也，此問題在“斯大林時代”一文中曾詳盡的論述，在此不多贅了。

你來校使我大吃一驚，你校在提名問題上居然如此之久，實在令人難解，使我之見不必如此，你們選開學主發的東西不發，而去和幾個不學無術之黨員爭氣，使彼名亦是全國普遍性之爭，之（只）寫之（這）一具體例子也。只有從提子將三管線，才可能解決問題。目前全國爭論最熱之問題為黨委制之問題，黨之領導問題，民主自由人權平等之問題，均極必要。知識青年應該將眼光看的更遠，大膽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並與全國各兄弟學校之爭鳴聯合起來，以形成一個巨流。各地之高等學校均將鳴放，局限於一些更名為提姓改領導，這樣一些只有女人才感興趣的事情上，實在令人難解也！可笑的是許多人的腦子却以教條化，只能整天看看馬列主義之類，看到聲音略有不同者更大驚小怪，此乃庸俗之人也。此問題我與老友之見解是針鋒相對的。最近我校有同學到漢口演講，貼標語，市民們將我們當成反革命，這種人真不愧為阿Q之子孫也。武漢有些知識分子居然洋洋得意地向我校全體同學，寫致封公開信，通篇說些發音錯誤等教條主義的文章，說什麼“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知識分子是沒有知識的”等等，激起了我校師生之萬丈怒火，此種人連眼睛也沒有

了，因為他們什麼都不見。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標準的保守夾教條，不值一看，最近我校特為此種事情，全校八十二家報刊宣佈停刊，抗議並舉行了遊行示威。（按：一部分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煽動羣衆，準備在六月八日舉行遊行示威，但大多數羣衆並沒有跟他們走，舉行遊行示威的企圖徹底失敗了。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羣衆面前愈益暴露出來，而且右派分子在羣衆中日益孤立了；看來右派分子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面歪曲事實，企圖重溫舊夢，）并上書省委及黨中央表示抗議。

你們何不作政治（課）選修的鬥爭呢？我們正在進行此爭鬥！不過我無點火之意，你們可三思而行之。

近日社論讀之論（令）人作嘔。“鳴放”兩字今天有新義在云，有“放”則有“鳴”，不“放”安能“鳴”哉！

嘉勉書于六月十三日晨

## 關於理想的社會問題

劉 繁 華

### （一）前 言：

在蘇南關係破裂以後，看到一些對南斯拉夫的批評性的文章，便對其產生惡感，後來蘇南關係日趨改善蘇聯方面承認了對南斯拉夫所犯的某些錯誤，因而引起了對南斯拉夫的注意；時至本年看了鐵托同志卡達爾同志的演說後更感興趣，了解了並且大部分接受了南斯拉夫的觀點。此後更是密切注意南斯拉夫的情況。

由於從理論上了解了南斯拉夫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結構並接受了其觀點，於是我便得出一個公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加上廣泛的民主自由等於理想的社會。二者不可或缺。因此我的一切思想都來源於此。當然由於資料的缺乏對南斯拉夫的具體情況的了解還嫌不夠，有

待今後進一步的研究。

至於南斯拉夫路線是否正確，歷史將會作出結論；我對它的評價是否過高，希望大家討論。

這些問題就涉及到我的思想核心，只有對我的思想核心作一全面的了解和分析方能對我的言論找到答案。孤立地考慮個別的話語是得不出生動的結論的，一言以蔽之曰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不公正的。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理由。

### （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觀：

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必須保證社會主義制度在它的發展中依靠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自覺積極性和勞動人民的行動自由，依靠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動力和社會經濟關係本身的穩定性，而不僅僅是依靠國家權力的多方干預。為此就必須有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各種特殊形式的民主的平行發展，這就必須發展各種民主機構。這是在社會結構的選擇中必須考慮的問題。

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像建築房子那樣簡單，它是一個有機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力量應當致力於社會主義力量的解放，換句話說應給以更多的民主自由。黨必須根據客觀的社會發展規律實施領導，黨必須通過各種社會因素使所有社會主義力量的社會主義自覺傾向藉整個社會結構表現出來，這樣才能使社會在結實的基礎上向前發展。

必須指出，要發展社會主義不是單純的只要掌握了政權然後依靠一定的國家權力和計劃機構；還有另一個方面，那就是注意各種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的健全，而其主要内容就是民主自由。

總的一句話，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發展應當順應已經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形成的覺悟的勞動人民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要求。使其自覺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以便使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內部的動力更加強大。

在過渡時期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是複雜的，如果按照斯大林的公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階級鬥爭會愈來愈尖銳化——來理解過渡時期的現象那是錯誤的，他所犯的错误正是這個公式的直接結果。如果只是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來理解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是太簡單了，這將會使人們忽視另一方面對社會主義發展起阻礙作用的因素——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而這一因素的進一步發展將會成爲一種阻礙社會進步的嚴重的社會力量。當着國家政權相當鞏固的時候，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同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之間形成衝突，以致引起勞動羣衆的不滿時，這時反革命勢力才可能變成嚴重的政治因素。只有正確的理解過渡時期的矛盾關係並認真的全面的去探找產生矛盾的基木因素才能作出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處理。任何違反客觀規律作出的決定將會受到歷史的批判。

教條主義對於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對於馬列主義理論的發展是不利的。教條主義者害怕人們討論和研究理論問題、社會關係問題，如果在教條主義的束縛下人們只能宣傳、體會或解釋各種政策措旆，缺乏對重大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以致使思想工作喪失了任何創造性的刺激，這就將使得難以形成社會主義的自覺傾向——而這却是保持社會主義基礎穩定的強大社會因素。

目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佔居主要地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的徹底消除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消除三大主義的同時，還必須付以強大的力量消除當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傾向——這是現階段的嚴重的政治任務。

綜上所述，有下列論點：利用一定的社會結構形成社會主義的自覺傾向，藉着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動力來建設社會主義；正確而全面的理解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複雜的社會現象，根據客觀規律予以合理的解決。

### (三) 南斯拉夫概述：

#### I. 國家性質和社會性質：

1.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是享有平等權利各主權民族的社會主義民主聯邦國家。
2.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勞動人民，勞動人民通過其所選的各人民委員會和各人民議會的代表各工人委員會和其他自治團體的代表並直接通過選舉罷免複決選民會議公民委員會公民參加行政管理審判以及通過其他自治方式行使權力管理社會事務。

#### II. 經濟基礎：

1. 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經濟部門生產者的自治與市區和公社勞動人民的自治，構成全國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礎。
  2.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生產工具有下列四種所有制：公共財產國有財產人民合作組織的財產和個人與法人所有的財產。一切礦藏和其他國家財富水源自然動力資源空中和陸上運輸郵政電報電報廣播事業都是人民的財產。
  3. 國家通過總的經濟計劃依靠國家經濟成分與合作組織的經濟成分同時保證對私有經濟成分的一般控制規定經濟生活和經濟發展的方針。
- 政治體制與經濟結構：
1. 保證勞動人民在教育文化和社會福利各方面的自治，生產者和勞動人民依照法律和勞動人民代表機關——各人民議會和各人民委員會的其他決定所載明的一般社會權益而行使自治權。
  2. 經濟部門的生產者特別享有下列自治權：勞動集體有直接和通過其所選出的和有權罷免的工人委員會農業合作社會議及其他代表團體管理其經濟單位的權利；生產者有被選爲該經濟單位代表團體的代表權利；經濟單位有獨立確定其經濟計劃的權利；經濟單位在其完成對於

社會公衆集體的任務後有獨立支配該單位的收入的權利，並且在這方面保證該經濟單位獲得法律所規定的最低收益；經濟單位在其收入限度內有確定其工人工資的權利，並且在這方面根據法律以社會公衆集體的基金保證經濟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生產者根據憲法和法律在經濟計劃的體制內行使自治權。勞動集體根據建立經濟單位的法令獲得自治權。

3. 人民委員會、廠務管理經濟單位各協會和聯合會以及公民的積極性在經濟的自治團體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方面與市區和公社的發展方面有獨立管理有關公衆集體一般權益事宜的權利。

4. 一切公民在合法條件下擔任公職的機會一律平等。

5. 公民享有向國家權力機關提出請願和控訴的權利。公民對國家權力機關的判決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不當行為提出控告的權利。

#### (四) 南斯拉夫透視：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勞動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他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下面將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南斯拉夫現具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又具有較多的民主自由，這正符合我的關於理想社會的公式。因此我就按照對南斯拉夫的分析來敘述我的理想社會的模型。從下列幾方面進行分析：

##### I. 不強調行政管理的集權：

既然社會主義力量已經相當強大，社會主義利益與個人利益達成一致，因而他們不強調國家權力對人們的干預。他們主張不僅是用法律條文而且重要的要用非強制性的社會道德來規定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道德必須逐漸代替許多法律的規定和行政約束，這就給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國家行政機關對於社會關係的行政管理和在一般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干預是容易產生官僚主義的。南斯拉夫採取了杜塞

#### 官僚主義產生的措施。

他們同時實行執行權的最大限度的地方分權，這能夠使羣衆直接控制執行機關的工作使勞動人民在實際上能自由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積極性，能防止國家機關官僚主義化。這種執行權的地方分權制最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力量自由發展的需要。

當然他們也絕不允許削弱勞動人民政權的統一或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一致，相反的在大大實行執行權的地方分權制中政治機構還必須保證制度一致所必要的職權，還要保證一定的社會集權。由於階級敵人還存在，對於某種形式的民主權利還是要加以限制的，必須消滅反革命的復辟陰謀。

##### II. 社會自治：

在社會主義所肯定的制度內隨着一切社會主義公衆集體的自覺和自然發展傾向，必然會建起社會主義。這就是南斯拉夫把社會自治原則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的原因。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物質方面和社會方面需要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自覺積極性可以更自由的發揮，因此就必須在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基礎上以民主方式團結起來的勞動人民的自治制度，而這種自治制度將產生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巨大的社會內部的動力。

工人階級不僅要領導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的鬥爭，而且還要領導從生產資料的國家管理的方式過渡到社會管理的方式，這樣勞動人民就能直接擔當推動社會主義前進的任務。這就是南斯拉夫所理解的過渡時期的任務。

勞動人民的自治原則和民主原則不只適用在政治方面，而且還適用在生產與分配方面，適用在經濟管理方面以及其他社會管理方面。總之，民主原則已基本上作為主導原則用在國家和生活的各個方面。

我認為這是最能杜絕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產生的政治體制；而這種政治體制又如國家機能的消亡作準備，這正是自共產主義過渡的第一步。

##### III. 政黨民主與個人民主：



公民選舉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的代表並不是由於他們屬於什麼政黨，而是由於他們知道這些代表的主張和意見，這些代表值得信任。南斯拉夫的同志認為這是從政黨民主走向個人民主的一條道路，他們認為這種個人民主比任何形式的政黨民主都能表示勞動人民的願望。這或許是使絕宗派主義產生的重大保證。

在南斯拉夫勞動者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他們有權參加管理其所工作的企業以及民衆格因感興趣而參加管理教育衛生社會治安和其他社會組織。

他們的新聞也較自由，既有黨報又有非黨報，新聞來源廣泛，所有通訊社發佈的消息他們幾乎都會接受。在學術上也較自由，有各種不同觀點的學說同時存在，都有出版的機會，各種各樣的作品都有。每個國家的電影都有，既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又有非社會主義國家的。

#### Ⅱ. 對鐵錫的估計：

由上所述，可知南斯拉夫的民主自由是較廣泛的。但是亦有缺點存在敘述如下：

1. 過分忽視了黨的領導作用，把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相提並論，沒有重視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所謂由政黨民主過渡到個人民主是否有弊，還值得研究，而它有利的一面是能避免宗派主義的產生。
2. 全盤的經濟計劃性不夠強，忽視了地方經濟計劃。對小資產階級採取放任自流態度造成了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的泛濫，例如他們存在着僱農制度土地買賣制度等。

對於經濟，國家無法作嚴格的控制，破壞了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由於生產和銷售都是自由進行，產生了投機取巧和追求利潤的傾向，由於各個企業的工資自由決定，造成了工人的盲目流動。

3. 過多的放映美國的黃色電影影響了人們的心理健康。

#### (五) 後記：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觀中，提出了有關過渡時期的理論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要來廣泛民主自由的理論根據，而南斯拉夫正是按照這

個理論來建立和發展它的社會結構，這可能上述的分析中得到證明；三害與政治體制間的關係也在上面作了一般性的回答。

這個理必須發展，使其更加完善，由於我不是政治家，對於這個理論作進一步的具體解釋，將超出我的知識範圍之外，但希望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對此問題引起注意，並進行討論和研究，以期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作出貢獻。

我們的國家具有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如把民主自由進一步擴大，這將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完善。我正是從這個觀點出發提出爭民主爭自由的口號，然而現在看來這口號在客觀上起到了極不良的作用，這是我深為痛惜的！但使我使我得到一個重要的政治教訓：善良人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有被敵人利用來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可能。今後必須引以為戒！

× × ×

致讀者：自從六月二十九日劉繁華同學提出他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加上廣泛的民主自由等於理想的社會”這一句話以來，一直沒有把它向我們作進一步的說明。爲了更了解劉繁華的理論社會的內容，物二在七月九日上午爲此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劉繁華與純粹地引用了卡德爾文章上的一些話沒有任何自己的東西，大家都不知道他要說的是個什麼東西。劉會記者提議並經本人同意，要求劉再準備一下改用書面發表。劉繁華同學經過反覆的修改潤色，終於在七月十日上午八時完成大著，（我們原要求是七月九日下午寫好。）

把今天的文章與昨天劉繁華在招待會上說的一對比，劉的這本觀點又作了一些原則上的修改。例如他把“爲什麼不利用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自發性來建設社會主義而強調國家行政對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干預”（劉把這點解釋爲與資本主義初期人們是以資本主義的自發性建設資本主義一樣）改成了“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自覺性。”此外，劉繁華同學還沒有滿足記者的將他的理想社會與目前我們的社會及他在鳴放中的一些言論結合起來的要求。

記得在昨天記者招待會上，有同學提出他所說的以南斯拉夫爲藍

本的理想社會這一套，是最近一個星期來搞出來的時候，劉繁華同學厲聲質問他是“爲了攻擊而攻擊他”。幸好有下面一個有趣的小故事爲證。事情是七月九日晚上十時發生“在晨字號59號劉繁華的房間裏，黃××同學問他：“你講老實話，你過去對南開這套系統的研究？”答曰：唉，過去是沒有系統研究過。”黃說：“好，你記住這句話……”遂轉身就跑。劉知道事情不涉連忙拖着黃說，“你不要走，不要走，我是最近才進行系統的總結過去我是接受了它的觀點。”黃問：“難道你否認剛才說過的過去沒有進行系統研究過這句話，他不答，並重複第二句話，黃立刻要拿他正在修改的原稿並說：“那麼，你不看發言稿，我親自看你答得出那些觀點吧！”他不肯，（顯然他從前接受現在紙上的那一套）並說：“你真惡毒，你又要把我出去？”黃前根本沒說：“當然要請出去。”後來劉見黃又說：“你跟我扣上一頂帽子對你並沒有好處。”

通過以上簡單說明：大家總會知道劉繁華同學的理想社會，是怎樣一回事。不過我們仍希望大家對劉的文章仔細研究，踴躍發表自己的意見。

編者。7.10.

## 關於學術自由問題

劉 繁 華

偉大的革命理論家恩格斯曾這樣說過：“德國的工人運動乃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我們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却以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付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黑德、菲希特和黑格爾爲光榮。”這就是我們的導師對於唯心主義的評價。應該承認黑德爾的“純理性批判”出版到黑格爾的“法權哲學”出版的短短數十年間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給人創造了一勞可貴的歷史遺產，因此正確地對待這片歷史遺產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必須說明，正確對待唯心主義並不等於承認唯心主義是正確的。

唯心主義在哲學發展中是起過一定的作用的。它起了助長思想發展的作用，它看到了唯物主義所忽視了的事實，它體察到了不易解決的現象，它更注意到了不易解決的問題。例如主體對客體作用這種事實當爲過去的唯物主義者所忽略，而唯心主義者卻都注意了。當然唯心主義也解釋了所看到的事實，揭示了大了困難問題；他們給科學所作的哲學結論和給哲學所作的政治結論都是錯誤的。

若干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學批判的研究領域中育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狀態存在，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着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使其朋友而接受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惡習（引自“關於蘇聯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如果一切學術問題都只允許一個答案，這是不好的。如果這問題待於是全面的還好，如果這問題僅具有片面性那就危險了。對於學術問題的正確結論往往不是短時間內可以作出的，必須通過長期的複雜的爭論過程。

哲學理論的鬥爭不能簡單的運用強力的鬥爭，而是一種細致的深入的鬥爭，一經激發，實際上是不絕解決問題的。近幾年來對於唯心主義的批判往往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只許批評不許辯護，雖爲給別人扣上一頂唯心主義的帽子就真事大吉，事實證明這並沒有很好的解決問題。必須對唯心主義者的許多觀點進行仔細的分析，給以有力的駁斥才能擊破唯心主義者。在鬥爭的同時又豐富了唯物主義。

歷史已經證明哲學的發展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互鬥爭的過程，唯物主義是在與唯心主義進行鬥爭之間成長起來的。既然唯心主義還存在，與其讓它在偽裝的隱蔽的形式下存在，不如使它公開化，給它以宣傳的自由。唯心主義公開化，就正傾於哲學思想鬥爭的展開，而便於思想的活躍，而反對這種水平的提高。同時必須指出，在學術領域內的爭論，決不僅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爭論，而且還包括唯物主義陣營內部的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

上面的敘述正是我主張學術自由的根據，我們必須在鬥爭中發展

真理。但是我過去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在任何時期內適用，認為黨提出這個政策太晚了。下面再談談具體問題。

我曾經說：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觀點支配了思想政策的貫徹中起了支配作用，這種估計是錯誤的，但是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觀點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前面曾引過了一句話，教條主義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即是錯誤。而具體的例子就是有人把“三毛流浪記”的連環畫一筆抹煞，理由是對解放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應該有三根毛的人存在。他的毛應該更多一些，更胖一些。難道能把這種可笑的話當價值觀立的書或是對個人的無知嗎？不是的，這是一種庸俗社會的觀點支配了它。這種觀點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各個方面。又如勒柏辛斯卡斯基的“活質學說”，李森科的“種內無競爭說”威連斯基的“草田輪作制”等等在風格，然而過去却在這些學說上加上唯物主義的標籤，凡是對科學說表示懷疑的都被認為是反對唯物主義；不學習蘇聯，而且不給反對者的論文以出版的機會。有個人爲了入黨，首先批評自己的康爾根觀點，聲明接受李森科觀點；後來看到李森科觀點錯誤，懷疑他又批評了自己的李森科觀點。這說明了什麼呢？！

我過去也認為新聞不夠自由，其根據是：(1)沒有收論性的文章，對國內外大事沒有獨樹的見解，過高或過低沒有評論。對正確的政策當然不能任意批評，但是就不會有不正確的政策嗎？舉個例子說，斯大林對內對外政策都犯過錯誤，特別是對南斯拉夫犯過錯誤，爲什麼當時的報紙甚至連蘇聯脫去這種羈絆的人臉也不取這出批評呢？(2)報紙的內容和體裁都很狹隘，報導重大的政治經濟情況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也應該有深入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情況報導呀！前一期蘇聯聯作者曾和波蘭作者進行過一次論戰，爲什麼不可以報導呢？報章不報導的現象也是存在的，雖有“體面煩瑣的烏雲之夢”但也有“云深難掩的古今之哀。”當然這是應該報的；但是報了“哀”，正確的解決了“哀”，不一定會起消極作用吧。例如最近政府報導了“廣西餓死人的現象”，政府對此作出了正確的處理。這樣對幹部是一個教育，羣衆

又一次深深感到政府的英明偉大，這正是積極作用。當然有極大的社會影響的東西是可以不報導的。消息的遲緩也是一個缺點，新聞變成了歷史。在報紙的版面方面也是千篇一律，這來略有好轉。過去的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簡直沒有什麼區別。

上面的分析正是我當時提出思想解放的理論根據和事實根據。我們必須消除人們的思想政策教條主義束縛在一根繩子上的現象，人們的思想必須從教條主義和各種清規戒律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當然我看問題的某些觀點還是有問題的，希望大家批評，我自己即將作出檢查。

## 再論社會主義

### 時代的羣衆自覺運動

——探討當前的運動中爭論的幾個問題——

邱永春

在這篇文章裏，我想探討這樣幾個問題：(一)爲什麼說我黨運動已越出了整風範圍？(二)“三害”產生的根源是制度問題。(三)武大黨委爲什麼沒有領導好這個運動？(四)保衛馬列主義維護黨的最高利益。

#### (一)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注意它和其它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爲我們認識事物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性。就是說，注意它和其它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①”。“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②黨目前在全國範圍內所開展的整風運動基本上是在黨領導下的人民羣衆的自願協助下的以和風細雨的方法開展的整風運動，這是矛盾的一般性。

但是，在武大，情況比較特別，徐懋庸時代給武大創造了一套完整的統治方法，徐懋庸走後，江澹又加以修正和發展，以致在武大這個小天地形成了解放以來的長期的黑暗統治，尤其在“三反”和“肅反”時期許多教授設門，設關。其中例如聞名世界的原子核化學家鄒寶良教授，物理學家法履庭教授等，許多教師工友和同學說無辜地送進武大醫備室（如段維榮醫師，我承認是黨同學等等）給以甚至比集中營還要殘酷的肉體與精神上的摧殘……耳不忍聞，目不忍視……社會主義法制（尤其是莊嚴的憲法）被破壞，人權被剝奪，這是矛盾的特殊性。

劉真同志到武大來了，武大師生員工（尤其是同學）寄以很大的希望，在大家當中享有較高的威信，因此在這個運動一開始，同學們要求協助整風的善良願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劉真同志使人失望了，他不是走在運動的前面指導運動，而是在幕後的後面約束運動，阻礙着它的進展。（當然這不能完全怪劉真同志，因為他要服從黨的紀律啊！黨委會裏的委員有許多是犯“三害”錯誤的同志，他們絕不是那麼積極的！）於是同學們向武大黨委提出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權，維護莊嚴的憲法等口號是很自然的了，這就是說運動越出了整風的範圍形成了在黨中央和前方針指導下的知識分子自發地幫助黨整風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擴大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羣衆運動。

## （二）

“三害”是現象不是本質，它的產生根源是制度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的國家機關中的部分環節制度的不合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是衆所周知的，“但是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着一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爲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面的缺陷”<sup>④</sup>如當前學校中的黨委負責制，人事處制度等已正是由於這些不合理的制度，給了那些有“三害”錯誤的人以犯“三害”錯誤的營養料。因此要剷除“三害”根本問題是改革這些不合理的制度。

“有了適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日常性質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證不犯錯誤了呢？問題沒有這樣簡單。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制度本身并不是萬能的。無論怎樣的制度并不能保證工作中不犯嚴重的錯誤。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問題就在於是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sup>⑤</sup>。這就是說與實施制度的人的品質和作風有關係，“三害”也不例外。

武大“三害”產生的根源也是制度問題，正是由於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給徐懋庸這種具有“農民的粗暴性”<sup>⑥</sup>的人以胡作非爲的條件，所以說武大的“三害”是徐懋庸時代的“傑作”，江澹集其大成而發揚光大了。

從已揭發的事實還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武大“三害”爲什麼那麼嚴重呢？（特別是表現在“三反”和“肅反”時期）；這與解放以來法制不健全有關係。“肅反”時中央的方針是正確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但是中央並沒有叫武大的“肅反”負責人“大胆假設，粗心求證”啊！（本是“大胆假設小心求證”<sup>⑦</sup>）。而這些幹部都是粗心而不是小心！）當然，現在武大肅反糾留問題，沒有總結，我不了解詳細情況。但是從已揭發的事實中可看出武大“肅反”犯的錯誤是很嚴重的。如果說以前法制不夠健全，那麼我說現在正是要健全的時候了，是保障我們莊嚴偉大的憲法的時候了。遺憾的是，現在有多同志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甚至是把問題推到許兒頭上，兒把問題推到爹頭上，不認錯；甚至有的人竟認爲鬥錯了也是成績！……等等。

總之，武大“三害”的產生是三方面造成的，這就是制度（基本制度下的部分環節制度）不合理，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問題，社會主義法制的健全。

因此，要解決問題必須從這三方面着手，要把運動搞得好就得領導上堅決果敢地領導起來，對那些民憤極深的人作出事實表現來，消除羣衆一切顧慮，讓大家大鳴大放起來；立即着手解決一些需時解決的開

題；如肅反除留問題等。羣衆起來有什麼可怕的呢？從十幾天來的經過中可看出大家是很有理智的，與那些有“三害”錯誤的人比起來有理智的多！

### (三)

首先讓我闡明這樣一個事實，黨中央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面指導運動，英勇果敢地提出大鳴大放的辦法來支持和指導當前的運動，這是馬列主義的新創造。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生）很敏感地接受了這一思想指導；從而自發地起來幫助黨整風，掀起了這個運動。但是武大黨委呢？始終處於被動地位，被羣衆牽着鼻子走，形成了一個“思想真空”。（我的定義）這就是口頭上空喊“支持”大鳴大放（對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來說）。從已經過時了的教條中抽出它的法寶來壓在運動頭上從而使運動受到阻礙。

武大黨委的這個思想真空（也可說是理論真空）是怎樣造成的呢？我認為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領導幹部思想水平低，對黨中央的政策方針學習得不夠，對教條很感興趣，其二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深入羣衆中去聽取呼聲，對羣衆的信任不夠，認為大家起來戲會出“大亂子”（劉真同志說過）。因此，我認為現在的黨委除了一些自身有“三害”錯誤的同志以外，整個黨委會包括劉真同志在內至少有“兩害”這就是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

### (四)

這來，在劉真同志報告以後，竟有些黨員同志公開大呼“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維護黨的最高利益”等口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我說他是黨的忠誠的兒子，直得我們每個人學習的。然而他們除了喊了這些口號以外就是“從胡風集團的材料可看出肅反的必然性的”，“運動一開始就是黨委在前面領導着”，“現在有了紙、筆給你出大字報還要爭取什麼民主呢？”這些顛倒黑白，不合邏輯的證明，對於我說的“三害”嚴重性竟全然無知或不想講。

我班的“刺瘡”社，從一開始就不是那麼積極，在運動後期起了阻礙作用，發表的全是對揭露事實的人、積極的報刊品頭評足，後來越來越囂張，甚至登出的消息有些是捏造的，在系會學生大會上除了把黨中央的整風指示幾乎全背出來和加上兩句“我們完全同意劉真同志的報告”“劉真同志的報告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據說是對黨負責，對運動負責。

在運動中竟有些黨的負責同志（學生中的，如甘師昭、王俠等人）說我們的兄弟報刊和同志是“別有用心”，“有政治問題”等。

其實，我們的兄弟報刊（那些被罵兄弟報刊），我們的“別有用心”的同志，是在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地工作着，目的是為了幫助黨整風，辦好人民的武漢大學！

這些我不能不說是一股逆流，對於黨對於人民對於有“三害”錯誤的同志是有害而不利的。我深信黨、人民將會公正地作出評價，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保衛者，誰是黨的最高利益的維護者！

註（一）．指．“試論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羣衆自發運動。”

註（二）．見“矛盾論”。

註（三）．同上。

註（四）．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

註（五）．同上。

註（六）．據已揭發之材料是徐懋庸自己對自己的作用而說的。

註（七）．胡適：實用主義。

六月七日

# 正誤表

頁數	行數	錯	誤	改正
序言	7	爲了說明		爲了說明
序言	15	塗抹也。		塗抹也；廣大羣衆就是加塗抹也。
1	19	有先制定……。		事先制定……。
4	2	處頭來還是……。		到頭來還是……。
4	19	討論清楚實質；我不參加。討論頭頭上的是官僚主義時，一叫我就來。		討論清楚實質；我不參加。討論頭頭上的官僚主義時，一叫我就來？
5	2	而在我們教工學黨會……。		而在我們教工學委會……。
5	17	五反說實話階段完全……。		五反說實話階段完全……。
11	7	不能任意誣騙別人		不能任意誣騙別人
11	20	黨反時把許多無辜的良民……。		黨反時把許多無辜的良民……。
22	1	我們戰勝社會主義是不容易的，		我們戰勝資本主義是不容易的，
24	25	在路旁汗瓜爪皮來吃……。		在路旁拾起瓜皮來吃……。
26	6	農民所抗禦來的餘糧，		農民民所抗禦來的餘糧。
28	17	傢伙。		傢伙。”
28	29	無恥。		無恥。”
29	24	來騎。		來騎。”
30	38	魔鬼		魔鬼
31	9	統治”		統治”。
，	10	敵殺誰把中國		敵殺誰，把中國
，	12	新聞報		新聞報導
，	23	虎視鷹睇，		虎視鷹睇，
32	2	黨		“黨
，	6	消逝了！		消逝了！”



34	28	共產黨是	共產黨員
35	7	制或	制成
38	17	是長此下去	長此下去
39	1	一天。	一天。”
40	11	都到	都趕到
”	16	狠狠	狠狠
”	17	這和	這種
”	23	按上	安上
56	19	各就去選	各處去選
59	10	人的自由是不符合的	人的自由是不符合的
60	5	新聞報導	新聞報導
65	13	他跑去張相	他跑去照相
66	8	阿設奉承的小人	阿諛奉承的小人
66	15	搞的很好	搞得很好
68	6	直其無他們生活得很好	其實他們生活得很好
”	15	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
”	21	沒有獨特的見解	沒有獨特的見解
70	5	看自己美妙的蘆笛	吹自己美妙的蘆笛
”	21	…同志們未參加爭鳴	…同志們來參加爭鳴
71	19	了解黨和羣衆的關係	了解黨和羣衆的關係
73	29	…黨羣衆關係	黨羣關係
50	14	你們不以爲專政只是對敵人	你們不要以爲專政只是對敵人
51	7	應將眼光看的更大更遠	應將眼光看得更大更遠
53	10	沒有配合的好	沒有配合得好
54	6	沒有充分的民	沒有充分的民主
56	12	大庭鼓掌	大家鼓掌
79	12	住	住，
81	23	戈	格

83	21	如我反對	如我們反對
89	10	而蘇聯的奴僕	而是蘇聯的奴僕
90	4	間隔	時間
”	7	奪門	鬥爭
91	9	還講人家幹什麼	還講人家幹什麼
97	4	在這次運動中要求得感想	在這次運動中要求得到思想
100	3	澈底解放	澈底解放
”	3	這種理論調上，這是與事實不符的，	這種理論調，是與事實不符的，
”	19	兩個二年前作就向王任重提過，	二年前作就向王任重提過，
103	8	飛法生活，	飛向生活，
117	3	也可以那樣講，不是立場了，	也可以那樣講。
121	21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
122	6	…未參加“爭鳴。”	…來參加“爭鳴”
”	7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124	11	…特有黨證…	特有黨證…
125	24	歸之於色專家…却無問題	歸之於×色專家…却有問題
”	13	消極因素…加以黨報的必要	消極因素…加以克服的必要
”	23	上海有些學校…	上海有些學校…
128	12	武大雖了具有…	武大雖然具有…
”	13	…客觀形勢…	…客觀形勢…
”	14	…無補于事…	…無濟于事…
129	9	同羣衆同甘共苦	同羣衆同甘共苦，
131	23	…去後能夠…	來後能夠
132	10	…黨政領導…	…黨的領導…
134	20	…歷史比較…	…歷史比較…
138	7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

140	12	陳嘉勉	陳嘉勉
142	26	自上月等等你一信	自上月寄你一信
144	10	幾年以來...	幾年以來...
144	28	一些恩賜	一些恩賜
145	19	人民日報社會雜論	人民日報社會論
156	12	黃前級本駁答	黃青定回答
163	7	王懷	王爽